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 第 72 期目次

### 【論文】

- 1 周志仁 日治初期臺灣民間纖維工藝之考察——以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平澤丁東《臺灣俚諺集覽》為例
- 38 黃鈴棋 論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漢詩的編纂動機
- 62 張為舜 何焯《文選》學的梳理與試探——從「何校」與「何評」的釐正談起
- 98 陳文豪 昌邑國與山陽郡瑣議——讀《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札記

### 【文獻考釋】

- 113 吳福助 夏思涸〈落花無言賦〉考釋  
張莉涓

### 【書評】

- 121 吳福助 推廣公眾考古教育的範作——屈慧麗《中部人說故事：兼錄黃炫星先生捐贈水蛙窟遺址標本》讀記
- 124 吳福助 《鶴采：陳維滄攝影集》讀記
- 127 梁右典 《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讀記

### 【東海文庫】

- 吳福助  
134 林翠鳳 謝鶯興著作目錄——專書之部（節錄）  
歐純純

### 【手稿整理】

- 147 陳惠美 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系列：【第一章】〈《文心雕龍》的  
謝鶯興 文體論〉手稿整理（三）

### 【東海特藏整理】

- 174 高鈺軒 華文雜誌創刊號《戲曲研究》  
180 王雅萍 台灣雜誌創刊號《幼獅》

### 【大事記】

- 188 編輯室 圖書館大事記(2024.06.01~2024.1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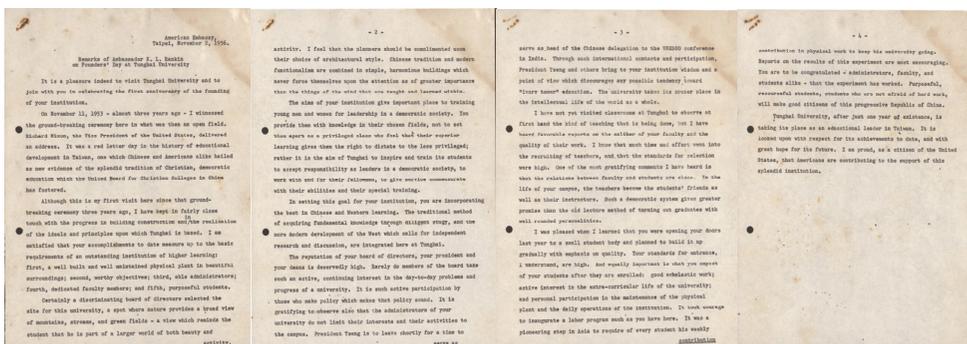
### 【館藏文物選粹】

- 0 王雅萍 館藏文物選粹(七十一)：藍欽大使在東海大學校慶日致辭

## 館藏文物選粹（七十一）：藍欽大使在東海大學校慶日致辭

王雅萍\*

「藍欽大使在東海大學校慶日致辭」資料為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之學校早期文件之一，是以英文打字之信件共有 4 頁，時間為 1956 年 11 月 2 日。



文件資料是時任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L.RANKIN）於 1956 年再次來到東海大學慶祝建校一周年的致辭內容。首先提及三年前 1953 年 11 月 11 日和美國副總統尼克森等人，一同參與了本校的奠基破土典禮見證台灣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日子。且一直相當密切地關心東海大學施工的進展和籌建過程，以及辦學的理想和原則，非常滿意迄今所達成的成就，包括一，這是一所環境優美、建築精良的學校；二，有正確價值的建校目標；三，強而有能的行政組織；四，敬業的師資團隊；五，有懷抱理想的學生。

讚揚本校的目標是培養青年學子在民主社會的領導能力，不是劃分為特權階級，而是激勵培訓學生承擔社會領導者的責任，以他們優越學識賦予的能力與提供服務。對於政策領導者的積極參與，優良教師的招募與教學品質的好評，讓東海大學有別於象牙塔的教育帶來了智慧與新觀點。

並耳聞東海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密切彼此亦師亦友，且融合中西方學習的精華，更有希望培養出個性全面的畢業生。東海學生們有良好的學業成績，也對課外活動積極有興趣，尤其是勞作教育的服務學習計畫更是亞洲開創性的一步。

對於東海大學成立僅一年，就已成爲台灣教育界的佼佼者，迄今爲止的相關成就表示讚賞，並且爲國人支持辦學所做出的貢獻感到相當自豪。

\* 東海大學圖書暨資訊處處本部館員。感謝讀者服務組李光臨先生協助校審。

論文

日治初期臺灣民間纖維工藝之考察——  
以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平澤丁東《臺灣俚諺集覽》為例

周志仁\*

摘要

甲午戰敗，臺灣改隸日本，成為海外殖民地。面對不同民族與文化的臺灣民眾，對從未有殖民經驗的日本政府而言，一切都是嶄新的開始。日本殖民政府除了積極從事民生基礎建設，也著手慣習調查，希望從中了解島民習性，以利殖民統治。慣習調查十分順利，促使剪辮、解纏足、禁鴉片……等斷陋習運動的產生，並促成大正 2 年（1913）片岡巖主編《日臺俚諺詳解》與大正 3 年（1914）平澤平七（丁東）主編《臺灣俚諺集覽》的刊行問世。

上述這兩本書主編皆為日本人，他們自幼即受儒家傳統教育，嫻熟漢文，同時也接受新式教育，了解西學，具有民俗學學術基礎，並熱愛南國異地文化。他們任職於公部門，咸認為除了官方文書外，可以透過這些普查收集而來的民間俚諺，可令日本人更加深入了解臺灣文化及島民習性。兩書體例相同，以漢文為條目，佐以日文註解，並加註日本同似的俚諺以為參照。兩書中可以看到中國、臺灣、日本三地俚諺的異同。

關於日治初期的服飾與纖維工藝發展研究者多從史料、實物、報刊等方向進行探討，尠自民間文學入手。傳統以來文學即有「廟堂與民間」、「雅正與通俗」之別，俚諺多為歷代先民積累的生活經驗或處世智慧，無須長篇綴文僅以片語隻言即能陳述大道，容易記憶且方便口語傳播，也容易因應人事時地物等外在環境變化而產生新的語彙，更可以印證歷史變化的軌跡與脈絡。

《日臺俚諺詳解》、《臺灣俚諺集覽》二書研究者稀，且多集中於語

---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纖維工藝博物館秘書。

文領域。筆者為纖維工藝博物館秘書，深知此二書記錄臺灣在日治初期民間文化與生活面貌，有助於了解當時的社會現狀。本文搜集二書中「纖維」意象相關俚諺，輔以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及報章等相關資料，加以歸納分析。由於雅俗文化有互滲現象，因此將溯源至意象的形成以及俚諺的創發，從中析論百餘年前臺灣纖維發展史。

**關鍵字：**日治時期、纖維工藝、民間文學、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平澤丁東《臺灣俚諺集覽》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fiber technology in the early days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 Taking Kataoka Yan's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Proverbs* and Hirasawa Dingdong's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roverbs* as examples**

Chou Chi-ren

**Abstract**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aiwan was transferred to Japan and became an overseas colony. Facing Taiwanese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cultures, everything is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ich has never had colonial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actively engaging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 people's livelihood,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lso conducted custom surveys, hoping to understand the habits of the islanders to facilitate colonial rule. The survey on customs went very smoothly, which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movements to eradicate bad habits such as braid cutting, foot binding, and opium ban. It also led to th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Proverbs* edited by Kataoka Iwa in Taisho 2 (1913) and Taisho 3 (1914). The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roverbs* edited by Pingze Pingchi (Ding Dong) was published.

The editors-in-chief of the above two books are all Japanese. They have received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 since childhood and are proficient in Chinese. They also receive new education, understand Western learning, have an academic foundation in folklore, and love the foreign culture of southern China. They work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believe that in addition to official documents, the folk proverbs collected through these censuses can help the Japanese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the habits of the islanders. The format of the two books is the same, with

Chinese entries as entries, Japanese annotations, and similar Japanese proverbs as referenc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lang in China, Taiwan and Japan can be seen in the two books.

Research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and fiber craftsmanship in the early days of Japanese rule mostly discuss it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object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tarting with folk literature. Traditionally, literature has been divided into "temple and folk", "elegant and popular". Most proverbs are the life experience or wisdom accumulated by ancestors of past generations. It is easy to state the truth in just a few words without the need for long essays. It is easy to memorize and facilitate oral communication. It is also easy to produce new vocabulary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s such as people, places, and objects, and it can also confirm the trajectory and context of historical changes.

There are few researchers on the two books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Proverbs* and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roverbs*, and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field of Chinese. The author is the secretary of the Fiber Craft Museum, and I know that these two books record Taiwan's folk culture and life in the early days of Japanese rule, and are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collects slang related to the image of "fiber" in two books, supplemented by relevant information such as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thnology and newspapers, and conducts an inductive analysis. Due to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refined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origin will be traced back to the formation of imagery and the creation of slang proverbs, from which the history of Taiwan's fiber development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will be analyzed.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fiber, folk literatu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Proverbs* in Kataoka Rock,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roverbs* in Pingze Dingdong

## 一、前言

甲午戰後，臺灣改隸日本。殖民者為了解這一片土地，迅速啟動慣習調查，以求了解臺灣民眾生活。大正 2 年（1913）臺南地方法院檢查局通譯官片岡巖《臺日俚諺詳解》付梓，大正 3 年（1914）臺灣總督府學務部編修書記平澤平七編成《臺灣俚諺集覽》，兩部書均收錄許多當時臺灣纖維俚諺，經由進一步的爬梳、分類與整理有助於釐清衣著服飾與纖維工藝的發展，從中亦可了解日治初期的社會真實樣貌與民眾的價值觀。

## 二、《日臺俚諺詳解》、《臺灣俚諺集覽》編寫出版過程

甲午戰敗，臺灣改隸日本，咸認為推動西化的明治維新居首功。後藤新平治理臺灣，也秉持「生物學原則」，特別強調科學研究、基礎建設，以改善民生。當時適逢歐洲民俗學傳入日本，日本初擁海外殖民地--臺灣，更是吸引諸多日本學者投入民俗調查的行列。慣習調查於明治 33 年（1900）啟動，成功發掘許多臺灣民俗與民間文學。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闡述其對俚謠、俗歌看法：

至於俚謠、俗歌之種類，概係將低劣之趣味寓於野卑之情調，雖風教上裨益處甚少，但資為民眾娛樂，流行範圍頗廣，其中亦有特別取材臺灣之風物者。<sup>1</sup>

認為俚謠、俗歌雖然是低俗的趣味，但卻是民眾娛樂、臺灣風物的展現。不只伊能嘉矩，許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日本學者從搜集過程中，也同樣發現民間文學與民眾生活習習相關，所書所寫的內容皆為人民心聲，是真正的臺灣文學。調查會平澤平七、片岡巖、東方孝義等成員，他們應時成為臺灣民俗學奠基者，由於其任務再加上自我的興趣，親歷踏查並投入採集與研究，其田野調查相關著作與觀點，至今仍被學術界

---

<sup>1</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新北：大家出版，2017年），頁 171。

採用，影響臺灣久遠。

大正 2 年（1913）任職臺南地方法院檢查局，擔任通譯官的片岡巖，首先編輯完成《日臺俚諺詳解》<sup>2</sup>一書。本書為個人參與舊慣調查會的成果集成，書中共收錄千餘條臺灣俚諺，利用日、漢文字對照與釋義，有助於日本人閱讀。片岡巖當時身處臺灣府城臺南，所採集區域囿限於臺灣南部，再加上以個人之力採集，雖然數量較少，僅能窺豹一斑，但已開臺灣俚諺整理的先河。

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認為臺灣俚諺言簡意賅，是風俗習慣的結晶，可考知風俗，辨明施政得失，有助於殖民統治，<sup>3</sup>特別委由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專責主導，由精通漢文、閩、客、日語的編修書記平澤平七主編，<sup>4</sup>並由蔡啓華、潘濟堂、陳清輝等臺灣科員協助，最後由編修官小川尙義負責校閱完成，將十餘年調查會收錄成果編成《臺灣俚諺集覽》，並於大正 3 年（1914）出刊，收錄俚諺總數達 4,300 餘條。

《臺灣俚諺集覽》每則俚諺均原文翻譯，並附有日本俚諺相似處比較，原文並加註假片名標示「廈門音」，書中將俚諺分為天文地理、神佛、命運……等 20 篇，各篇再依性質予以細分。由於具備常民化與口傳性，頗能引起民眾共鳴。多元的編輯群是本書的一大特色，除了日本民俗學者，亦有接受新式教育公學校畢業的雙語世代，以及接受舊式書房教育的傳統詩人，所收錄的俚諺亦兼集傳統詩詞格言，融合臺灣、日本與中國文化。兩書刊行之際，臺灣已經歷日本近 20 年殖民統治。俚諺為口傳文學，為社會基層民眾所作的心聲心語的展現，<sup>5</sup>涵括日本海洋與中國大

---

<sup>2</sup> 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13 年），封面。

<sup>3</sup> 臺灣總督府：《臺灣俚諺集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 年），序言。

<sup>4</sup> 平澤平七（平澤丁東）喜愛充滿南國風情的臺灣歌謠，在大正 7 年（1918）亦循此體例編成《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為臺灣歌謠彙編出版的嚆矢。

<sup>5</sup> 英國人蒙哥馬利所著的《1882 年-1891 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對當時府城居民知識水準的描述：「百分之九十的男子目不識丁。男子已經如此愚昧無知，所以女子的教育水準更低也不足為怪。」王育德著，黃國彥譯：《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

陸文化，展現臺灣文化的包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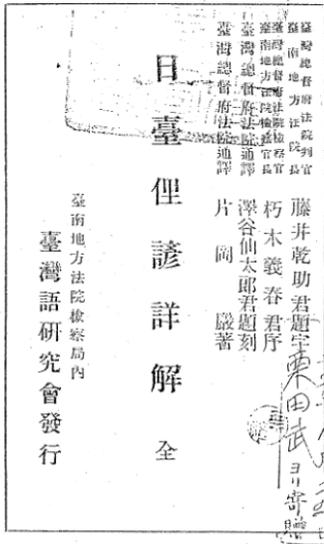


圖 1：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



圖 2：平澤平七《臺灣俚諺集覽》

### 三、纖維技法的成語

臺灣纖維植物多元，先民善用原料取織成物，連橫《臺灣語典》即有許多纖維的運用。例如勞動者「箍絡」（現常作苦力）即是以竹箍兩個用繩絡之，俾裝貨物，挑之以行；箴仔店的「箴」即是竹筐；剪絡（扒手）的「絡」即是緯十縷、縈纏即糾纏……等，<sup>6</sup>相關纖維器物與俚諺相結合之實例甚多，也可以看到臺語對纖維的靈活運用。當時臺灣纖維技法甚多，大抵可以分為編、染、繡及棉被製作等技法。

#### （一）編

臺灣由於地處亞熱帶地區，纖維植物發達。早期草編工藝產品材料

---

市：前衛出版社，2018年），頁145。

<sup>6</sup> 連橫：《臺灣語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19-103。

以天然纖維為主，如椰子葉、薄葵、稻草、大甲藺草、苧麻、月桃……等，<sup>7</sup>也為原住民善加利用。日本民俗學家柳宗悅曾讚譽：

高山同胞在織物方面擁有壓倒性的優越成就。如果三百年前拿到日本，必定奉為寶貝無誤。如果同正倉院御物混在一起，任何人都不會懷疑它的價值。<sup>8</sup>

隨著漢人移民向原民習得技藝，也將編織媒材拓展至藺草，涼爽的草蓆成為抗暑利器。

草蓆製作是勞力密集產業，藺草取織及加工流程自採割、曝曬、綑紮、儲存、析草、捶草、搓草、編織、收邊程序相當繁瑣。<sup>9</sup>這些工藝師們為了將一流的產品奉獻予顧客，日以繼夜努力工作，以致流傳「織蓆的暍椅」<sup>10</sup>的諺語。織蓆為勞力密集產業，工序繁瑣，更須要巧思，當時織蓆者多為女性，一件編織完成的草蓆的售價抵得上男子數日的工資，不僅增益家庭收入，無形中也提高臺灣婦女經濟地位。

在日本與「織蓆的暍椅」相似的諺語者，如「紺屋の白袴」。<sup>11</sup>紺屋即染房，即是染織業者終日為他人織品染色而忙碌，卻無時間染製自身的衣物。臺灣諺語最常與陶磁業者一同作喻，如「賣磁仔食缺織蓆暍椅」<sup>12</sup>、「賣磁食缺碗織蓆的暍椅」<sup>13</sup>、「燒磁食缺織蓆暍椅」<sup>14</sup>畢竟他們為大眾燒製碗盤等生活用品，為了不浪費，許多破損的瑕疵品也就自己使用。

---

<sup>7</sup>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一看就懂臺灣博覽——臺灣產業文化工藝美學全圖解》（臺北：遠足文化，2013年），頁200。

<sup>8</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年），頁208。

<sup>9</sup> 陳景林：《纖維物語——纖維材質的探索與設計》（臺中：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2011年），頁10。

<sup>1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99。

<sup>11</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66。

<sup>12</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66。

<sup>1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403。

<sup>1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99。

另外，亦有「裁縫司阜穿破衫」<sup>15</sup>亦有相同的寓意。從以上各諺語，可以發現民間文學口傳性、集體性、變異性的三大特徵，也可以發掘臺灣先民間一知十的豐富想像力。

臺灣百工興盛，相仿的諺語尚有「砧皮鞋食毛」<sup>16</sup>蓋當時皮鞋多由牛皮製成，為除牛毛及使皮革柔軟，必須經過多道工序，故有此諺。「食毛」與「食無」同音，意味著衣食無著，畢竟當時生活困苦，大多為赤足，偶有草鞋可穿便十分滿足，更遑論有皮鞋可穿，相似的諺語亦有「船仔蚊罩」。

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每逢夜晚常有蚊子擾人清夢，常以蚊帳禦蚊蟲叮咬。長谷川美惠〈臺灣的家庭生活〉曾介紹蚊帳：

大多是用棉布、綢絲、或漂布，細細的線織成的白色的，或者有細小花樣的。正中央可以分開來，人是由這裡進入的，不用的時候就像窗簾一樣分兩邊吊起來固定。<sup>17</sup>

臺灣諺語「船仔蚊罩」<sup>18</sup>即表示「無門」，「無門」的閩南語發音又諧同「無毛」，表示光滑到什麼都不存在。另有一諺語「識到沒穿得蚊帳」，<sup>19</sup>穿衣覆體是人類基本需求，蚊帳是防蚊之用，為了通風，故多為鏤空。若穿著蚊帳上街漫步則與赤裸無異，特以表示誇張到無以復加。

## （二）染

臺灣人的衣服大都無花紋，常用白或黑、青色作衣褲。惟禮服及少年、婦女、煙花藝娼等，用浮織或花紋布。黑色、淺黃色、青色棉織布可在本地染布店染製，其他悉由大陸及日本輸入。<sup>20</sup>當時染坊多分布三

<sup>1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401。

<sup>1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401。

<sup>17</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一）》（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 年），頁 33。

<sup>1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9。

<sup>1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436。

<sup>20</sup>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1987 年），頁 85。

峽、屏東一帶，將運來的素色棉布，染成紅色或深藍色，<sup>21</sup>再銷售至全臺各地。

顏水龍〈工房圖譜〉書寫天然染料多元，有泥藍、薑黃、薯榔、蘇木……等，<sup>22</sup>柳宗悅、金關丈夫，〈關於臺灣民間藝術〉也提到臺灣人對於染料的運用裕如，大菁可染為藍色、薯榔則是茶色系的好植物，蘇木若與泥藍配合，即可產生紫色。<sup>23</sup>由於染布工序繁複，染布前要有各種準備工作，叫做藍建，例如調藍液、濾去沈澱物、補充石灰、研布……等工序，因此急不得，故老祖宗也告誡「快染快褪」<sup>24</sup>必須長時間方能定色。

由於俚諺採集者多為傳統知識分子，熟讀古籍的學者，也將幼時讀過宋·汪洙《神童詩》「柳色侵衣綠，桃花映酒紅」<sup>25</sup>收錄為臺灣俚諺。然而真正染布過程卻無如詩中的意境般美好浪漫，由於植物發酵氣味不佳，故民眾途經染布店，皆屢屢掩鼻而過，故也留下「染布放屎」<sup>26</sup>民間諺語，形容染房惡臭難聞。

晉·傅玄〈太子少傅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sup>27</sup>以染布告誡環境會影響並改變人的品格，以喻交友的重要，中原祖先留下的人生智慧，臺灣俚諺亦可見聞，可見文學由廟堂至民間俗化的過程。臺灣諺語中也常以白黑二色引喻為善惡之分，「白白布染到烏」<sup>28</sup>比喻遭到刻意汗蟻與抹黑，寓顛倒是非之意。

臺灣自古為四方輻輳的島嶼，各方人種均曾在臺灣生活，大航海時

---

<sup>21</sup> 何兆華等：《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漢人織品服飾篇》（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04年），頁19。

<sup>2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284-285。

<sup>23</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210。

<sup>2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234。

<sup>2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550。

<sup>2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04。

<sup>2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72。

<sup>2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10。

代也曾經有非洲黑人在臺灣島上擔任奴隸，南臺灣的廟宇常見「愚蕃扛廟」的泥塑。臺灣諺語「用火炭做枕頭」<sup>29</sup>以喻烏鬼（黑人）或烏鬼頭或膚色較深或捲髮者，無遺傳學概念者咸認為膚色深或捲髮皆因火炭染色而來，可見彼時臺灣民眾豐富的想象力。

### （三）繡

臺灣開墾初期，生活不易，民眾在衣飾並無多大變化，通常四季一襲布衣，只求暖和蔽體。身處亞熱帶氣候，臨冬之際只須加添一、二件外衣禦寒即可，僅有喜慶節日，才勉強添置一件新衣。早期的布料，大都外地轉販而來，<sup>30</sup>民間衣物並無過多刺繡裝飾，常見的刺繡使用多用於八仙綵、桌裙、神衣、頭旗宗教用品以及戲服等衣物，色彩鮮艷，點綴吉祥圖案，<sup>31</sup>呈現民俗氛圍。

池田敏雄〈民俗雜記〉中寫道婦女裝縫紉用具為筐仔或箆仔兩種，而布針多為製衣、縫鞋底、縫棉被之用，對衣服妍醜要求不高，只要會做布紐即可嫁夫。<sup>32</sup>也將務實的價值觀展現在諺語之上，昔有「畫水無波空作浪，繡花雖好不聞香」<sup>33</sup>諺語，反映當時臺灣民風淳樸、民眾多不喜奢華。故民間所流行衣物亦不著重繡面、繡飾，惟重視衣料品質。

民間的刺繡多為母女傳承，金關丈夫在〈民藝解說〉一文中曾就「綉花樣」云：「母親把圖樣刺繡在似手巾的布上做為樣本給女兒練習。」<sup>34</sup>新娘嫁妝常把繡絲簿、金總，鞋帽子樣本……等充作嫁妝。如池田敏雄〈民俗雜記〉所見臺灣女性的刺繡多展現在肚兜、內衣等私密衣物上，<sup>35</sup>故「鴛

---

<sup>29</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27。

<sup>30</sup>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典藏二版）》（臺北：商鼎數位出版社，2014 年），頁 43。

<sup>31</sup> 張志遠：《臺灣的工藝》（臺北：遠足文化，2004 年），頁 152。

<sup>3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106-107。

<sup>3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45。

<sup>34</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3）》（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 年），頁 288。

<sup>35</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95。

鴛鴦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sup>36</sup>此民諺由元好問〈論詩絕句〉三首之三：「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而來，可見雅正文學為民間文學所涵化與應用。

繡工屬於針線活，針線是家家必備的生活用品，臺灣所收錄的諺語中以「針」最多，針除了實際補綴亦有許多民俗作用。池田敏雄〈婚姻證錄〉也收錄結婚女性「插針」惜別娘家的習俗。<sup>37</sup>針除了在喜慶之時運用，也有趨吉避凶作用，日俄戰爭之際，日本軍人的女性家眷，手持白色布佇立於街頭，請過路女性在布上縫一個結，並祈禱出征者武運昌隆的「千人針」傳聞有抵禦子彈的功效。無獨有偶，臺灣人在正月時在門口綁上柳枝和大蒜，並在大蒜上頭插數十根針，<sup>38</sup>以示驅除不淨。吳槐〈上元考〉亦考查臺灣女性會在拜冬生娘、椅仔姑、同四娘、紫姑……等針神，以求手藝精進。

針神的產生蓋於日治初期民生艱難，許多衣物仍必須縫縫補補，傳統成語常見的「無針不引線」<sup>39</sup>也隨著先人渡海來臺傳承成為通行臺灣南北的民諺。取材自《增廣昔時賢文》「一人一般心，無錢堪買針」<sup>40</sup>也被臺灣日籍學者收錄，由於橫越黑水溝，到最後產生與原鄉不同的變異，也形成「兩人兩樣心無錢可買針」<sup>41</sup>的獨特地方性諺語。

除了傳承外，亦有變異為地方獨特者，如：「穿針引線」、「引線穿針」在臺灣諺語成為南北各地可見的「引線入針」<sup>42</sup>，蓋針的主要目的在於縫綴，線「入」針孔方有作用，可見臺灣人講求務實，也相似於日本諺語

---

<sup>3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450。

<sup>37</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臺北：武陵出版社，1991 年），頁 243。

<sup>38</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頁 36。

<sup>3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8、《日臺俚諺詳解》，頁 232。

<sup>4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27。

<sup>4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32。

<sup>4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0、《日臺俚諺詳解》，頁 193。

「手引あれは何事も仕遂げ得らる」<sup>43</sup>中、日、臺三地的諺語皆比喻從中拉攏、撮合之意。

中國民間流傳的民間故事則有李白見老太婆鐵杵磨針寓以力學不倦方能有成之傳說，鐵杵在臺灣也化成民間常見的鐵鎚（槌），故成爲「鐵槌磨到做針」<sup>44</sup>、「鐵鎚磨成針」<sup>45</sup>，無論是鐵杵或是鐵鎚，或是「有心打石石成針」<sup>46</sup>、「骨頭磨成針」<sup>47</sup>、「指頭仔磨成針」<sup>48</sup>皆與日本諺語「精神一到何事かならさらん」<sup>49</sup>、「手足を摺子木にする」<sup>50</sup>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是相同的。

清治時期，臺灣於臺北、新竹、嘉義、臺南……等地，皆建設牢固的城牆與城池，壯麗的城門雄峙四方，十分壯觀。日治前期，臺灣許多城市尙未市街改正，仍可見城門處處，民間以「有看見針鼻，無看見大西門」<sup>51</sup>形容一個人只注意到細微末節卻未看到重點，容易因小而失大。

由於針體細小，容易因遺失而誤觸造成傷害，池田敏雄，〈民俗雜記〉輯有臺灣民眾若針遺落在地上找不著時，即會拿著剪刀往地上扔，唱道：「針仔針，鉸刀做媒人，要出的緊出來，無出的較久的生鏽。」<sup>52</sup>李氏杏花〈萬華紀聞〉特別叮囑掛在床上的蚊帳，不可插縫針。<sup>53</sup>針頭細小、銳利，能夠穿越所有纖維細緻之處，若是「鉤針釘密鈕縫」<sup>54</sup>或「銅針挖沒

<sup>43</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11。

<sup>44</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89。

<sup>4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60。

<sup>4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28。

<sup>4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2、《日臺俚諺詳解》，頁 110。

<sup>4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84。

<sup>49</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89。

<sup>50</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10。

<sup>5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0。

<sup>5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105-106。

<sup>53</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68。

<sup>5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0。

落」<sup>55</sup>，則可見其堅硬程度並非一般，用來形容吝嗇到極致。

傳統社會，男耕女織。縫紉等家事多由女性所操持，<sup>56</sup>婦女們對於縫紉工具的針有特殊情懷。黃連發〈臺灣童詞抄〉收錄「阮厝一枝針，恁厝二枝針」的女性童詞。<sup>57</sup>針與女性密不可分，民諺也以「海底摸針」<sup>58</sup>、「海裡摸針」<sup>59</sup>原喻為事情難辦，就如同在茫茫大海中尋找一根細針般，稻田尹〈臺灣歌謠集釋〉曾採集汐止地區流行民歌，其中云：「君仔思娘勿會走閃，娘仔思只海摸針。」<sup>60</sup>以海底摸針形容女人心難測。

臺灣諺語多以「針線」相合為主，較少見到絲線單獨者，多以針線比喻為夫婦好合的展現。絲線單獨的諺語僅有「絲線更要吊銅鐘」，繞指柔般的絲線如何能夠成為百鍊鋼鐵吊繫萬鈞銅鐘，意近日本諺語「到底ものにならぬ」<sup>61</sup>表示為根本不可能之事。

#### （四）彈棉被

棉被是臺灣家戶的日常用品，臺灣棉被工序複雜。立石鐵臣〈臺灣民俗圖繪·彈綿花〉曾描寫棉被製作步驟：

彈綿花的機器非常有意思，用粗皮帶綁起來，像弓似地背在身後，前面釣著像樂器的東西，然後以木槌敲打張開的絃，沙沙的聲音有如樂器一般，綿絮也像吹雪般地飛舞了起來。<sup>62</sup>

膨鬆柔軟的棉被是引睡媒，故「眠床底拾著被」<sup>63</sup>寓有理所當然之事。

人生所求不過一宿安寢，放著柔軟的綿被不睡而睡在堅硬的物品之

---

<sup>5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5。

<sup>56</sup> 高世瑜：《中國古代婦女生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45。

<sup>57</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五）》（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頁 20。

<sup>5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7。

<sup>5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7。

<sup>60</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一）》，頁 76。

<sup>61</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19。

<sup>6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一）》，頁 15。

<sup>6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57。

上，實令人費解。故民諺以「綿被不暍，蠔殼車拋麟」、「補綿績換挨壘」<sup>64</sup>喻放著好事不做，無事生端。若是「紙被，趁人燂虱母」<sup>65</sup>若以紙為被，不僅自己沒有辦法安眠，還必須幫人燒水煮虱子，那就是天下最愚蠢之事。

臺灣冬季冷冽，棉被可禦寒，「十二月綿被」<sup>66</sup>成爲嚴冬熱銷商品。但夏日的棉被就不是每一個人禁得住，民諺「六月綿被揀人蓋」、「六月綿績揀人蓋」<sup>67</sup>寓有擇人而事，每個人皆有擅長之事，不可強求。若是要拿著不再鬆軟的棉被充作毯子，則有「破綿績假氈」<sup>68</sup>自欺欺人之譏。

#### 四、日常衣著

人類自草莽以來，最初以樹葉、獸皮蔽體，以求溫暖與保護。隨著文明發展，材質也愈發多元，造形亦更多樣，已漸次脫離原始「方衣」的型制，衣服不僅是禦寒的單一作用，更是尊榮展現或地位象徵。除了衣物，帽、笠、裙、褲、鞋、靴……等，也是日常生活服飾，這些物品與生活息息相關，所產生的俚諺數量之多，不勝枚舉。

##### （一）裝著打扮

臺灣人樸實，平日鉛華不施，但在正式場合亦會略施薄妝，稍飾衣容，民諺云：「三分姿娘四分打辨」<sup>69</sup>畢竟自古以來「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sup>70</sup>，適度修飾給予人端莊的印象，若過度化妝則不免有「三份人四份粧」、「老女の厚化粧」<sup>71</sup>之譏諷，〈朱子治家格言〉「妻妾切忌艷裝」

---

<sup>6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1。

<sup>6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8。

<sup>66</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206。

<sup>6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1。

<sup>6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1。

<sup>6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45。

<sup>7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46。

<sup>71</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89。

<sup>72</sup>的智慧言也成爲臺灣諺語之一，流傳後世。

臺灣爲移民社會，安土重遷、尊天敬神，寺廟林立，以祈求心靈寄託，在許多廟會活動的興辦中也了解到「人是裝的佛是扛的」、「人著裝疋著扛」<sup>73</sup>不變道理。當時交通不發達，多以步行爲主，偶出遠門方有搭乘牛車或火車的機曾，民諺「牽馬穿好衫」<sup>74</sup>則是穿好衣服的馬伏牽著馬匹，利用紅花綠葉的效果，襯托乘坐者非凡的氣勢。

先民了解「先重衣冠後重人」，<sup>75</sup>衣飾不貴華麗，但求整潔，若是穿著得太過花俏或不合時宜，則有「猴穿衫變作人」<sup>76</sup>、「猴穿衫變做人」<sup>77</sup>貽笑大方之譏。雖說「有形頭好行走」<sup>78</sup>，正式場合必須衣裝合適。但遇到衣冠楚楚行爲野蠻的「衣冠禽獸」<sup>79</sup>，也就只能自己格外當心了。

日本諺語「人形にも衣裝、馬子にも衣裝」<sup>80</sup>也有不切實際意味，此諺語與臺灣民諺「草厝掛玻璃窓」、「豬屎籃結彩」意思相近。當時民力未豐，三合院平房式建築不多，許多房子多就地取材，如以土角或稻草建屋。稻草建的草厝無地基，若遭飛廉、祝融光顧，立即形銷骨立或灰飛煙滅，<sup>81</sup>造成民眾相當大的損失。

相同的俚諺亦有「豬屎籃結彩」，當時衛生條件差，豬隻多放養，豬屎可充作肥料或飼料，常見小孩拿著籃子撿豬屎，以充家計。<sup>82</sup>鐘錶是當時的奢侈品，除火車站因報時原因必須設置外，民舍亦難得見聞。故也

---

<sup>7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56。

<sup>7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91。

<sup>7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414。

<sup>7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7。

<sup>76</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98。

<sup>7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491。

<sup>7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6。

<sup>7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04。

<sup>80</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25。

<sup>81</sup> 不著撰人：〈幾釀巨禍〉，《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8 年 4 月 8 日）、不著撰人：〈失火一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8 年 10 月 3 日）。

<sup>8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78。

有「豬屎籃結彩，草厝掛時鐘」除了華而不實亦有多此一舉之意，近似日諺「掃き溜めに鶴」<sup>83</sup>「豬屎籃結彩」、「草厝掛時鐘」兩句諺語雖都在南部採集，採集人、時、地有異，足可證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的變異性。

## （二）帽、笠和棕簑

日治初期臺灣仍是農業社會，土地集中於少數大地主手中，由於租約形式以口頭租約為主、地租過高、租期太短……等因素，<sup>84</sup>常使佃農生活無繼，無立錐之地。故民諺「腳踏人的地，頭戴人的天」、「腳踏恁的地，頭戴恁的天」<sup>85</sup>以示生活困苦，雖說如此仍必須「頭殼戴天，腳踏地」<sup>86</sup>頂天立地踏實地過日子。

臺灣氣候炎熱，實在不適合配戴北方氈帽。於是大甲草蓆後來經過織法改良，成為大甲帽，<sup>87</sup>是日治時期臺灣出口的大宗，曾為臺灣賺取許多外匯，<sup>88</sup>成為臺灣名產，<sup>89</sup>當時除了大甲帽，也有林投帽的製造，<sup>90</sup>帽子可遮陽、擋雨，成為民眾出外穿搭必備的物件。傳統俗諺以「戴高帽」比喻說好話奉承他人，臺灣人不愛高帽而好大帽則更易為「創一頂大帽使伊戴」，<sup>91</sup>也可見地域的差異性。

臺灣人務實也表現在諺語中，面對他人奉承，深知「宣帽不戴破要被人口破」<sup>92</sup>不要飄飄然地得了大頭症，長輩常告誡子女：「大頭傷重帽

<sup>83</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38。

<sup>84</sup> 葉淑貞：《臺灣日治時代的租佃制度》（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 年），頁 3。

<sup>8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

<sup>8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57。

<sup>87</sup>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典藏二版）》，頁 326。

<sup>88</sup> 不著撰人：〈太甲蓆製の夏帽輸送〉，《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1 年 4 月 27 日）。

<sup>89</sup> 不著撰人：〈大甲蓆爲本島名產〉，《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11 年 7 月 1 日）。

<sup>90</sup> 不著撰人：〈臺中林投帽の製造〉，《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2 年 12 月 3 日）。

<sup>9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8。

<sup>9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8。

仔」，<sup>93</sup>不要貪慕浮名、富貴，只要有真材實學並努力奮起，則無須擔憂「有頭殼驚無紗帽」，<sup>94</sup>最怕的是「腳頭肫戴宣帽，不是人面」<sup>95</sup>虛有其表，沒有才能卻竊據名位者。

相較於士大夫的那頂紳士帽，傳統社會農夫戴笠荷鋤是田間常見的景致，炎炎夏日能夠抵禦灼熱陽光的唯有那頂斗笠，時人常以「破笠仔好遮身（馬鹿も使ひ様）」比喻再不堪的物品皆有其價值。<sup>96</sup>日本關於斗笠亦有「夜目遠目笠の中」即在夜晚陰暗處看到戴笠的女人，呈現出若隱若現的朦朧美。臺灣當時的審美標準不似今日，不喜好骨感美人，喜愛白皙、豐滿的女子。臺灣諺語亦有「遠看白波波，近看攏無骨」<sup>97</sup>形容理想破滅，也喻有虛有其表之意。

臺灣氣候潮濕多雨，昆蟲對於天氣溫濕度變化極為敏銳，每至落雨前即群飛逃散，蜻蜓（田嬰）即會集結捕食小飛蟲。故民諺有云：「田嬰結堆著穿棕簑」<sup>98</sup>代表未雨綢繆。農民為了在雨中行動、做事方便，會製作棕簑以利下田耕作。棕簑製作過程極為繁瑣，首先須棕櫚葉晒乾，梳理成爲一片片植紗，然後重疊成胚模，再以棕繩穿上縫針密合而成。<sup>99</sup>由於簑衣充斥著棕紗與棕線，「棕簑胡蠅食毛」<sup>100</sup>食毛與「食無」同音，故有徒勞無功之意。

### （三）衣裝服飾

黃氏鳳姿〈臺灣婦女服飾〉云：

臺灣的衣服，質料種類很多。春天有浮貢、縐紗、絲絨、紗線（晚

---

<sup>9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58。

<sup>9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55。

<sup>9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80。

<sup>96</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33。

<sup>97</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81。

<sup>9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14。

<sup>99</sup>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典藏二版）》，頁 331-332。

<sup>10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7。

冬到初春穿)夏天則紡綢、涼紗、闊紗、暖羅等。緞類的有油綢(素面)、點梅(圖案),其他還有蔴葛類,苧仔、白江西、烏江西、淺江西等。秋天有秋羅。冬天有狐狸裘,飛鼠馬褂、羊羔袍、嗶嘰等。

101

十分多元。

這些材料多是從中國輸進來,尤其狐狸裘,不沾露水非常珍貴。李氏杏花〈艤舸聽書〉提及羊羔裘曾說:臺灣人最常用的莫過於羊羔裘,以羊毛製成的內衣,以前有錢人家姑娘出嫁都帶奶媽、奴婢陪嫁,視女方的富裕程度,通常也會帶一件羊羔裘過門,<sup>102</sup>除了自用也有彰顯富貴之意。

臺灣諺語有「羊羔面快反」,<sup>103</sup>由於羊羔裘柔軟,易於摺疊或穿著,故形容人翻臉像翻書般迅速。臺灣春夏交替之際,氣候不穩定,氣溫一日三變,古人亦特別提醒後生晚輩,云:「未食五日節粽,破裘不甘放」<sup>104</sup>切莫因為一時的疏忽而造成感冒、傷風,可知臺灣俚諺已針對時序作衣裝的搭配,也見證臺灣俚諺的獨特的地方特性。

#### (四) 褲與裙

衣服與褲子不只可以蔽體,也有裝飾、防寒之作用,衣褲皆具才能成套,「有衫無褲」<sup>105</sup>寓有不周全、不完備之意。自清末以來,臺灣婦女多穿寬型大檔褲裝,遇有喜慶等正式場合才在褲裝外加上裙子。<sup>106</sup>民諺:「房間內打不見褲,不是夫就是某」<sup>107</sup>、「眠床內失落褲,不是夫就是某」

<sup>101</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61-62。

<sup>10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一)》,頁 34。

<sup>10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04。

<sup>10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32。

<sup>10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6。

<sup>106</sup> 梁丞文:《臺灣民俗大觀》(臺北:大威出版社,1985年),頁 168。

<sup>10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0。

<sup>108</sup>寓有無可抵賴之意。日本諺語「人の褌で相撲を取る」<sup>109</sup>寓有拿他人物品做面子，最怕是「走鬪打不見烏網仔袴」<sup>110</sup>把最珍貴的烏網褲也丟失了，以寓投機者一無所有。

女性的大檔褲穿著方式是把多餘的部分相折於前面，另外再用腰帶綁起固定。<sup>111</sup>臺灣男女性的褲裝都必須腰帶相繫，時人亦用「褲帶結相連」<sup>112</sup>，以示夫妻感情和睦。褲帶為民生必需品，隨處可見，「三文買一褲頭」<sup>113</sup>表示極為廉價。日文中的「焦眉の急」與燃眉之急同意，臺灣諺語以「屎緊褲帶打死結」<sup>114</sup>形容迫不及待的困窘之境。

古井與褲口相差甚鉅，「古井拿準褲」<sup>115</sup>表示天差地別。若「做三腳褲使人穿」<sup>116</sup>、「一領褲三個腿」<sup>117</sup>則有設計害人之意。當時總督府以警察治國，「大人」巡察四方，常對違規、犯法的臺灣人施以夏楚，故流傳「情理人褲自己脫」、<sup>118</sup>「情理人褲自己脫」<sup>119</sup>以寓有自知之明。而「脫一下褲打一下腳川」<sup>120</sup>比喻做事拖延、不乾脆俐落，有不知權變之意。

臺灣年輕女性不喜愛穿裙子，當時女性褲子的形式長及腳踝，婚前的姑娘都當外出用裝，結婚時才在褲子上加裙子，做為新娘裝。臺灣禮服為裙裝，常見的有五彩裙、百褶裙、劍帶裙等，<sup>121</sup>結婚後方有著裙外出

---

<sup>10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57。

<sup>109</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41。

<sup>110</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206。

<sup>111</sup>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典藏二版）》，頁 304。

<sup>11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7。

<sup>11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7。

<sup>114</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75。

<sup>11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7。

<sup>11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8。

<sup>11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9。

<sup>118</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57。

<sup>11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9。

<sup>12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9。

<sup>121</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頁 117。

參加正式活動的機會。<sup>122</sup>裙裾代表已婚婦女，「裙裾加落」<sup>123</sup>代表由女人轉化為母親的角色，必須忍受生兒育女的痛苦，更是人生階段的開始。臺灣裙裾的諺語無多，蓋民間女性多要承擔勞動工作，多非養尊處優的貴夫人，仍是著褲裝行動較為方便。

### （五）鞋靴

臺灣先民胼手胝足開啓林野，最常以赤腳與穿鞋來劃分廟堂與民間，民諺「赤腳逐鹿，穿鞋食肉」<sup>124</sup>、「脫赤腳逐鹿，穿鞋食肉」<sup>125</sup>除了代表階級，也暗指出力者得不到勞動成果，反而未出力者坐享其成的不合理現象，臺灣資源分配不均，渡海無妻的羅漢腳甚多，若遭細故再加上為有心人慫恿操作下，民變也就屢屢在這種情況下產生。

臺灣人常打赤腳外，若遠行為保護腳部之用，方著草鞋。金關丈夫〈民藝解說〉曾分析南北草鞋的差異，南部草鞋的鞋底為蘆葦鞋面為三角藺，臺北地區草鞋材料則全是三角藺製成。<sup>126</sup>當時物資缺乏，草鞋是日常用品，隨手可得，時常三月不知肉味，若「草鞋咬入來，豬肚咬出去」<sup>127</sup>則比喻把好事往外送，自己反而得到差的，有受騙、上當、十分不智之意。

臺灣民俗上床時男性自己要脫下鞋，放在女性踩不到的地方，萬一不幸鞋被新娘踩到，新郎將一輩子在妻子面前抬不起頭。<sup>128</sup>故「眠床腳拾著破草鞋」，<sup>129</sup>寓有各安其位之意。此時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常出外工作就是數月經年，臺灣人內斂含蓄，民諺「夫穿草鞋出門某要結鞋帶」<sup>130</sup>也

<sup>12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57。

<sup>12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7。

<sup>12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19。

<sup>12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57。

<sup>126</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3）》，頁 284。

<sup>12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7。

<sup>128</sup> 高賢治、馮作民：《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1 年），頁 197。

<sup>12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57。

<sup>13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54。

寓有兩情相繫。

當時交通不便，多仰賴肩挑貿易，當時流行「鹿港擔埔社」的行商路線，挑夫、商旅往返鹿港至埔里盆地，長達數十里，多以草屯為中繼站，在此補給、換草鞋，用壞的草鞋堆積成墩，故名草鞋墩。<sup>131</sup>草鞋破蔽除棄置委地外，時人也常「壞草鞋好貼土壟腳」<sup>132</sup>以增加磨米時的穩定性，也有廢物利用之意，倒是符合現今環保節能的觀念。

臺灣農業社會娛樂不多，唯有野臺戲是當時最大的娛樂活動，民眾也能夠品評演技的良劣，戲的好壞是其次，所謂「歹戲要穿好靴」，<sup>133</sup>不僅增加專業度，更是敬業精神的展現。當酬神野臺戲的演出，以搬演的檯數來計算戲資，越多檯表示越富有，若要賠罪、謝禮也多請戲團演出以表心意，整齣戲演出費用，除了戲資，還有加冠禮的賞錢。民諺「加冠禮較多戲身銀」<sup>134</sup>以此比喻事情變得更無以復加、難以善了。相似的諺語尚有「掠秀才擔擔」<sup>135</sup>舞文弄墨的秀才擅長的是文書業務，請其挑擔，不僅無法完事，反而惹衍生出一堆問題，無法順利完成。

李氏杏花〈萬華紀聞〉描述布鞋多利用家中剩餘的碎布用來做布鞋，<sup>136</sup>民諺「刺鞋合著腳」<sup>137</sup>即寓有謀定而後動之意。一般布鞋底多由二十多層舊布縫成，「靴破底原在」，<sup>138</sup>若靴面破損再補綴即可。大腳所需布料多，加重對鞋子的磨損，故「大腳傷重鞋」。<sup>139</sup>真金白銀買布鞋天經地義，若買方以假幣向賣方採購紙鞋，則如民諺「銅銀買紙靴」、「銅銀買紙靴雙

---

<sup>131</sup> 呂士朋、孟繁超，《草屯鎮誌》（南投：草屯鎮誌編纂委員會，1986年），頁92。

<sup>13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10。

<sup>13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413。

<sup>13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411、《日臺俚諺詳解》，頁196。

<sup>135</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237。

<sup>136</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69。

<sup>13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08。

<sup>13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310。

<sup>13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284。

人暢」<sup>140</sup>買受雙方互相欺瞞，自以為得益，殊不知結果也只是空歡喜一場。

## （六）纏足

臺灣改隸後，為了更了解民族習性，有計畫地進行慣習研究，在長期調查中將頹迷心志的鴉片、婦女的纏足、男子的辮髮視為陋習，並加以改革。傳統男子對「三寸金蓮」<sup>141</sup>的癡迷，女子由於纏足，由足至腿部猶如琵琶，故稱妻子為「柴琶」。<sup>142</sup>許多初到臺灣日本民眾對纏足的女性，至今仍印象深刻，<sup>143</sup>也使得三寸金蓮下的纏足諺語被廣泛收錄。

根據明治 38 年（1905）統計，纏足者佔女性人口的 56.93%，<sup>144</sup>舊價值觀認為纏足可以增添女性體態之美，使得未婚的女性能夠得到好歸宿，甚至視纏足為富貴的象徵，當時纏足尺寸從 1.5 至 2 寸不等，纏過的足稱為茗，<sup>145</sup>當時以小腳為美，甚至流傳「大腳假細鞋」<sup>146</sup>諺語，用以比喻華而不實者。

纏足的裹腳布在臺灣稱為腳帛，女性的雙足長期悶在三寸金蓮裡，每次沐足打開來洗的時候臭氣沖天，所以一定要撒上明礬。<sup>147</sup>腳帛須要時時清洗與晾曬，裹腳布又臭又長，隨風飄動猶若萬國旗，民諺：「腳帛掛竹篙麼奇多有」。<sup>148</sup>俚諺也有「老母無腳帛可縛，鞋給戲旦穿」如同日本諺語「女郎買の鹽菜」<sup>149</sup>以喻揮霍無度的火山孝子，只要花娘不要老娘。

池田敏雄〈婚姻證錄〉曾記載自安床到結婚前一天，準婆婆若把她金蓮鞋放在剛安好的新床上，將來媳婦便會敬畏她，也能恭敬地侍候婆

<sup>14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617。

<sup>14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46、《日臺俚諺詳解》，頁 205。

<sup>14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一）》，頁 85。

<sup>143</sup> 吉田道夫：《臺灣風物情》（臺中：臺日交流聯誼會臺中會，2001 年），頁 131。

<sup>144</sup> 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 年），頁 453。

<sup>145</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頁 30。

<sup>14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84。

<sup>147</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六集）》（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 年），頁 246。

<sup>14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6。

<sup>149</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85。

婆。<sup>150</sup>婚姻與纏足最爲人所熟知者，莫若「上轎即縛腳」、<sup>151</sup>「要上轎即縛腳」、<sup>152</sup>「上轎縛腳」、<sup>153</sup>「要嫁即縛腳」<sup>154</sup>等諺語，相似於日本諺語「敵を見て矢を矧ぐ」、<sup>155</sup>「賊を捕へて繩を絢ふ」、<sup>156</sup>「泥棒を捕へて繩を絢ふ」<sup>157</sup>相較於日本人用見敵引弓或見賊捻索來譬喻臨渴掘井之危殆，臺灣人以出嫁與纏足結合，相較於日本諺語中的劍拔弩張的態勢，可見當時纏足興盛與臺灣民風淳樸。

### （七）喪服

傳統社會最重視養生送死之事，喪服是禮的展現，披麻戴孝自斬、齊、衰、大小功、緦麻等五服均有一定的制度。洪氏串珠〈葬式的民俗〉云：「死者已婚之子息著有袖之麻衫，未婚者則著無袖之麻衫，但不論已婚或未婚，頭上一定都戴麻冠。」<sup>158</sup>以示至親離世。

至於媳婦及未出嫁的女兒，亦與未婚的子息相同，均穿著無袖之麻衫。麻布在古代是較容易取得的粗鄙布料，由於麻衫或麻冠，皆由麻繩或麻索連繫，民諺「拖麻穿索」<sup>159</sup>、「拖麻携索」<sup>160</sup>即代表服喪之意，也表示喪家因爲親人離世而無心在外在服飾上裝扮。

臺灣喪禮古制，在父喪之時，每一位孝男及長孫亦有一枝繫五色麻布以示父愛有節的竹杖，在母喪之際則以母愛無限的苦苓杖爲孝杖。這些孝杖又被稱爲哭杖或哀杖，每著喪服時，即必須手持，一直至除服時

---

<sup>150</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頁 241。

<sup>15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95。

<sup>15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96。

<sup>153</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08。

<sup>154</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94。

<sup>155</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08。

<sup>156</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94。

<sup>157</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15。

<sup>158</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頁 253。

<sup>15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0。

<sup>16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9。

方可燒化，故臺灣諺語「手擲孝杖即知可哀」<sup>161</sup>即勸人必須及時行孝，不要子欲養而親不待。

### （八）其他服飾配件

在不同的時空必須穿著不同的服裝，有時配件也可以襯托身份與地位與衣著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日治時代初期較常見的服裝配飾即有眼鏡一項，當時的眼鏡非一般人購買得起，不僅增添文藝氣息，也是富貴的象徵。當時綠野平疇，能夠遮風避雨處少，再加上無精確的氣象資訊，遠行多帶一把傘，以求有備無患。另外，也有消暑的扇子與行商必備的算盤，這些物品也多以纖維製成，亦有許多結合的俚諺產生。

#### 1.眼鏡

由於升學的壓力，據國民健康署「兒童青少年視力監測調查」統計，臺灣未滿 18 歲者近視率竟高達 85%。<sup>162</sup>百年前醫療不發達，近視是「富貴病」，尤其是昂貴金框、銀緣、玳瑁邊的眼鏡框更非一般人所負擔得起，眼鏡成爲一種炫富的象徵，當時流行「目鏡掛歸旁」<sup>163</sup>諺語，以示炫耀財富。

雖然，二十世紀初始，臺北市電力設施已發達，然而臺灣使用電燈的習慣仍較日本人爲低，<sup>164</sup>甚至不接受電燈等電力產品，<sup>165</sup>以致讀書人焚膏油以繼晷，秉燭夜讀自然爲大近視。若是讀書成近視，詩書滿腹亦能得世人敬重，若是「掛目鏡假名士」，<sup>166</sup>則有徒有其表之譏。

中國眼鏡記載甚早，明末之際即自阿拉伯語（alunwainat）音譯爲「鬘隸」一詞，流行於沿海地區。當時小說中常有名士戴著中國式眼鏡的形

<sup>16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6。

<sup>162</sup> 經濟日報：〈臺灣兒童近視比率列世界第一眼睛保健成課題〉，檢自：<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800/7609086>，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23 日。

<sup>16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7。

<sup>164</sup> 不著撰人：〈電燈之事〉，《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05 年 9 月 8 日）。

<sup>165</sup> 不著撰人：〈電燈購買之拒絕〉，《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06 年 5 月 30 日）。

<sup>16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2。

象，<sup>167</sup>眼鏡配戴必須驗光，並非信手捻來即可配戴，若未近視者，長期戴著厚重的鏡片容易頭昏眼花，故有「廣東目鏡在人合目」<sup>168</sup>、「蘇州目鏡在人合目」<sup>169</sup>等諺語。由於眼鏡代表身分與排場，也有許多戴眼鏡者，行假名士真詐騙的行為，<sup>170</sup>欺瞞無知者的錢財與愛情。

## 2. 傘

雨傘是日常可見的生活用品，昔時出外行商除了準備必須的衣物外，亦必須攜帶傘。橋梁、津渡水岸正是風雨匯聚之處，古人也常提醒「過橋合雨傘」。<sup>171</sup>除了擋雨功能外，亦可充作遮陽之用，「傍人涼傘影」<sup>172</sup>即有貪小便宜之喻。若有人不知節制，隨意展現才華，則會遭「破雨傘興展」<sup>173</sup>之譏。

除實用價值外，「傘」字為傘形撐著四個人寓有多子多孫之意故嫁女之時需備二把傘當作嫁妝。男子十六歲的成年禮上，父母也要送他一對紙傘，因紙與子同意，送給兒子表示成年。<sup>174</sup>傘與「閃」同意，可令眾妖魔鬼怪見傘即閃，再加上張開後呈圓形，亦有圓滿吉祥之意，故有趨吉避凶之效果。

一般紙傘的的傘骨以孟宗竹製成、傘柄以箭竹為材料、用棉紙做傘，而傘頭則用棉布製成。製作過程包含有削傘骨、繞線、裱紙、上柿子水、收傘、曬傘、繪傘面、裝傘柄、上桐油、釘布頭、纏柄，最後穿內線，

---

<sup>167</sup> 雲：〈寶藏院名槍（第二十回）／點靜一為主口高人莽兵衛中途逢神相〉，《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8 月 11 日）、不著撰人：〈變記（上）〉，《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1 月 21 日）。

<sup>16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2。

<sup>16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5。

<sup>170</sup> 不著撰人：〈騙局一新〉，《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6 年 1 月 25 日）、不著撰人：〈花柳光棍〉，《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7 年 6 月 1 日）、不著撰人：〈歡喜冤家〉，《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9 月 12 日）。

<sup>17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94。

<sup>17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0。

<sup>17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0。

<sup>174</sup> 梁丞文：《臺灣民俗大觀》，頁 179。

過程相當繁複，且完全以手工製作，每個熟練工人一天平均只能製作二把傘。<sup>175</sup>日本諺語亦有「千兩の擔保に編傘一蓋」<sup>176</sup>形容其得之不易。時人常以「牽厖仔補雨傘」比喻善於捭闔縱橫、穿說遊說者，多人分工努力以赴下方能製成一把傘，何況牽著厖仔來補雨傘？在其花言巧語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才是令人痛惱者。

### 3. 扇子及算盤

臺灣雖然改隸，殖民政府卻對臺灣民衆的衣服未加以強制要求易服，以致服飾穿著大致如甲午前。當時讀書人所穿之衣衫較長，衣衫上有時再加上短掛，短掛沒有袖子，前片在左下腰與後身衣片有兩處釘縫，其餘則以扣子扣合。<sup>177</sup>待 1910 年代，男子陸續剪辮方有長袍搭西褲、棉襖搭圍巾、馬褂搭皮鞋的裝扮，<sup>178</sup>在傳統漢式服裝裡「混搭」一些西洋風格。

傳統漢服於不透氣，故扇子也是傳統知識必備的飾品之一，扇面上常題詩、繪畫，以顯才華。士大夫常以「破扇引清風」<sup>179</sup>自嘲，寒士亦常以「風涼休用扇，無事省相過」<sup>180</sup>來自勉。由於扇子持有者多為仕紳階級的服飾配件，仕紳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或頭人，常為民衆排憂解難。若非如是，反而魚肉鄰里，民諺則以「扇頭打人不能痛情意不該」<sup>181</sup>、「扇頭打人沒痛意思不該」<sup>182</sup>有恃強凌弱之意，非讀書人之行徑。

在無電子計算機的時代，最能夠計數者，莫過於算盤。臺灣店家、商號櫃臺皆有一算盤置於案上，以利計算。算盤多為商人所持，甚至成

<sup>175</sup> 張志遠：《臺灣的工藝》，頁 140。

<sup>176</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89。

<sup>177</sup> 梁丞文：《臺灣民俗大觀》，頁 168。

<sup>178</sup> 臺灣文學工作室：《百年不退流行的臺北文青生活案內帖》（臺北：本事出版，2016 年），頁 35-37。

<sup>17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8。

<sup>18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8。

<sup>181</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208。

<sup>18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4。

為隨身攜帶的配件。商人多精打細算，給予人精明的形象，因此有「算盤吊在頷頸」<sup>183</sup>、「算盤懸在頷頸仔」<sup>184</sup>的形象，另外也有比喻吝嗇、一毛不拔、愛計較的意涵。

## 五、纖維俚諺對當時社會現狀的反應

俚諺為當時民眾的心聲心語，不僅反應當時的社會現狀更是先民智慧的展現。相關的俚諺中可以看到社會的富庶或貧苦，也可以看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更可以看到隨遇而安的心境、勸人應時處事的智慧以及對於公平與正義的普遍價值觀的追求。

### （一）隨遇而安的心境

臺灣先民為移民，橫渡黑水溝、冒險渡臺，即是為了尋找棲身之所，就如同「水流破布」<sup>185</sup>、「流水破布（行きあたりばつたり）」<sup>186</sup>生命如漂萍、浮草般居無定所，故又將句子延伸為「大水流破布流到彼住到彼」<sup>187</sup>、「水流破布流到彼住到彼」<sup>188</sup>面對前來臺灣服務的兩位編者亦是有相同的感觸，亦有人生如寄的心態，因此才會有相似的諺語的選錄。時人多以舊衣破布作為抹布，迥迥間即是茶室等不正當場所，「迥迥間的卓布」<sup>189</sup>則有任人擦拭，引申為任人擺布之意。

南部也有「楠仔坑布店廣安」的相以諺語。高雄楠梓舊名楠梓坑。「坑」在閩南語指小山谷或低窪的小溝谷，兩岸楠木繁茂，因而得名。是鳳山、岡山、旗山三地的交通要衝，更是百貨互貿之所，而有三山歸一坑之說，街市林立。<sup>190</sup>當地流傳民諺「楠仔坑布店廣安」，<sup>191</sup>「廣安」二字即是閩

---

<sup>18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4。

<sup>184</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211。

<sup>18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2。

<sup>186</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76。

<sup>18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2。

<sup>188</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26。

<sup>189</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230。

<sup>190</sup> 曾玉昆：《高雄市地名探源》（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7 年），頁 43。

南語「講安」諧音，喻有安心之意。

臺灣人善用俚諺中藏有許多歇後語，每每都予人會心一笑。在廖漢臣〈地名に關する臺灣の謎語〉也曾錄有「隱龜穿長衫——蔽腳(崁腳)」、「厝頂披衫——衫壓厝(三塊厝)」<sup>192</sup>地名謎語，恰好也都在楠梓附近，可以看出臺灣先民的智慧，也可感受祖先越洋渡海來臺，華路藍縷、啓山林隨遇而安的大度豁達。

## (二) 物資不豐的民間生活

日治初期物資不豐，民眾身無長物，常因為天災或動亂令衣食無著，而瞬時成為乞丐。乞丐的最顯眼的裝扮，莫過於身旁的「茭袋」，這種茭袋多以藺草編而成，全身的行當，即在其中。民諺云：「茭袋流去，管也無路用」<sup>193</sup>袋子付諸東流，就算拿竹管來撈取，亦無法收回。閩南語的「管」與「講」同音，被斥責者的心也就像乞丐般浪跡萍蹤般，居無定所，多費脣舌無益，完全不為所動。

乞丐靠乞食為生，衣衫襤褸，偶能得到好心人的半鉢施食，有什麼就吃什麼，故民諺云：「乞食灶孔濫糝穿」<sup>194</sup>，馬偕曾在中元普渡之際至艋舺感觀看搶孤，對於乞丐爭食的情狀，感到驚駭，爭食的現場就如同地獄般，甚至在回家路上還得擔心懶得與大家到現場搶卻在半路攔截的搶徒，<sup>195</sup>十分危險，一般民眾對於乞丐常懷戒心，直到大正 12 年（1923）臺北市慈善家施乾開始注意到這個社會問題，<sup>196</sup>隨著臺灣經濟好轉，也民眾生活漸次有所改善，乞丐亦日趨減少。

---

<sup>19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61。

<sup>192</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頁 196。

<sup>193</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6。

<sup>19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04。

<sup>195</sup> 陳龍廷：《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書寫：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 年），頁 23。

<sup>196</sup> 不著撰人：〈乞食部落の改善に努力する施乾君〉，《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23 年 10 月 27 日）。

乞丐終日餐風露宿、衣食無著，就算片鞋半縷亦買不起，故又被稱為「赤腳大仙」，若有一天如民間戲曲中的薛平貴般「馬上錦衣回」<sup>197</sup>取得富貴功名，由「大仙到袞龍」<sup>198</sup>又是朝暮之間。從臺灣衣著的諺語，也反應臺灣社會階級並不固化，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機會出人頭地。

### （三）嫁夫

在臺灣色彩有吉凶之分，紅色代表吉慶，<sup>199</sup>傳統婚禮新娘與新郎，要身披紅綢，以示喜慶之意，<sup>200</sup>臺灣西式婚禮始於大正 4 年（1915）元旦，經過約半世紀的時間，臺灣才脫離紅衣禮服，<sup>201</sup>故民諺：「穿紅嫁夫」。<sup>202</sup>臺灣女性的婚服仍延續明朝時向命婦「借服」的習俗，包含被肩、網襖、帶劍裙，<sup>203</sup>臺灣婚服常以響肩替代霞被，外加兩條劍帶，<sup>204</sup>另外，當日穿著的紅靴最後會隨著亡者入棺下葬。

穿戴鳳冠、霞被也是身分上象徵，唯有正室方戴鳳冠、行六禮，妾室則無此隆重的排場。新娘出閣上轎前蓋上紅綢，入花轎內也不能揭去，挑蓋頭是新郎的專利，他人不能染指。<sup>205</sup>臺灣俚諺「請不行單帕仔巾來尅」<sup>206</sup>、「紅燈四轎扛不行單帕仔巾隨人走」<sup>207</sup>比喻備禮周全，客人不賞光，必須三催四請，寓有妄自尊大，不受領受他人好意。

臺灣紡紗事業不發達，除婦女利用農閒以手製織布機製作外，多為

---

<sup>19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1。

<sup>19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9。

<sup>199</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頁 31

<sup>200</sup> 趙宗福、梁家勝：《中國人應知的民俗常識》（臺北：華品文創，2016 年），頁 78。

<sup>201</sup> 陳柔縉：《囍事台灣（經典紀念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23 年），頁 94-95。

<sup>20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609。

<sup>203</sup>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頁 118-119。

<sup>204</sup> 臺灣服飾誌：《福爾摩沙時常圖鑑》（新北：聯經出版社，2022 年），頁 137-140。

<sup>205</sup> 趙宗福、梁家勝：《中國人應知的民俗常識》，頁 88。

<sup>20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35。

<sup>20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51。

進口。<sup>208</sup>臺灣先民卻以紡紗為例，每逢成年女子已達適婚年齡之際尚未出閣，長輩時時告誡：「緊紡無好紗緊嫁無好大姑」<sup>209</sup>、「緊紡無好紗緊嫁無好乾家」<sup>210</sup>寓有慢工出細活之意。當時婦女出嫁必須侍奉翁姑，若遇到不好的婆婆，則必須勞苦終生，也常以「繡毬親手拋」<sup>211</sup>為喻，勸人眼睛必須精挑細選另一伴。然而，當時婚姻講求門當戶對，多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能夠自由戀愛被視為無恥無行，<sup>212</sup>能婚姻自主者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

#### （四）老婆如衣服

傳統社會女性社會地位低落，女性只要有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等七出之條件，都可以構成男方七出休妻的條件，<sup>213</sup>把妻子視若衣服，故民諺云：「妻子似衣服」<sup>214</sup>有些諺語甚至與兄弟、好友相比較，而成爲「兄弟如手足妻子似衣服」<sup>215</sup>的民諺。

當時平均壽命不長，據明治 39 年（1906）統計資料，臺灣男女嬰的零歲平均餘命分別僅有 27.7 歲及 29.0 歲，<sup>216</sup>再加上疾病、生子、意外災害……等因素，夫妻能夠共度白首實屬不易，當時也流傳「死某換新衫」、「有錢死妻換新衫」、「死翁刈韭菜」<sup>217</sup>相近於日本諺語「死ぬもの貧乏」<sup>218</sup>之意。當時鰥寡家中仍有襁褓尚待哺育，畢竟爲了生存，續絃、再蘸在

<sup>208</sup> 梁丞文：《臺灣民俗大觀》，頁 162-163。

<sup>20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51。

<sup>210</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8。

<sup>21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4。

<sup>212</sup> 不著撰人：〈無耻無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5 年 7 月 21 日）、不著撰人：〈學生風紀所關〉第 2 版（1906 年 6 月 21 日）、不著撰人：〈變死二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6 月 14 日）。

<sup>213</sup> 高賢治、馮作民：《臺灣舊慣習俗信仰》，頁 221-222。

<sup>21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56。

<sup>21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62。

<sup>216</sup> 吳聰敏，《台灣經濟四百年》（臺北：春山出版社，2023 年），頁 20。

<sup>21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55。

<sup>218</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86。

當時均屬正常。

日本統治者雖然對於臺灣傳統陋習積極限制與禁止，但對於節孝表彰卻十分熱衷，認為有助於政權的安定。臺灣民間故事多來自中原故地，孟姜女節孝故事也廣為流傳，也將故事轉化為「姜女送寒衣沿路苦風霜」<sup>219</sup>民諺。貞女、節婦受人崇仰，但民間「手巾雙頭濡」<sup>220</sup>一夫多妾、享齊人之福者仍是屢見不鮮，也可見當時顯著存在著男女地位的不平等。

### （五）節儉度日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傳統文化皆以節儉為美德，〈朱子治家格言〉「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sup>221</sup>也納入臺灣諺語之一。臺灣為移民社會，資源有限，先人亦以飲水為例，告誡子弟「食水創棕簑毛溜」。<sup>222</sup>如果有餘物不要輕易丟棄，就如同「破鼓好救月」、「破蓆蓋豬屎」<sup>223</sup>萬事萬物皆有派上用場的時候，千萬別輕易丟棄。

先民開墾不易，衣物多補了又補，故常自嘲「剗狗亦此身，拜醮亦此身」<sup>224</sup>也由於能夠奉行「儉穿得新，儉食得伸」<sup>225</sup>的原則，故才能屢屢在經濟上創造奇蹟。由於自奉儉約，故在採購時也必須貨比三家、多方比較，最怕「東舖裁衣，西舖落價」<sup>226</sup>在品質或價錢上吃虧。雖然節儉是必要但也不能太過吝嗇，若「摸到馬掛無內裙」、「摸到裨仔無手袂」<sup>227</sup>則會造成貽頤笑大方、進退失據。

在物資不豐的時代，必須隨機應變，民諺云：「好心好行無衫可穿」

---

<sup>219</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92。

<sup>22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9。

<sup>221</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599。

<sup>22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8。

<sup>223</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34。

<sup>224</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8。

<sup>225</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175。

<sup>226</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403。

<sup>22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06。

<sup>228</sup>不知通權達變會令自己陷入困境。有時不免會遇到日本諺語「貧乏人有つり無かつたり、食つたり食わなんだり」的境地，也就是「衫長手短」<sup>229</sup>青黃不接之時，屆時就必須善用平時的補綴技術，以「拿長補短」、「截長補短」<sup>230</sup>以審時度勢的妙手來暫度難關。

### （六）謹言慎行

臺灣物產豐饒，日治時期米、糖成爲農業生產大宗，當時尚無貨櫃輪船，爲了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日本，於是鼓勵種植黃麻，以製作麻袋，其中以中部地區種植最廣。明治 38 年（1905）臺灣製麻會社於臺中葫蘆墩（豐原）成立，<sup>231</sup>林獻堂也曾任取締役（社長）。

黃麻取織再織成布袋，布袋容易因縫線脫落或摩擦而造成破洞，如果未瞻前顧後細加觀察，未注易破洞處，則容易造成內容物的傾泄而出，到最後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故「布袋頭携起就行」<sup>232</sup>形容對於事情的真像未能善加思維觀察，而魯莽行事。

另外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亦有「布袋頭携去都走」<sup>233</sup>但如同「臭耳人賢灣話」般，皆有未見全貌而多誚謗之言之意，日本諺語「聾者の早聞き」亦有相似之意，聾者未能得聽，全憑一己想像。《論語·爲政》「言寡尤，行寡悔」、金人緘口，實告知蜚短流長的可怕。

### （七）柴與火

許多技藝都強調熟能生巧，在臺語中也常以「舊柴草快燃火」<sup>234</sup>作爲譬喻，在日語中「焼け木杭火が付き易い」以燒焦的木堆很容易著火來形容，不論是舊柴草或舊木堆皆因久藏而水份蒸發而易燃。另一句「舊

<sup>228</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33。

<sup>229</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45。

<sup>230</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252。

<sup>231</sup> 不著撰人：〈臺灣製麻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05 年 6 月 27 日）。

<sup>232</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11。

<sup>233</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05。

<sup>234</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73。

籃牀好炊粿」形容舊工具順手方便，人也是因為時間的累積令其技藝熟練、可靠。

柴與火的結晶，最有名者莫過於「橫柴夯入灶」。當時的臺灣民眾多能守秩序，但偶然亦會遇到蠻不講理者，則以「橫柴夯入灶」<sup>235</sup>、「雜著賣火炭的，要尋染布的提錢」<sup>236</sup>這兩則在日語俚諺亦有「橫紙破り」、「御門違ひ」相對應。兩則均由片岡巖所收錄，蓋片岡巖服務於臺南地方法院，日日面對民眾的法律申訴案件，對於法理特別敏銳，也將此類諺語收錄。

雖然偶爾會遇到橫柴入灶等不公不義，但也有強調公平、公正的纖維諺語。臺灣四面環海，漁獲豐饒，日治初期沿岸已利用網罟捕魚。據當時報導，每罟多約數千斤或數百斤，六七日間約捕獲十餘萬斤。每每收罟均需要大量的勞力，其計算方法以「倚索分錢」，<sup>237</sup>凡參與者人人有份，以示公平，從俚諺中可以發現臺灣社會深厚人情味的展現。

## 結論

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與平澤丁東《臺灣俚諺集覽》共收錄 176 條與纖維相關的俚諺，其中完全相同的俚諺僅「引針入線」、「加冠禮較多戲身銀」、「無針不引線」、「三寸金蓮」等 4 句，其餘文字多有脫落或變異。臺灣南北相隔不到 500 公里，在兩本書上可看到集體性、口傳性、變異性的民間文學特點，也見證島嶼的活力與創新。臺灣不乏對於服裝史的整理或纖維工藝技術書籍，但多由博物館典藏或由正史進行考證，然而卻無有透由民間文學回歸日治初期的大眾生活之研究，重新審視當時的民間生活。

透過俚諺的傳播與紀錄，可以印證許多歷史現象，日治初期的臺灣纖維工藝技術多為編、染、繡，而且多應用在日常工藝品。蓋當時中、

---

<sup>235</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179。

<sup>236</sup> 《日臺俚諺詳解》，頁 43。

<sup>237</sup> 《臺灣俚諺集覽》，頁 370。

日兩國都進行紡織品貿易戰，兩國都在爭取世界第一，臺灣恰在其中，拜海運發達之便可以得到質佳量多的布匹，故民間也就僅留下「緊紡無好紗緊嫁無好大姑」的俚諺。而臺灣的繩結的運用甚少，至多只是作為衣衫的結紐之用，而非裝飾，多充為動詞中的「結」褲帶、鞋帶的用途，待戰後方有「中國結」的藝術裝飾產生，從俚諺可以探究當時的工藝技法的發展。

在衣著方面，臺灣民眾不好華麗，形制亦顯單調。農業社會，男女都是家庭的勞動力，奔波於農田，為了讓工作更方便，男女多著褲裝，故以「裙」為主的俚諺甚少，反而多為草鞋、斗笠、棕箕……等日常必需品相結合的俚諺。若穿著過於華豔甚至有「猴穿衫變作人」的譏諷，而顯示財富、地位的眼鏡也常被視為華而不實的象徵。先人也透過俚諺傳達待人處事的永恆不變的亙古真理，「食水創棕箕毛溜」勸人要勤儉，「水流破布」教人要隨遇而安，只要能夠腳踏實地，總有一日「大仙到袞龍」，從中也可見到臺灣人民守分務實的本色。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13年）。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1987年）。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8年）。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新北：大家出版，2017年）。

吉田道夫：《臺灣風物情》（臺中：臺日交流聯誼會臺中會，2001年）。

何兆華等：《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漢人織品服飾篇》（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04年）。

吳聰敏：《台灣經濟四百年》（臺北：春山出版社，2023年）。

呂士朋、孟繁超：《草屯鎮誌》（南投：草屯鎮誌編纂委員會，1986年）。

- 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 年）。
- 林川夫：《民俗臺灣（3）》（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 年）。
- 林川夫：《民俗臺灣（一）》（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
- 林川夫：《民俗臺灣（七）》（臺北：武陵出版社，1991 年）。
- 林川夫：《民俗臺灣（五）》（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
-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二輯）》（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 年）。
-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六集）》（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 年）。
- 高世瑜：《中國古代婦女生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
- 高賢治、馮作民：《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1 年）。
- 張志遠：《臺灣的工藝》（臺北：遠足文化，2004 年）。
- 梁丞文：《臺灣民俗大觀》（臺北：大威出版社，1985 年）。
- 連橫：《臺灣語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
- 陳柔縉：《囍事台灣（經典紀念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23 年）。
- 陳景林：《纖維物語——纖維材質的探索與設計》（臺中：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2011 年）。
- 陳龍廷：《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書寫：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 年）。
- 曾玉昆：《高雄市地名探源》（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7 年）。
-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典藏二版）》（臺北：商鼎數位出版社，2014 年）。
- 葉淑貞：《臺灣日治時代的租佃制度》（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 年）。
- 臺灣文學工作室：《百年不退流行的臺北文青生活案內帖》（臺北：本事出版，2016 年）。
- 臺灣服飾誌：《福爾摩沙時常圖鑑》（新北：聯經出版社，2022 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俚諺集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 年）。
- 趙宗福、梁家勝：《中國人應知的民俗常識》（臺北：華品文創，2016 年）。
-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一看就懂臺灣博覽——臺灣產業文化工藝美學全圖解》（臺北：遠足文化，2013 年）。

## 二、報章

不著撰人：〈太甲蓆製の夏帽輸送〉，《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1 年 4 月 27 日）。

不著撰人：〈臺中林投帽の製造〉，《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2 年 12 月 3 日）。

不著撰人：〈臺灣製麻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05 年 6 月 27 日）。

不著撰人：〈無耻無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5 年 7 月 21 日）。

不著撰人：〈電燈之事〉，《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05 年 9 月 8 日）。

不著撰人：〈騙局一新〉，《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6 年 1 月 25 日）。

不著撰人：〈電燈購買之拒絕〉，《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06 年 5 月 30 日）。

不著撰人：〈學生風紀所關〉第 2 版（1906 年 6 月 21 日）。

不著撰人：〈花柳光棍〉，《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7 年 6 月 1 日）。

不著撰人：〈幾釀巨禍〉，《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8 年 4 月 8 日）。

不著撰人：〈失火一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8 年 10 月 3 日）。

不著撰人：〈變記（上）〉，《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1 月 21 日）。

不著撰人：〈變死二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6 月 14 日）。

不著撰人：〈大甲蓆爲本島名産〉，《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11 年 7 月 1 日）。

不著撰人：〈歡喜冤家〉，《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9 月 12 日）。

不著撰人：〈乞食部落の改善に努力する施乾君〉，《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23 年 10 月 27 日）。

雲：〈寶藏院名槍（第二十回）／黠靜一爲主口高人莽兵衛中途逢神相〉，《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8 月 11 日）。

## 三、網路資源

經濟日報：〈臺灣兒童近視比率列世界第一眼睛保健成課題〉，檢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800/7609086>，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23 日。

## 論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漢詩的編纂動機

黃鈴棋\*

### 摘要

朝鮮女性漢詩於明代隨著中朝文化交流密切，經由外派朝鮮的使者中介而傳入中國，在中國文壇引起文人學者們的關注，陸續出現對朝鮮女性漢詩的編選和介紹。而此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朝鮮女性詩人許蘭雪軒的詩文。當時許蘭雪軒的詩文成為中朝文人共同關注的對象，在中朝文學與文化交流中，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除了許蘭雪軒外，其他朝鮮女性詩人被編選和關注的重點和特色為何，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重點。另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時對朝鮮女性詩歌，或說對「女性詩歌」的編選者多為男性。至明末清初時，漸有女性編選者的加入。此一編選者性別的多樣性開展，對朝鮮女性詩文是否呈現出不同的知識體系或價值觀，亦是有待探究的問題。由是本論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聚焦於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文的編纂，從相關文本考察其編纂意圖，觀看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的認識、定位與文本流傳脈絡。

**關鍵詞：**朝鮮女性漢詩、朝鮮女性、明清詩選、明清詩話

---

\*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候選人。

此篇論文曾發表於 2023 年第十五屆通俗與雅正——「越境與跨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羅秀美教授及本刊審查者的寶貴意見，使本文論述更加完整，特此致謝。

## **Motivation for compilation of the Chǒsun Female Han Poetry in Ming-Qing**

Huang Ling-Chi

###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clos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hǒsun, Chǒsun women's Han poetr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envoys sent to Chǒsun. Chǒsun women's Han poetr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so related anthologies and introductions have appeared. The most famous among them is the poetry of the Chǒsun female poet Huo Lanxuxuan. At that time, Huo Lanxuxuan's poems became the object of common attention of Chinese and Chǒsun literati, and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hǒsun. However, except for Huo Lanxuxuan, what features have been selected and focused on other Chǒsun female poets. In addi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most of the compilers of Chǒsun women's poetry and even "women's poetr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ere men.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female editors gradually joined the ranks. The gender diversity of the editors is also a question of whether Chǒsun women's poetry presents different knowledge systems or value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ǒsun women's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examine its compilation intentions, and looks at China's understanding, positioning and text circulation of Chǒsun women's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Chǒsun Female Han Poetry 、 Chǒsun Female 、 Poems Collection in Ming-Qing 、 Shihua in Ming-Qing

## 一、前言

朝鮮女性漢詩於明代隨著中朝文化交流密切，經由外派朝鮮的使者中介而傳入中國，在中國文壇引起文人學者們的關注，陸續出現對朝鮮女性漢詩的選編和介紹，如明代吳明濟與藍芳威皆有《朝鮮詩選》的編選，在搜羅朝鮮漢詩的過程中，便將朝鮮「女性」漢詩一併選入；<sup>1</sup>其後明代鄭文昂《名媛彙詩》、趙世杰《古今女史》<sup>2</sup>等，則是在編選中國歷代女性選集時，把朝鮮女性詩文也納入其中。而此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朝鮮女性詩人許蘭雪軒的詩文。當時許蘭雪軒的詩文成為中朝文人共同關注的對象，在中朝文學與文化交流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其首要原因歸功於其弟許筠，除在吳明濟編纂《朝鮮詩選》時提供大量家姐詩作，並為許蘭雪軒編輯《蘭雪軒集》出版，請朝鮮政治與文壇大家柳成龍作序跋，又請中國出使朝鮮之使者朱之蕃、梁有年為其作〈小引〉及〈題辭〉

---

<sup>1</sup> 祁慶富指出「吳明濟的《朝鮮詩選》開明人搜集、編輯朝鮮詩熱潮之先河。」而藍芳威的《朝鮮詩選》雖在朝鮮李德懋《清脾錄》中被混為一談，但實際上並非同一本書，且藍氏之作晚於吳氏之作。經祁氏統計，吳版收錄朝鮮詩人 112 名，詩作 340 首，其中包括許蘭雪軒、李玉峰、成氏、俞汝舟等 4 位朝鮮女性詩文作品 70 首。詳（明）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解題〉，《朝鮮詩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21、27、28-30。

<sup>2</sup> 鍾惺《名媛詩歸》中收錄許蘭雪軒、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德介氏、權貴妃等 6 位朝鮮女性詩人及其作品，趙世杰《古今女史》所收亦為上述六位，只是詩作數量有些微不同。劉婧指出「趙世杰編撰的《古今女史》幾乎是照搬《名媛詩歸》的朝鮮女性作品。」詳參氏著：〈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東亞人文學》（동아인문학）（大邱：東亞人文學會，2012 年），第二十二輯，頁 243。又魏邦儀在研究明代中晚期女性詩文選集的編纂時，注意到明代後期幾部選集有收錄朝鮮女子詩作的現象，並進行相關數量的統計。詳參魏氏：《論明代中晚期女性詩文選集的編纂》（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95-96。然其誤將金德真納入朝鮮女作家的行列中，金德真實為中國唐代時期新羅王。趙世杰於金德真生平載：「新羅王金真平女也。平卒無子女，嗣立為王。永徽元年，德真大破百濟之眾，遣其弟法敏以聞，德真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引自（明）趙世杰：《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明）崇禎問奇閣刻本），頁 41b。

<sup>3</sup>，由是將家姐著作展示於世人眼前並推向中國。

上述相關研究大體可從兩方面開展：其一為明代朝鮮女性詩文的傳播方面，祁慶富主以研究吳明濟《朝鮮詩選》為主，其中論及該著與朝鮮詩人許筠的關係，並直指「吳明濟是把許蘭雪軒介紹給中國的第一人」，對許蘭雪軒詩流傳起到奠基作用，並且「朝鮮女性文學正式登場，是從《朝鮮詩選》開始的」。<sup>4</sup>廖肇亨則指出朱之藩對晚明朝鮮漢詩乃至許蘭雪軒詩作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影響。<sup>5</sup>可見朝鮮女性漢文在明代的傳播，與中國將領及文臣出使朝鮮息息相關。其二則為明清朝鮮女性詩文的選編、評論與中朝互動，張伯偉關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除論許筠對許蘭雪軒作品的貢獻、梳理明末清初的朝鮮選本，並論及中朝對朝鮮女性詩文的態度、互動與影響。<sup>6</sup>劉婧則針對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進行考察，<sup>7</sup>蒐羅相關詩選、詩話外，將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進行系統梳理<sup>8</sup>。此二人的研究，將朝

<sup>3</sup> 相關研究學界已有完整論述，故不贅述。詳參祁慶富著：〈朝鮮詩選解題〉，《朝鮮詩選校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年），頁22-27。張伯偉：〈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46期（2011年4月），頁8-12。

<sup>4</sup> 引自祁慶富著：〈朝鮮詩選解題〉，頁27。

<sup>5</sup> 詳參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頁53-80。

<sup>6</sup> 張伯偉：〈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頁1-44。

<sup>7</sup> 劉婧博論中有專門對19世紀清人編撰的朝鮮女性詩文作文獻整理及朝鮮女性詩文傳入中國的淵源和過程考察。原文見氏著：《19世紀—20世紀初清人編撰朝鮮漢詩文獻研究》，（首爾：韓國延世大學國語國文系博士論文，2011年）。其後於香港發表〈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收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東方詩話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七屆·上冊》（香港大學，2012年），頁303-338。

<sup>8</sup> 其指出中國明清文人所編選的有關朝鮮女性詩文可分為：明人吳明濟、藍芳威編選《朝鮮詩選》、朱之藩編撰《蘭雪軒集》、清代孫致彌《朝鮮採風錄》此三大系統。並揭示清代張曜孫曾向朝鮮譯官李尙迪索求朝鮮女性詩文，提供朝鮮女性漢詩的流傳更多路徑來源。詳參劉婧：〈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頁237-252。

鮮女性詩文的流傳由明至清，中朝互涉的逐漸開展。另俞士玲以許蘭雪軒為主要研究對象，討論其詩歌文獻問題、文本分析，同時揭示中朝文人學者對其文學、女性、政治道德等批評，是關注許蘭雪軒與朝鮮女性詩文頗具代表性的著作。<sup>9</sup>

儘管學界成果豐富，然而除了許蘭雪軒外，其他朝鮮女性詩人被編選和關注的重點和特色為何，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重點。是否能由相關詩選、詩話的編選、生平紀錄及相關評點，對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建立，有更具體的建構？由是筆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收集觀看明清時期中國相關朝鮮女性詩文的選本，採用文本分析與比較法，著重觀察各選者編選動機、內容和評點的朝鮮女性詩文作品，從中考察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的認識評價、呈現出何種朝鮮女性詩歌的風貌，甚至是當中呈現的性別知識體系及視野。本論將聚焦於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文的編纂，從相關文本考察其編纂意圖，觀看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的認識、定位與文本流傳脈絡。

## 二、歷史意識的展現：中朝關係與中華詩教

中國明、清時期，涉及朝鮮女性詩文作品的書籍頗為多元豐富，就種類而言略可分為三，其一為收錄於專為朝鮮漢詩編選的專書中，如明代吳明濟、藍芳威各有《朝鮮詩選》；其二為中國大型詩集中所收相關作品，如明末清初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朱彝尊《明詩綜》；其三則收錄於中國女性詩選集與詩話中，詩選集如明代鄭文昂《名媛彙詩》、清代季嫻《閩秀詩》，詩話如清代沈善寶《名媛詩話》、雷瑨《閩秀詩話》等。從上述作品中可知，這些作品的編者男女兼有，呈現出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興趣與重視。以下就筆者目前所蒐相關作品的序言及編排方式，梳理明清時期中國對編纂朝鮮女性詩文的目的與態度：關

---

<sup>9</sup> 俞士玲：《性別、身份和文本——朝鮮女性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於朝鮮漢詩最早且完整的選集，首推吳明濟的《朝鮮詩選》。其於自序曰：

丁酉之歲，徐司馬公贊畫出軍東援鮮朝，濟以客從。次歲戊戌季春，涉鴨綠，軍於義州。孟夏，司馬公獵於城南二十里，濟並轡而馳。及坎馬敗，遂辭歸，值雨，休於村舍。有朝鮮李文學者，能詩，解華語，坐與久之，因賦詩相贈。次日，期訪我於龍灣之館，且治漿待之，果如約，遂與醉於杏花之下，復賦詩相贈。於是文學輩稍稍引見，日益盛。<sup>10</sup>

可知其於萬曆 25 年（1597）隨徐觀瀾前往朝鮮，<sup>11</sup>並於隔年（1598）結識李文學，與其有詩作的互動往來。這並非中朝首次文人的詩歌交流，在明代中朝交流頗為頻繁，隨著中國逐漸重視派遣至朝鮮的使者才能，中朝雙方「以文會友」留下許多唱酬詩歌。倪謙即是著名之例，其於正統十四年（1449）12 月以正六品翰林院仕講身份出使朝鮮，在出使朝鮮期間拒絕朝鮮進獻女樂，與朝鮮文臣談論典章制度、詩書禮樂，在朝鮮贏得佳譽，<sup>12</sup>並與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等人唱和，結下真摯情誼。而倪謙在出使回國後，將出使朝鮮期間與眾人所作之詩結成《遼海編》，朝鮮則是將倪謙在朝鮮所作與相關作品收作《庚午皇華集》。此後中朝使者互動多有詩歌往來，如張寧、董越、龔用卿等人在出使朝鮮過程中都有留下詩文記錄，朝鮮亦將中朝文臣之詩集為《皇華集》。<sup>13</sup>可見明代以來，

<sup>10</sup> 吳明濟：〈朝鮮詩選序〉引自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瀋陽：遼寧出版社，1999 年），頁 238。

<sup>11</sup> 《明神宗實錄》載萬曆二十六年（1598）「差兵科給事中徐觀瀾往朝鮮，會勦東征功罪」。引自黃彰建等校刊，《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2 年），卷 323，頁 3b（總頁 6000）。

<sup>12</sup> 參閱衣若芬：〈禮樂與女色：明代文臣出使朝鮮的「卻妓詩」及其影響〉，《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6 期（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5 月），頁 91-113。

<sup>13</sup> 《皇華集》為朝鮮選編中朝文臣酬唱往來的詩歌，倪謙與《皇華集》相關研究可參閱詹杭倫、杜慧月：〈倪謙出使朝鮮與《庚午皇華集》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4 期（2007 年 6 月），頁 55-72。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

中朝關係相當密切且對朝鮮漢詩並不陌生。而自壬辰倭亂（1592-1598）<sup>14</sup>爆發後，中朝關係更爲緊密，明朝認爲「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鬪者比也。以是，知朝鮮爲倭奴必爭之土地，爲中國必不可棄之外藩。」<sup>15</sup>在不能放棄中國外蕃屬地、需保有朝鮮重要戰略交通要道，及確保中國不會被間接侵略的情形下，中國出兵援朝。吳明濟隨徐觀瀾前往朝鮮的目的，即是在此背景下，前往朝鮮協助參戰的文臣。

在與李氏交往互動的過程中，吳明濟認識許多朝鮮文人學士，收集朝鮮漢詩作品漸多，<sup>16</sup>其中許筠的貢獻最盛：「許氏伯仲三人，曰蔚，曰箴，曰筠，以文鳴東海間。蔚、筠皆舉狀元。筠更敏甚，一覽不忘，能誦東詩數百篇。於是濟所積日富，復得其妹氏詩二百篇。」吳明濟透過許筠口述記憶背誦朝鮮文人的漢詩，並於許筠手中得到其姐許蘭雪軒的詩作；又透過「尹判書根壽及諸文學亦多搜殘編，遂盈篋。」在回到中國後，長安文士聞之，「皆願見東海詩人詠及許妹氏遊仙諸篇」，這即是首次朝鮮女性漢詩大量出現於中國文人視域中。其後吳明濟再度前往朝鮮時，託朝鮮議政李德馨搜集諸名人集，「前後所得，自新羅及今朝鮮共百餘家。」<sup>17</sup>此百餘家中，除上述許蘭雪軒外，婷、<sup>18</sup>成氏、俞汝舟、趙

---

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明清文臣出使朝鮮所留下的詩文作品則可參閱殷夢霞、于浩選編：《使朝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sup>14</sup> 壬辰倭亂涉及中、日、韓三方，朝鮮將此戰稱壬辰倭亂，日本稱文祿之役，中國則稱萬曆朝鮮之役。相關研究可參黃麗生：〈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以《明實錄》爲中心〉，《海洋文化學刊》第21期（2016年12月），頁1-37。葉榮萍：《壬辰倭亂時期的明鮮關係（1592-1598）》（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論文，2010年）。

<sup>15</sup>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印：《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宣祖二十六年，卷39，頁46a。

<sup>16</sup> 原文：「因訪東海名士崔致遠諸君集，皆辭：『無有。小國喪亂，君臣越在草莽間幾七載，首領且不保，況於此乎？』然有能憶者，輒書以進，漸至一二百篇。」詳參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頁238。

<sup>17</sup> 以上引文同上註，頁238-239。

瑗妾李氏等其他朝鮮女性漢詩作者，即經此朝鮮詩選的成書，成爲中國對朝鮮女性詩人的認識基調。然在此詩選集中，吳明濟把焦點放在對朝鮮詩文作品的搜羅與認識，而非「性別議題」。因此在編排時未將男女詩人做分類，而是依詩體分類。<sup>19</sup>這種男女詩歌匯集編錄的方式，雖在吳明濟的序言中未明確交代原因，但可從中推知他對朝鮮詩歌選錄標準不以性別爲界，並且對朝鮮女性漢詩亦投以關注的眼光。

又在閱覽刪編的過程中，對於朝鮮文學作品質量兼具的情形不禁感嘆「盛哉！箕子之化也。」續言：

克修箕子之教垂三千百載而不衰。我中國雖婦人女子、三尺之童，莫不聞朝鮮禮義文學之盛。嗟乎！朝鮮有箕子，猶中國有堯舜也。中國言盛治者，莫外乎堯舜；朝鮮言盛治者，莫外乎箕子。……濟觀東國之聲而挹箕子之遺風焉……後之覽者，必於是編而益贊其盛。<sup>20</sup>

此處可留意於吳明濟將朝鮮文學、文化之盛追溯於箕子之教。箕子最早出現於《尚書·洪範》，<sup>21</sup>其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

<sup>18</sup> 婷實際上爲男性，但在明清相關女性詩選集中，有些選者誤將其歸類爲女性。對婷生平考證的現行研究可參考劉婧：〈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頁 307-311。筆者：〈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建構〉，《東亞漢學研究》第 13 號（2023 年 10 月），頁 184-186。又筆者將另行針對明清時期中國編纂的朝鮮女性詩文、詩話內容進一步整理，呈現朝鮮女性漢詩的詩學理論，故此處不贅述。

<sup>19</sup> 吳明濟此種詩歌編輯的分類方式，在明清的詩歌選集中經常可見。陳啓明指出這種依詩體分類的體例，至少可以溯源至高棖《唐詩品彙》。這部作品在明清時期被廣泛閱讀，樹立盛唐詩歌的經典地位，同時以詩歌的美學性質爲關注焦點，開啓編輯詩歌總集的新趨勢。詳參氏著：〈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收錄張宏生、卓清芬主編：《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台北：允辰文化，2022 年），頁 824。

<sup>20</sup> 引自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頁 239。

<sup>21</sup> 屈萬里經考證認爲《洪範》並非出自箕子之筆，是後人述古之作，當作於戰國初年。

子歸，作洪範。」<sup>22</sup>箕子為周武王條說洪範九疇，傳授天地次序，治國大法，<sup>23</sup>被譽為德智兼備的「殷末三仁」，<sup>24</sup>是為中國歷代君王臣民所追慕仿效的聖賢。其後箕子出走朝鮮，<sup>25</sup>教民農事，制定禮法，箕子因而成為朝鮮「化夷為華」文化交流的重要標誌。「箕子朝鮮」政權的確立，使得朝鮮以「小中華」自居，以此示現中朝間歷史、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緊密關聯。此現象在明代中朝使臣往來的詩歌酬唱中，即經常被召喚。<sup>26</sup>許筠在〈朝鮮詩選後序〉中雖將朝鮮始祖追溯檀君，然其後言：「周封太師於朝鮮，教民禮讓，風化之美，與中國稱。」，<sup>27</sup>以此展現對中國文化情感的認同。是以吳明濟在簡短篇幅中多次言及箕子，其意即在讚許朝鮮禮義文學的同時，從中彰顯出中國文教遠播之威望。

而祁慶富揭櫫吳明濟的《朝鮮詩選》對朱彝尊所編《明詩綜》有重

---

然本論主要取尚書洪範記箕子著述的賢德形象，針對此形象與作用進行討論。詳參氏著：《尚書釋義》（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93。

<sup>22</sup>（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初版），頁445。

<sup>23</sup>正義曰：「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446。

<sup>24</sup>《史記·宋微子世家》中太史公引孔子言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可見箕子之德行，受歷代先賢讚揚效法，成為聖賢典範指標。（漢）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宋微子世家第八〉，《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二》（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1633。

<sup>25</sup>《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引自（漢）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宋微子世家第八〉，《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二》，頁1620。

<sup>26</sup>赫權子指出《皇華集》中出現大量的「箕子題詠」，認為此一題材歌詠具紀行、吊古與辭賦外交的作用，且從中體現出外交唱和者的現場感與身分意識。詳參氏著：〈從《皇華集》「箕子題詠」看辭賦的外交功能〉，《東疆學刊》第28卷第3期，2011年7月，頁8-11。而孫衛國揭示箕子朝鮮在韓國的歷史塑造與演變，認為箕子崇拜是朝鮮王朝對於明朝認同及視為中心文化秩序的體現，從中反映出「小中華」的思想核心。詳參氏著：《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出版，2019年）。

<sup>27</sup>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頁401。

大影響，爲其提供朝鮮詩人詩作許多寶貴資料。<sup>28</sup>因此觀其書序，朱彝尊言：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槩著於錄焉。析為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sup>29</sup>

其編選旨趣在於搜羅有明一代之詩，不論男女性別、身份地位、本國外蕃，同時黨錮遺民等較具爭議的人物作品亦會選錄，擇取範圍廣闊，意圖以詩存史。在此以明代爲斷限的綜觀博取視域下，朝鮮詩歌被納入第九十四卷與九十五卷的「屬國」分類中。儘管於《明詩綜》中展現明確的性別意識，因而有閨門、女冠與妓女等專爲女性作者設置的分類，但婷、成氏、俞汝舟妻、許景樊等朝鮮女性漢詩作品，是排列於朝鮮男性作家作品後，一併收錄於九十五卷中。這樣的分類，在錢謙益《列朝詩集》中即可見。<sup>30</sup>錢氏於其序中引孟陽（程嘉燧）言曰：「吾以採詩，子以庀史」，又言：「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皇明，發

<sup>28</sup> 同上註，頁 35-36。

<sup>29</sup> （清）朱彝尊選編：〈序〉，《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

<sup>30</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與朱彝尊《明詩綜》是明代具代表性的兩大詩選，學界經常將其併觀。相關研究可參容庚：〈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嶺南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5-166。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論》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1-29 等。而朱彝尊亦曾於〈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言：「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嘗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可見其編纂《明詩綜》時確實有參看《列朝詩集》，並欲對其缺漏有所增補。原文詳見（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 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559。

揮才調，愚竊有志焉。」，<sup>31</sup>其意在以詩存史，並以詩承載知識、風俗。其甲集至丁集收錄元末文士、元代遺民至崇禎時期的明代文士之作，<sup>32</sup>又特設閩集「將女性詩與僧道及宗室、外國等置於其中」；<sup>33</sup>而婷、趙瑗妾李氏、俞汝舟妻、許妹氏、德介氏等朝鮮女性詩人作品則是輯錄在「外夷」篇中。<sup>34</sup>其後的《明詩綜》在屬國分類中則有高麗、朝鮮、安南、占城、日本等地。朱彝尊言：「高麗、朝鮮，一也。然王氏建國，本名高麗。迨李氏稱藩，始更朝鮮。」，<sup>35</sup>可見朱氏對朝鮮的歷史發展分梳明確，就其原因在於編纂相關內容時，參考大量書籍。其在編纂高麗、朝鮮詩人作品時提到，他參考《朝鮮詩選》、《高麗史》、《東國通鑑》、《東國史略》、《殊域周咨錄》、《皇華集》、《輶軒錄》等文史資料詳加考訂。<sup>36</sup>而梁同書言：「《明詩綜》所采屬國詩人，獨朝鮮為多。」<sup>37</sup>，可見其將朝鮮置於明代的國界框架中，將其定位為藩屬國而猶重之。也從上述的分類與選詩中，看到錢、朱二人兩部詩選集開始對晚明女性詩歌及朝鮮文學的重視，並將朝鮮女性詩歌納入域外文學的歸類中看待。

---

<sup>31</sup>（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序〉，《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

<sup>32</sup>詳參徐隆垚：〈《列朝詩集》編纂體例考——兼及作者意圖之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六十期（2022年3月），頁1-50。

<sup>33</sup>陳廣宏：〈《列朝詩集》閩集「香奩」撰集考〉，《中國語文學誌》（중국어문학지）第39輯，頁25-26。

<sup>34</sup>其外夷篇另收滇南、日本、交趾、安南使臣、占城等國。

<sup>35</sup>（清）朱彝尊：《明詩綜》，頁4403。

<sup>36</sup>原文詳參同上註。據袁成研究指出在朱彝尊《明詩綜》中有朝鮮詩人徐敬德《花潭集》的蹤跡，這對《花潭集》的在中國的流傳及文獻內容保存有一定的幫助。詳參氏著：〈從徐敬德《花潭集》看中韓文獻交流〉，《東亞漢學研究》第10號，頁314-324。由此可見朱彝尊的《明詩綜》是當時中國人認識朝鮮文學的重要材料。

<sup>37</sup>（清）梁同書：〈跋朝鮮朴齊家字脩其題陳簡莊尚友圖贊後〉，《頻羅庵遺集》（仁和陸貞一刊本），卷十三，頁7b。

### 三、男性編輯的凝視：朝鮮女性漢詩的編排與來源承續

除上述作品外，其他對朝鮮女性詩文選錄的書籍，亦不乏標舉朝鮮爲屬國，及追溯箕子文教以彰中國聲教者。然其中更值得留意的，即是這類書籍是以關注女性的角度出發，從中搜羅、品評女性詩歌者。回觀吳明濟《朝鮮詩選》在中國能引起關注，除了當時正值壬辰倭亂中朝關係緊密，藉由此部詩選集可滿足中國對朝鮮的好奇與認識外，其中具有相當質量的朝鮮女性漢詩引起中國文壇的重視，恰好呼應明代才女輩出的時代背景。胡文楷於〈歷代婦女著作考序〉言：「考婦女著作，《隋志》所載，大都亡佚。唐宋二代，如武皇后、魚玄機、薛濤、花蕊夫人、楊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明史·藝文志》所著錄者，僅三十餘家，其未著錄者，見於王西樵《宮閨氏籍藝文考略》所載甚多；均目見其集，足以徵信。清代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sup>38</sup>以此觀婦女著作的發展情形可知，中國歷代不乏女性作家，但直到明代婦女作家與作品的記載保存才迅速增加。明代隨著經濟繁榮與印刷文化的發展，婦女閨秀得以有更多機會接受教育、閱讀書籍，進而創作。<sup>39</sup>女性作家的湧現，使時人關注女性的才華，如鄭文昂《名媛彙詩》中即展現時人對女性才學的標舉與重視，如余文龍《名媛彙詩·序》言：「天地生才，不專於七尺丈夫，凡芳閨淑秀，均得萃間值之靈穎，以織閭閣之文章，寧是葛覃卷耳，為千古閨韻絕倡。」<sup>40</sup>張正岳〈題古今名媛彙詩〉亦言：「學而可能，何獨疑於女子；而力之所至，亦豈讓於丈夫。」<sup>41</sup>兩人將男女兩

<sup>38</sup> 胡文楷：〈自序〉，《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頁1。

<sup>39</sup> 相關研究參閱（美）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出版社，2004年）。

<sup>40</sup> （明）鄭文昂：余文龍〈序〉，《名媛彙詩》（泰昌元年張正岳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8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1a。

<sup>41</sup> 同上註，〈張序〉，頁1b。

性併觀，突出女性才學。

而特重才學的詩歌審美觀，又展現在《名媛彙詩》的詩歌編排方式中，其言：「但憑文辭之佳麗，不論德行之貞淫，稽之往古，迄于昭代，凡宮閨閭巷、鬼怪神仙、女冠倡妓、婢妾之屬，皆為平等，不定品格、不立高低，但以五七言、古今體分為門類。因時代之後先，為姓氏之次第」，<sup>42</sup>詩集將各類女性一視同仁，以詩類分類。在其泰昌元年張正岳刻本中的總目顯示，其將詩依序分類為古歌、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詞、迴文圖、賦、尺牘等十一類，又各類依時代先後將詩人詩作排序羅列。可見其彌平性別差異外，也將身份階級的差異消除，將重點擺在詩作才學上。然而特有區分的是在此中國女性詩選集中，朝鮮女性漢詩作品亦收羅其中，並在各類的末尾特以「朝鮮女子」標註，可見鄭氏將朝鮮女性漢詩視為中國的「域外文學」。雖有地區性的差別，但在重視女性才學的選錄原則下，仍將朝鮮女性漢詩選錄；同時，鄭文昂並未編選其他屬國的女性詩文，由此可知當時朝鮮詩文，尤其朝鮮女性詩人作品在中國具一定流傳與知名度。又張氏刻本中於目錄後錄有《古今名媛姓氏字里詳節》，在卷末朝鮮女子類中收錄許景樊、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妓德介氏、權貴妃等六人。對比其他中國女性詩人的生平事蹟詳加介紹，朝鮮女子中僅許景樊有簡介，<sup>43</sup>權貴妃下註「高麗人」外，其他朝鮮女詩人均無介紹，這自然符合其於〈凡例〉所言：「一姓氏下並詳世系字里，出處其無可考者，闕而不書；其見史傳者，省而不書。」<sup>44</sup>然也顯示在中國文壇中，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事蹟理解資源有限的事實。

鄭文昂《名媛彙詩》的編纂給後來的女性詩文集選編提供了重要參

---

<sup>42</sup> 同上註，〈凡例〉，頁 1a。

<sup>43</sup> （明）趙世杰：《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其兄許筠狀元，次許蔚正郎。樊時新寡，才名與兄並著。」

<sup>44</sup> （明）鄭文昂：《名媛彙詩》，〈凡例〉，頁 2a-2b。

考，如鍾惺《名媛詩歸》、趙世杰《古今女史》等皆然，均是在其基礎上擴大編選內容。<sup>45</sup>《名媛詩歸》編排方式是按朝代順序編排，卷二十九「明五」全收許景樊詩、卷三十「明六」則收朝鮮女性詩人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權貴妃、德介氏等詩作；趙氏《古今女史》的編排方式則循《名媛彙詩》的體例按詩體編排。此兩部詩選集在目錄上並未特標「朝鮮女子」，僅於詩中小序的生平介紹中顯示詩人屬國；並且此兩部作品對朝鮮女性詩作有簡單的詩評。可見朝鮮女性詩文被收錄於中國女性詩選集中已是常見現象，並有多種編排面貌，且會對相關詩作進行品評。又這樣的男性視角下，女性詩選集的編選被注入男性建構女性與詩史的眼光。陳廣宏即揭示晚明士人通過采輯女性文學作品，以鑑賞心態張揚女性特質，強調其在審美、尚情的才性。通過對女性才情的認同，為男性本身才情至上的個體文化價值尋找合法性。<sup>46</sup>而這樣的男性編輯審美，可謂也欲從才女文化中展現家族文化與資產的豐厚底蘊，<sup>47</sup>甚至是藉以呈現中國強盛的詩教傳統。<sup>48</sup>

<sup>45</sup> 陳廣宏指出《名媛詩歸》無論選詩或作傳，實多有因襲《名媛彙詩》處，在該著基礎上擴大收錄範圍，並施以評點，以迎合時好的商業化操作之嫌。詳參氏著：〈《列朝詩集》閩集「香奩」撰集考〉，頁 19。而《古今女史》以詩類分類編排女性詩文，並有《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從其體例亦可見參考《名媛彙詩》的痕跡。

<sup>46</sup> 整理自陳廣宏：〈中晚明女性詩歌總集編刊宗旨及選錄標準的文化解讀〉，頁 733。有關朝鮮女性漢詩的相關詩評筆者將另闢一文建構朝鮮女性漢詩的詩學理論。

<sup>47</sup> 高彥頤揭示家刻將家庭文化資本轉化為聲望甚至商業利益手段，是作為家庭財富和文化成就的象徵，同時也影響女性讀者和作家，將女性才華融入家庭文化資本中，便會促使女性文化教育及對女性作家有鎖推助。詳參（美）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 40-41。由此，從才女文化中展現男性／家族實力，再由家族勢力推廣至國家國力。

<sup>48</sup> 方秀潔指出男性編者與女性編者在文集輯選中迥然有異之處在於選詩入集的編年時限——男性文選集者傾向無所不包，追溯歷史長河；女性編纂閩秀選集則偏好關注與他們生活同代的女性詩選，為當代才媛留足空間。詳參（加）方秀潔（Grace S. Fong）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與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 年），頁 162。而朝鮮女性漢詩就在這樣無所不包的選擇標準中被納入，以此呈現中國詩教乃至政教的昌盛遼闊。

有別於晚明欲以詩歌或為女性撰史的嚴肅寫作目的，<sup>49</sup>至清代男性對女性作品集的編選與評論仍在持續進行，但編選態度則較為輕鬆，如劉云份編《名媛詩選翠樓集》特輯明代女詩人的詩歌，其序言：「有明三百年間，閨閣琅函，幾成瀚海。讀之有令人心動者，因輯為一書，名曰《翠樓集》。正想其春日凝粧，新愁不解，誰與傳也。握是編者，寧老死於溫柔鄉耶？抑直取封侯臥河場而不作兒女子態耶？」<sup>50</sup>突出關注明代女性作品繁多及女性書寫筆下的豐沛「情感」。在編排方面較無體例，<sup>51</sup>朝鮮女性詩人作品雖集中羅列，但前後皆有其他中國女性詩人。其中，許景樊詩共收二十五首，其個別詩人所收作品數量是僅次於沈宜修四十首、葉小鸞三十六首的女作家，可見至清代許景樊的作品仍是詩壇熱點，持續受到關注。其他選錄朝鮮女性作家為李淑媛、成氏、汝舟妻、權貴妃與德介氏，並無新的文獻加入。又如晚清雷瑨、雷瑛以自身病時的娛樂消遣為出發點編輯《閩秀詩話》，在翻看各家詩文隨筆時，特將女性個別詩句、詩作或專輯等作品輯錄。其中「有僅具姓名者，亦有遺聞逸事，足資談柄者。」<sup>52</sup>其搜羅廣泛可見一斑。王英志在論及《閩秀詩話》特色時指出其力求全面展示女性詩歌創作的風貌，作者還特別選錄「邊疆或少數民族地區的女詩人，對八旗婦女的創作予以專述，又特別輯錄了朝鮮

---

<sup>49</sup> 如張正岳〈題古今名媛彙詩〉「倣述作于仲尼，效纂編之蕭統，乃搜自昔以迄于今。幽而求諸鬼魅神仙，廣而集諸青樓委巷。削其瑕類，錄其精妍。」、趙世杰〈古今女史序〉言對女性文學：「無不徧加搜輯，以備古今之闕……異日有修彤史者，不至揣摩人于寤寐中，而取之縑緗，已振騷雅之遺音。則涵洪併織，而無所不具足，故亦名之曰史。」、胡文楷：〈附錄〉，《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46。

<sup>50</sup> （清）劉云份編：〈序〉，《翠樓集》（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野香堂刻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95，頁 1b。

<sup>51</sup> （清）宗元鼎：〈翠樓集序〉言：「集中所載倫類，未嘗分署。」引自（清）劉云份編：《翠樓集》，〈翠樓集序〉，頁 6a。

<sup>52</sup> 原文詳參（清）雷瑨、雷瑛編：《閩秀詩話》，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871-872。

與日本女性創作的漢詩。」<sup>53</sup>可見作者以詩歌展現中國的地理、政治觀，從中將朝鮮納入中國的版圖。其「卷十六」末尾輯錄朝鮮公主、朝鮮權貴妃、許景樊、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海月等關於朝鮮女性漢詩作者與作品的詩話，劉媵指出通過此書引用的朝鮮女性詩歌，可以了解朝鮮女性詩歌在中國流傳至 20 世紀初的狀況，以及中國作家如何接觸朝鮮女性詩歌。然在編選朝鮮女性漢詩的同時，也將前人錯誤的內容持續引用。<sup>54</sup>誠如上述，《閩秀詩話》在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輯錄中，可見其使用如孫致彌《采風錄》、惲珍浦《閩秀正始集》、尤侗《朝鮮竹枝詞》、陸次雲《繹史紀餘》等多種材料，由此可見由明至清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討論只增不減。又其對前人材料的引用雖有延續誤用之處，然亦有新內容如俞汝舟妻在明代選集中尚不見其姓名，但經參考孫致彌《采風錄》、<sup>55</sup>惲珠《閩秀正始集》<sup>56</sup>之作，於此處即標示「海月」之名。<sup>57</sup>

<sup>53</sup> 同上註，頁 868。

<sup>54</sup> 詳參劉媵：〈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頁 325-328。

<sup>55</sup> 孫致彌的《采風錄》在清代涉及朝鮮女性詩文的作品中，是常被參考引用的文獻。如惲珠《閩秀正始集》、徐振《朝鮮竹枝詞》四十之三十三。下注云「孫愷似檢討曾陪使朝鮮，手編采風集，載東國士女歌詩，有婷婷公主避暑詩。」雷夢水、潘超等主編：《中華竹枝詞》第六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4183-4189。等都可看到，然此文獻全本現已不傳。劉媵在考訂明清時期傳入中國的朝鮮女性詩文以及中國文人編選的相關選本和歷史發展進程中，即把孫氏此作歸納為明清文人參考的第三系統。詳參氏著：〈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頁 245。

<sup>56</sup> 《國朝閩秀正始集·卷六·附錄》海月條下小注「朝鮮人，俞汝舟室。」錄有〈貧女吟〉一首。此為筆者目前見中國最早將俞汝舟妻標示其名「海月」之人。這樣的認識，可能是參考自孫致彌《采風錄》。引文見（清）完顏惲珠：〈附錄〉，《國朝閩秀正始集》（紅香館藏版），道光辛卯（1831）鐫，卷六，頁 21 下。又曼素恩指出《國朝閩秀正始集》由惲珠三名孫女伊蘭保、金粟保、妙蓮保共同編輯完成。詳參（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新店：左岸文化出版，2005 年），頁 208、246。

<sup>57</sup> （清）雷瑨、雷瑛編：《閩秀詩話》，頁 1402。

#### 四、女性自覺的生發：女性詩學的生成與朝鮮女性詩文保存

在男性編輯視域下的朝鮮女性漢詩或以展現女性才學、情感的全貌觀而廣加搜羅，又或作為資談消遣、地理知識圖象而紛繁呈現於中國女性詩歌的版圖中。而在明清關注女性之際，女性本身的性別意識及才學也逐漸顯露，是以同時加入女性詩集、詩話編纂的工作。又以女性角度出發，藉由對文學的編輯、評論，女性得以為自我發聲，如清代季嫻〈閨秀集序〉開篇就言：「夫女子何不幸？而錦泊米鹽，才湮鍼線。偶效簪花詠絮，而腐儒瞠目相禁止曰：『閨中人。閨中人也，即有良姝，自拔常格亦鳳毛麟角。每希親見，見或淹沒不傳者多矣。』」<sup>58</sup>有別於男性編者著重關注女性才學，季嫻直指中國古代女性的困頓，哀嘆女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被閨閣主內、無才是德的性別刻板映像束縛，雖有才調作品卻難以保存流傳；又在其閱讀經驗中猶喜閨閣中詩，是以「手錄一編，遴其尤者」、「用自怡悅兼勸女媭」，其中雖有娛樂消遣性質，但更重要的是她企圖藉由編選詩作，作為女兒學習詩歌的範本。既承擔起教育女性閱讀創作的責任，同時也以此為女性詩作加以保存，是以「強付劄氏」，<sup>59</sup>成為「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sup>60</sup>而在其〈閨秀集選例〉言：「自景德以後，風雅一道浸遍閨閣，至萬曆而盛矣。啓禎以來，繼響不絕，若徐小淑之七言長篇，吳冰蟾、陸卿子之五言，許蘭雪軒之七律。近日李是菴之五律，以迨沈項諸媛，桐城雙節，溫潤和平，皆是以方駕三唐，誠巾幗偉觀也。故所選稍溢。」<sup>61</sup>季嫻僅用簡單幾句便概括女性詩歌的發展，逕直將朝鮮女詩人許蘭雪軒與徐媛、吳冰蟾、陸卿子等中國女詩人並列，並標舉桐城復古詩風作為選詩標準，足見許蘭雪軒在中國閨秀詩壇的影響

<sup>58</sup>（清）季嫻：〈閨秀集·自序〉，《閨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14，卷首，頁 330。

<sup>59</sup> 同上註，頁 330-331。

<sup>60</sup> 詳參陳啓明：〈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頁 818-839。

<sup>61</sup>（清）季嫻：〈閨秀集·自序〉，《閨秀集》，頁 331。

力與特出地位；<sup>62</sup>同時也展現季嫻頗有見地的詩歌視野與建立女性詩學的意圖。經由詩歌的編選與評價，季嫻得以展現女性詩歌的面貌與特質，並與當時的詩壇進行對話。

其後的惲珠也藉由《國朝閩秀正始集》的選編為女性發聲，並且更進一步的展現女性如何藉由詩歌的選編與文、政壇對話。其在〈弁言〉中指出「昔孔子刪《詩》，不廢閨房之作。後世鄉先生每謂女子職司酒漿、縫紉而已。不知《周禮》酒嬪掌婦學之法，婦德之下繼以婦言。言固非辭章之謂要，不離乎辭章者，近是則女子學詩，庸何傷乎？」以女性身份直接對傳統觀念提出質疑，將女性文學作品上溯至《詩經》，並以學詩作為學習德性與言論的重要管道。又感於「閩中傳作較鮮，針黹之餘，偶得名媛各集，輒手錄一二。」然女性婚後忙於妻子、母親等多重身份「經理米鹽，遂棄筆墨」，道出女性創作之艱困不易。而其編輯女性詩集的工作在婚後中斷數年，後得兒子麟慶幫助搜羅編輯及閩秀同儕投贈作品下編成是書。<sup>63</sup>其〈例言〉指出其選詩有十分之四取自王端淑《名媛詩緯》，其他女性詩文「皆隨時采擇，積久成多」。又其搜羅的女性詩文涉及地域範圍遼闊，「滇黔川粵均不乏人，且有蒙古命婦、哈密才媛、土司女士、海濱漁婦，末卷又附載朝鮮國四人，更足徵聖朝文教昌明，聲教所訖無遠弗屆，此內吐司、哈密均隸版圖，故散載各卷。朝鮮雖自天聰年間，即奉正朔，究係屬國故歸。」<sup>64</sup>此處明白展現其中國地理觀，其將蒙古、哈密及偏遠地帶明確劃入中國版圖，因此在編選詩作時將作品分散在各卷中；朝鮮則是中國屬國因而載於附錄中，以此呼應其附庸性質。此乃在關注異域及偏遠地區女性詩文的同時，所展現中國文教昌盛、聲

<sup>62</sup> 許蘭雪軒之作品被季嫻大量收錄的原因在於其詩歌中有大量對中國詩歌與文學典故的化用，符合季嫻以復古選心的標準。可參陳啓明：〈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閩秀集》〉、俞士玲：《性別、身份和文本——朝鮮女性文學文獻研究》等相關研究。

<sup>63</sup> （清）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弁言〉，頁 1a-1b。

<sup>64</sup> （清）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凡例〉，頁 3a-4b。

名遠播的優越自信，呼應《國朝閩秀正始集》之名，欲藉此詩歌的編選廓清中國地理疆界，並從中建構女性溫柔敦厚的詩學傳統。<sup>65</sup>有趣的是，惲珠的輯錄例言第一則便提到：「一是集皆輯我朝閩秀所著，其前朝者蓋不刊入。」<sup>66</sup>然其所錄婷、李淑媛、海月、許景燮等四位朝鮮女詩人，均為明代時期已有之人。可見清代文壇雖對朝鮮女性漢詩仍有關注，但在資訊有限的情形下經常誤錄。又或雖知曉為前朝作品，但以域外女性作家來說仍具代表性，因此借用。

另從沈善寶《名媛詩話》中也可一窺清代女性編者的編纂意圖，其言：

自南宋以來，各家詩話中多載閩秀詩，然蒐采簡畧，備體而已。……竊思閩秀之學與文士不同，而閩秀之傳又較文士不易。蓋文士自幼即肄習經史，旁及詩賦，有父兄教誨，師友討論。閩秀則既無文士之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絕倫者，萬不能詩。生於名門巨族，遇父兄師友知詩者，傳揚尚易。倘生於蓬華、嫁於村俗，則湮沒無聞者，不知凡幾。余有深感焉，故不辭摭拾蒐輯而為是編。<sup>67</sup>

此中將男女兩性同論，感嘆女性創作及詩文傳承之不易來自於男女學習資源不對等、傳統社會兩性觀對女性束縛及女性自身貴賤知遇的生平遭遇等原因。這樣深有同感的女性自覺，使其自編女性詩話為女性文

---

<sup>65</sup> 曼素恩指出《國朝閩秀正始集》企圖總結婦女在清代前期的偉大成就。詳參氏著、楊雅婷譯：《蘭閩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頁 208。羅秀美則指出《正始集》的編選標準在標舉女子學詩作詩雅正及溫柔敦厚的特質。氏著：〈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漢學研究》第 32 集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211。而宋清秀則指出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在清代積累成為閩秀詩學的基本規範。詳參氏著：〈清代閩秀詩學觀念論析〉，《文學遺產》2014 年第 5 期，頁 114。

<sup>66</sup> （清）惲珠：〈例言〉，《國朝閩秀正始集》，頁 1a。

<sup>67</sup>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清光緒鴻雪樓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 17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1，頁 1a-2b。

學作品的保存盡心力。其序言：「特後世詩教不明，工風雲越露之詞，失興觀羣怨之義。而閨閣能此者日少，實於風俗人心所關非淺，況徵詩閨閣極難，或祕不示人，或遠莫能致……十二卷中所載信乎，得必有言，性情之章，修齊之助也。學問之什，陶淑之原也。」<sup>68</sup>沈氏以「詩教德性」的選詩原則與期許對女性詩文進行編纂。而其對朝鮮女性詩文的編選是錄於第十二卷卷末，言：「朝鮮為古箕子之國，禮樂文章聞與中華不甚懸殊。閨秀能詩文者亦眾。」<sup>69</sup>從其編排方式以及將朝鮮特別標舉箕子國看，可見其亦是有意識的將朝鮮視為中國屬國；又強調朝鮮禮樂文化及女性創作的興盛，呼應其重視詩教及保存女性作品的意圖。而在朝鮮諸作中沈氏除輯錄婷、許蘭雪軒、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室外，另有李天香（桂生）及賈曇雲（瓊花）兩位新的朝鮮女性詩人與詩作加入。雖李天香《梅窗集》與賈曇雲的《風絮亭小稿》目前尚未能考證沈善寶是從何處得到相關材料，<sup>70</sup>但可知在清代當時確有相關文本流傳中國。

## 五、結語

總上，以吳明濟《朝鮮詩選》作為開展，可知明代藉由中朝文人使者的頻繁往來，中國開始對朝鮮文學，甚至是朝鮮女性文學有更近一步的關注。除有《朝鮮詩選》的專輯出現，在大型的明代詩集如朱彝尊《明詩綜》也會專闢一隅予朝鮮詩人，展現中朝文學、文化關係的緊密，也藉此強調中國詩教的昌盛。而在這兩部詩選總集中，朝鮮女性漢詩都有

<sup>68</sup>（清）沈善寶：〈序言〉，《名媛詩話》，頁 1b-2a。

<sup>69</sup>（清）沈善寶：《名媛詩話》，卷 12，頁 24a。

<sup>70</sup>張伯偉指出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中尚有數種知其名而未見其書者，沈善寶《名媛詩話》中提及的賈曇雲（瓊花）《風絮亭小稿》及為待考書目。詳參氏著：〈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頁 5。劉婧則在經文獻爬梳後指出沈善寶對李天香的詩文作品來源尚不清楚，但在清代已經流入中國，沈善寶則「以自己的方式去及整裡朝鮮女性作家的詩文資料」。相關考證詳參氏著：〈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頁 322-324。而筆者依沈善寶《名媛詩話》前的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收集編纂的相關文獻，目前亦未見李桂生與賈曇雲的相關作品。

被選錄。這既是源自許筠在吳明濟搜編《朝鮮詩選》時，提供家姐許蘭雪軒詩所帶起的對朝鮮女性漢詩的關注風潮；同時也經由對朝鮮漢詩的收集，有更多朝鮮女性作家作品得以被認識。

其後隨著明末清初對女性的關注，女性詩選及詩話大量出現，朝鮮女性漢詩乘此風潮持續被輯錄，以多種編排面貌呈現，如鄭文昂《名媛彙詩》與鍾惺《名媛詩緯》，傳承前賢編錄詩選集的方式，奠定依詩體排列及依時代先後的女性詩集編排方式；然對朝鮮女性作家的生平與詩作的認識及來源有限，被編選的詩作重複性高，且錯處經常被承接。而在男性編選女性詩歌無所不包的選取視角中，朝鮮女性漢詩的收錄也藉此強化才女文化的廣布與中國版圖的遼闊。

又隨著女性自我意識抬頭，女性有意識加入編集女性作品的行列，以此保存流傳不易的女性詩作。在廣泛蒐羅及保存女性作品的意圖中，朝鮮女性詩人作品持續被女性編纂者納入，從中強調詩教與女性才德，以此建立女性詩學的特色。又經由中國女性對朝鮮女性詩歌的關注與選編，使女性得以藉文學力量對教育、詩壇甚至政治等公領域有所觸及，延伸女性的力量。本論由於篇幅考量，目前僅就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和詩的編纂動機與認識作上述討論。未來則欲更進一步歸納明清時期涉及朝鮮女性詩文的文本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建構、編選詩歌內容與詩話評價為何，試圖從中建立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詩學理論。

## 引用文獻

### 一、傳統文獻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初版。

（漢）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二》，（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

（明）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明)鄭文昂：《名媛彙詩》(泰昌元年張正岳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8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明)趙世杰：《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明)崇禎問奇閣刻本)。

(清)季嫻：《閩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14。

(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清)劉云份編：《翠樓集》(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野香堂刻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95。

(清)朱彝尊選編：《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 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清)梁同書：《頻羅庵遺集》(仁和陸貞一刊本)。

(清)完顏憚珠：《國朝閩秀正始集》(紅香館藏版)，道光辛卯(1831)鐫。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清光緒鴻雪樓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 17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雷瑨、雷城編：《閩秀詩話》，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 4 月)。

## 二、近人著作

衣若芬：〈禮樂與女色：明代文臣出使朝鮮的「卻妓詩」及其影響〉，《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6 期(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5 月)，頁 91-113。

宋清秀：〈清代閩秀詩學觀念論析〉，《文學遺產》第 5 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14。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 屈萬里：《尚書釋義》，（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 年）。
- 俞士玲：《性別、身份和文本——朝鮮女性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年）。
- 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出版，2019 年）。
- 容庚：〈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嶺南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5-166。
- 徐隆垚：〈《列朝詩集》編纂體例考——兼及作者意圖之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六十期（2022 年 3 月），頁 1-50。
- 殷夢霞、于浩選編：《使朝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
- 袁成：〈從徐敬德《花潭集》看中韓文獻交流〉，《東亞漢學研究》第 10 號，頁 314-324。
- 張伯偉：〈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6 期（2011 年 4 月），頁 1-44。
- 張宏生、卓清芬主編：《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台北：允辰文化，2022 年）。
- 陳廣宏：〈《列朝詩集》閩集「香奩」撰集考〉，《中國語文學誌》（중국어문학지）第 39 輯，頁 7-32。
- 黃鈴棋：〈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建構〉，《東亞漢學研究》第 13 號（2023 年 10 月），頁 183-192。
- 黃彰建等校刊，《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2 年）。
- 黃麗生：〈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以《明實錄》為中心〉，《海洋文化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頁 1-37。
- 葉菜萍：《壬辰倭亂時期的明鮮關係（1592-1598）》，（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論文，2010 年）。
- 詹杭倫、杜慧月〈倪謙出使朝鮮與《庚午皇華集》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4 期（2007 年 6 月），頁 55-72。
- 雷夢水、潘超等主編：《中華竹枝詞》第六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53-80。

赫權子：〈從《皇華集》「箕子題詠」看辭賦的外交功能〉，《東疆學刊》第 28 卷第 3 期，（2011 年 7 月），頁 8-11。

劉婧：《19 世紀—20 世紀初清人編撰朝鮮漢詩文獻研究》，（韓國延世大學國語國文系博士論文，2011 年）。

劉婧：〈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收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東方詩話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七屆·上冊》（香港大學，2012 年），頁 303-338。

劉婧：〈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東亞人文學》(동아인문학) 第二十二輯（2012 年），頁 243。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印：《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

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鑰》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1-29 等。

魏邦儀：《論明代中晚期女性詩文選集的編纂》，（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羅秀美：〈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漢學研究》第 32 集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97-230。

（美）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出版社，2004 年）。

（加）方秀潔（Grace S. Fong）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與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 年）。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新店：左岸文化出版，2005 年）。

## 何焯《文選》學的梳理與試探 ——從「何校」與「何評」的釐正談起

張為舜\*

### 摘 要

黃焯〈文選平點敘〉盛贊：「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何焯儼然為清代《文選》學的標竿，其《義門讀書記》是後學窺入《文選》的重要參考之一。過去學界過存何焯的學術表現，並未關懷清代學者對其的批評，而筆者檢視到後學對於何氏《文選》學有所批評，質疑聲音不可不察。

由於完帙作品僅存《讀書記》，並不能全然代表何焯，而本研究透過比對各家散落資料，理解讀者所見不全，各執一詞；但從批評又可從而理解清儒是秉持「事必有徵，義必有本」的「考據」理念，對何氏《文選》學提出批判的聲音。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漢學」視域的主張，解釋乾、嘉《文選》學家檢正何焯的意義，並藉此讓我們更深入了解清代《文選》學的時代訴求。

**關鍵詞：**何焯、義門讀書記、何校、何評、清代文選學

---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生。

**Organize and observe on He Zhuo's erudition of *Wenxuan*  
— — Star with distinguish proof and comment by He Zhuo**

Chang, Wei-Shun

**Abstract**

Huang Zhuo's "The Evaluate Selected f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praised: "The top study of *Wenxuan* only He Zhuo (何焯) in the Qing Dynasty." One of important documents that named *Reading Notes by Yi-Men* (義門) is wanting to learn *Wenxuan*. In the past, no one paid attention to fault on He Zhuo, in fact, some people criticize him in the Qing Dynasty. So, this report observed that thinking this matter is important.

The complete word in *Reading Notes by Yi-Men* but not at all. This report organize each scholars information that everyone is different, but scholars think it different needs to "text must appear in books & explanation must appear in classics" to appear. So be more rigorous to check He Zhuo and his note. Therefore, this report hopes to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what they wanting in sinology, and by knew to persist in *Wenxuan*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He Zhuo, *Reading Notes by Yi-Men*, proof by He Zhuo, comment by He Zhuo, Qing Dynasty *Wenxuan*

## 一、引言：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sup>1</sup>

清代學術昌明，大量典籍受到整理與勘正，是前代學術成果所無法比肩的，一切歸功於清人願意盡日窮夜地挖掘與發明。<sup>2</sup>其中何焯（1661—1722）對於《昭明文選》（後續再提均稱《文選》）承先啓後，頗有考究，深受清人所推崇，諸如：余蕭客（1732—1778）《文選音義·自序》：「前輩何侍讀義門先生，……，博攷眾本，以汲古爲善，晚年評定……士論服其該洽。」<sup>3</sup>葉樹藩（？—？）〈重刻文選序〉：「吾吳何義門手評是書，於李注多所考正……。」<sup>4</sup>孫志祖（1737—1801）〈文選考異序〉：「國朝潘稼堂及何義門兩先生，並嘗讎校是書，而義門先生丹黃點勘……。」<sup>5</sup>張雲璈〈選學膠言自序〉云：「義門先生考覆較多，最稱該洽，視諸家尤長，學者宗之。」<sup>6</sup>等二十餘者，即說明「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的地位。<sup>7</sup>

---

<sup>1</sup> 按：該語出於黃焯（1902—1984）〈文選平點敘〉，但駱鴻凱《文選學》稱「本師黃氏（侃）云。」大抵可推測爲黃氏對於何焯的推崇，逮從黃焯、黃念容、黃廷祖均承其先君黃侃說法，未有離異，可看作黃氏一家之私見。見（清）黃侃：《文選平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4。

<sup>2</sup> 丁旭輝〈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與背景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歸納進人闡述清代考據學術昌明之因，其中第二點「社會經濟、統治者支持說」與第七點「整理國故、家學說」較切合整體時代發展脈絡的主因。參《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第3期第10卷，（2004年9月），頁109-120。

<sup>3</sup> （清）余蕭客：《文選音義》（清·乾隆廿三年靜勝堂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1冊，頁10。

<sup>4</sup>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30。

<sup>5</sup> （清）孫志祖：《文選考異》（清·嘉慶間刻讀畫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6冊，頁557-558。

<sup>6</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7冊，頁247-251。

<sup>7</sup> 此據《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統計，共計107人，提及何焯者共21人。參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8。

而欲了解何焯《文選》相關成果即目前《義門讀書記》（後稱《讀書記》）。首先，《讀書記》成書方面極為多舛，其侄何堂〈序〉言：「取攜狼藉者有人，而書以佚散，喪舟南歸，書麓半浸於水，而書以腐敗破缺。」又其侄孫何忠相〈誌〉言：「康熙壬辰捐館舍，遺書充棟，……，書賈百計購，評本風馳電捲，百無三四存，其得之者強半皆維揚富人，秘不出。」<sup>8</sup>不論是遭掠受購，再再揭示何焯的成果是受到學界肯定的，才有如此遭遇。惜當時其子何雲龍甫九歲，無法守住父親一生努力修築的學術成果，逮及長成才意識到父學之價值。

其次，現存紀錄相當駁雜破碎。觀察今本通行的四庫本《讀書記》來說，當中鮮少版本校勘的案語，較多的是評點與注解的補充；但是從其他清儒的著作中卻不乏尚存校勘、注音等紀錄，加上《文選集成》也提及「何義門著有《文選音義》」<sup>9</sup>，這顯示何焯的《文選》學應有一體之四面：一面是以對讎各版本為主的「校《文選》（後稱「何校）」，一面是針對《文選》文章評點的「評《文選》（後稱「何評）」，一面則是針對當時清代通俗的讀音「注《選》音（後稱「何音）」，再一面則是對於注解疑慮或錯誤的「再補充」（後稱「補注」）。而四庫本之「何校」、「何音」不幸地在後學集纂時被剷除了。

雖然《讀書記》不甚完整，但並不影響清儒推崇何焯，究其原因還是何焯在於《文選》「版本」貢獻。我們知道，《文選》在唐代有李善注與五臣注兩家注解，迨至宋代，「刊刻」天聖道明國子監李善單注本或平昌孟氏五臣注本，但單注本均不及合併兩家注解的「六家本」、「六臣本」來得實用、流行；但「六家」、「六臣」的體例略有小異，加上歷經宋、元、明三朝刊刻主事者嚴謹不一，導致正文與注文錯訛，或是兩家注解

<sup>8</sup> 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頁 1285-1288。

<sup>9</sup> 參（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清·乾隆四十八年吳天爵重訂增補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9月），第1冊，頁27。

相互淆亂，之中刪減漫增更是隨著歷來每一次的刊刻而擴大問題。<sup>10</sup>所以《文選》的版本迎來開枝散葉，同時也走向紛亂的局面。

何焯在版本學上的貢獻，本研究認為有二：一者在於以「汲古為善」<sup>11</sup>；所謂「汲古閣本」即明末毛晉所刊之「李善注本」，溯其祖本為「南宋尤袤的池陽郡齋刻李善注本」，即清人常言「從宋本校正」；<sup>12</sup>而學者認為何焯係以錢士謐本作為底本，與流通之袁本（六家本）與茶陵本（六臣注）等本相互校參的成果。<sup>13</sup>這件事情在清代具有時代性的意義，標誌何焯在版本上以李善本為宗的選擇。二者是何焯名氣橫貫當時朝野，上自四庫館臣的「文章負盛名」，<sup>14</sup>下自學友「失職仍校書內廷、書籤壓架，校讎再三、分辨而補正之，校訂……」<sup>15</sup>等云云，不論是文章抑或考證都受到當代肯定，其話語之權不言而喻。故清人基於版本迷思與名人效應，認為此刻為善，<sup>16</sup>也造就「今學士家羣奉何義門校本，競相傳寫。」，<sup>17</sup>諸

---

<sup>10</sup> 版本問題可參：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8月），頁230-300；王立群：《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8月），頁105-339；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頁143-223；劉鋒：《文選校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頁53-110。

<sup>11</sup> （清）余蕭客：《文選音義》（清·乾隆廿三年靜勝堂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頁10。按：該論點廣受清人採納，俱見於孫志祖、張雲璈、梁章鉅等學者，民初黃侃、駱鴻凱也持此見。

<sup>12</sup> （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月），第54冊，頁92-97。

<sup>13</sup> 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總頁1377-1382。

<sup>14</sup> （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月），第33冊，頁149-151。

<sup>15</sup> 參方燦如：〈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收於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頁1281-1283。

<sup>16</sup> 按：汲古閣本的底本來源至今尚未定論，據斯波六郎譜系，可能源自南宋尤袤的刻本。然傅剛認為汲古閣本分三十九類文體與陳八郎本同，相關版式、缺訛與尤本之後的張伯顏本不同，疑非同一系統，而是透過五臣本與其他六臣本相互校參的成果。參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頁191-194。

<sup>17</sup> （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18冊，頁21。

如「借觀不獲」<sup>18</sup>或「學友相借」<sup>19</sup>仍頻，甚有「偽作」之說法。<sup>20</sup>因此，經何焯所校勘的《文選》，在士林間傳為佳作。<sup>21</sup>

何焯成果為清儒所炙熱，自然成為學者們參考或採納的對象，韋胤宗統計《文選》學方面：余蕭客（1732—1778年）《文選音義》千餘條、許巽行（1727—1798？）《文選筆記》680條、梁章鉅（1775—1849）《文選旁證》650條。<sup>22</sup>而本研究觀察清代專論《文選》學者，諸如：孫志祖（1737—1801）、徐攀鳳（1740—1803）、張雲璈（1747—1829）、胡克家（1757—1816）、薛傳均（1768—1835）、朱珔（1769—1850）、梁章鉅（1775—1849）、胡紹煥（1792—1860）等，約莫10餘家均承何氏校勘之膏腴。

<sup>18</sup>（清）汪師韓：《文學理學權輿》（清·嘉慶間刻讀書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6冊，頁12。

<sup>19</sup>許巽行曾於乾隆19年（1754）透過曹錫寶（1719—1792）見到何焯的抄本，對校後定名「癸亥本」。參見許氏〈密齋隨錄〉，（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18冊，頁21-23。

<sup>20</sup>全祖望於〈翰林院編脩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載：「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偽書……。」參（清）全祖望：《鮚埼亭集》（新北市：台海書版社，1988年3月），頁723-724。

<sup>21</sup>何焯不論是手本、批校本等成果均未剝削，又據弟子沈彤表示某同門擔心何焯批案言詞過激，可能招致忌諱，進而盡數焚銷等事。可知，何焯的成果一定程度上不僅未公開流傳，甚至不全、殘缺都是可以想見的。何氏的手本，或更精確說當時在古本上頭圈點批改校訂的案語或校勘記是破碎且不全的，今天崔高維重修出版的《義門讀書記》或四庫全書本所留，均非何焯批校時的原貌，從于光華（1727—？）〈重訂凡例〉亦可得知：「義門先生《文選評本》，凡三易稿，故或記年、或用曰以別之，世所傳寫，皆晚年所定。」然《文選集評》也有問題，雖保留大量明、清時人對於《文選》的批評，但該書刪去大量李善注、五臣注等眾家古注，僅偶爾抄錄幾條，並重修出版，板式亦非傳統60卷樣式。所以不論是葉樹藩，乃至于光華所過錄何焯評語均殘缺不全，也不能完全視作何氏的全貌。今本《義門讀書記》可參（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53。

<sup>22</sup>韋胤宗：《浩蕩遊絲：何焯與清代的批校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8月），頁174。

足見清代學者對何焯的推崇，無疑為後代《文選》學家提供考證「方向」。甚於近代《文選》學頗受黃侃、駱鴻凱系統推崇，地位穩固。<sup>23</sup>而筆者長期關懷清代《文選》學，發現清代批評何焯者不在少數，如徐攀鳳：「方為有據、未免臆撰少佐證、<sup>24</sup>導人詞章固可，與之箋釋古人文詞則織。<sup>25</sup>」張雲璈：「失於點勘、<sup>26</sup>未翫賦之本文耶。<sup>27</sup>」朱珔：「陞，乃階級之名與此殊不合，『何說未可從』。」<sup>28</sup>許巽行：「何校未為是也、<sup>29</sup>而遂輕信庸妄之五臣、<sup>30</sup>何所指乎五臣注：良書，先王典籍也。荒謬可笑。<sup>31</sup>」等。

同時，本研究也觀察近人解釋何焯的學術缺失，如黃侃之侄黃焯即析離何焯在《文選》學上的缺失有三：「時代高下之見」、「體裁朦溷之見」、「時文門法之見」，<sup>32</sup>主乃何氏未擺脫明儒的評點風氣，不能深囿《文選》文體與文類之間的差異，且以隋唐以後之作品比較《文選》，犯了部分清

---

<sup>23</sup> 黃侃、黃焯父子對何焯大家推崇，故身為學生的駱鴻凱承師庭訓，其《文選學》並未有太多批駁。參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58。後續學者仍有關懷，較著名者如穆克宏：《六朝文學研究》，收於《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叢刊（第一輯）》（台北市：萬卷樓圖書，2018年9月）；王小婷：《清代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9月）；王書才：《文選評點述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sup>24</sup> （清）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91。

<sup>25</sup> （清）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96。

<sup>26</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7冊，頁429。

<sup>27</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7冊，頁702。

<sup>28</sup> （清）朱珔：《文選集釋》（清·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頁239-240。

<sup>29</sup> （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18冊，頁327。

<sup>30</sup> 《文選筆記》，第18冊，頁334。

<sup>31</sup> 《文選筆記》，第18冊，頁489。

<sup>32</sup> （清）黃侃：《文選平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4。

儒認為之「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sup>33</sup>另，學者穆克宏認為何焯「不長於考證」，對於古注「未詳、待權」等條目所提出的看法頗多淺薄，如〈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即採五臣之說，而未「知其詳者當確指何時何地之人，方為有據。」又如〈魏都賦〉「量寸旬。」直言「未詳」而不加以考據；<sup>34</sup>而評論恪承宋、明儒的評點學風，較屬於個人觀點，如評〈海賦〉：「奇之又奇。相如、子雲無以復加。」評〈江賦〉：「與〈海賦〉才力懸絕。」<sup>35</sup>等。因此，穆氏認為何焯粗淺的觀點適合「初學者」參看；另如學者范志新認為何焯是立於藏書家、目錄家的史家視角對《文選》進行「以史正《選》」的詮釋，文字、音韻之學不如乾、嘉學者來得深厚。<sup>36</sup>

何焯整體學問評價兩極，質疑揭示當代人對於何焯學術的「異聲」，值當考察其訴求。鑒此，筆者從中思索一條理路，發現這些評價幾乎與「評點」息息相關，而評點與「考據」又恰恰是兩種不同的治學方法，是否學者間對何焯的學問有所誤解？是故，本研究認為有重新探討何焯的校勘成果與《讀書記》一書之必要。

由於《義門讀書記》本身的版本問題相當濛混，且我們也很難確立清人掌握版本係初刻、重刻、翻刻、影刻，抑或初印或後印等問題是否忠實，因此不可能單以一篇小論文盡述詳說地討論。但我們可以由所謂「何校」與《讀書記》之差異先行著手釐正，了解兩造差異的本質後，即可進一步理解學者所見不同，造成對何焯學術有所「誤解」；再進而藉著這些「誤解」的解析，理解當代對於學術嚴謹的訴求表達。其實，何

<sup>33</sup>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頁509。

<sup>34</sup> 兩條均不見於今崔氏點校本、于光華評本、黃侃批校本、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等。可參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91、196。

<sup>35</sup> 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頁875。

<sup>36</sup> 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頁8-9。

焯用力乃「凡三易稿」<sup>37</sup>到學界「競相傳寫」，當中必定有所落差，而這落差即在於學者間所見不一，故有認知落差而提出質議，故此無疑為清代《文選》學研究之重要議題。最後則可肯定——「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的評語是經得起驗證。

## 二、凡三易稿，多有未載：「何校」與《義門讀書記》差異釐正

### （一）「何校」與《義門讀書記》之間的差異

于光華談及何焯，言之：「《文選》評本，凡三易稿。故或『記年』，或用『又曰』以別之。世所傳寫皆晚年所定。初次則支分節解，於初學尤宜。」<sup>38</sup>何焯的資料不僅有版次差異外，且其中最初的版次是最適合初學者學習《文選》，可見于光華係有見過初稿與後續版次。但瀏覽通本《文選集評》是否有上述義例？答案是否定的。《文選集評》通書全作「何曰」，甚至在其他學者著作中也未見有者以「記年」、「又曰」別之。這顯示何焯的資料其實是有受到「佚失、修改」的可能，以致後學方東樹（1772—1851）於第三十七卷《文選》註明「多有未載」。<sup>39</sup>並且《援鶉堂筆記·槩誤》言：「何氏出後人竄次，不得其措，注之宜故也。蓋傳其所僅傳，而其不傳者，與人俱亡矣。」<sup>40</sup>方氏語焉甚明，《讀書記》是受「後人代為處理的結果」，最初的案稿已跟著何焯離世一同散失，故對於後進展出的新穎資料俱不進採，面對《義門讀書記》與後出資料，實是採保留態度。

這顯示何焯「原本」在流傳之間有著「紀錄缺少」、「紀錄落差」與「去取不一」的「不確定性」，但我們仍可從清儒的記敘梳理一條脈絡，

---

<sup>37</sup> 按：「凡三易稿」著見清儒紀錄，諸如姚範《援鶉堂筆記》、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等，此略提一耳。

<sup>38</sup> （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53。

<sup>39</sup>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年8月），第五冊，頁1321。

<sup>40</sup>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年8月），第八冊，頁2054。

即如前文所言「一體之四面」。故此段分別由兩個面向：「何校」與「何評」來觀察，以作差異釐正。同時借鑑駱鴻凱在《文選學·源流第三》的分野，開篇上自何焯，終於李詳等二十餘家較著重「考證」，因此「何校」的資料較受此類學者採錄；次類為評點、摘字等非考據的學者著作歸類成一派，約莫十家，採錄較多「何評」，作另一觀察。這邊尚須了解「何校」與「何評」雖性質不同，但並非不會同時受到採錄，而是依照各家收錄的需求進行採納，如張雲璈《選學膠言》、梁章鉅《文選旁證》大部分以討論「何校」為主，兼有幾條「何評」；又如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于光華《重刊文選集評》本就屬於評點類書，著重「何評」也是理解之內，但仍可見「何校」的痕跡而未署名，故值當釐正兩造差異。

### 1. 首先觀察「何校」

「何校」因涉及考據「汲古閣本、袁本、茶陵本」等複雜的版本差異，內容廣受清儒引用（詳見前文），故在清代《文選》學之中相當廣見。由於何焯的原稿目前已經佚失，透過《讀書記》也不易知曉它的原貌，但是通過各家抄錄的條案，還是能推測它的雛況。

何焯離世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庫本《讀書記》刊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聲稱取得於刊時之前者尚有姚範（1702—1771）《援鶉堂筆記》、許巽行（1727—1798？）《文選筆記》、余蕭客（1729—1777）《文選音義》等三家。

許巽行《文選筆記》尤為重要，不僅為清代鮮為人知的校勘《文選》之專家，同時也遍覽當代著作之見證者。自乾隆壬戌、癸亥間（乾隆七年至八年間 1742-1743年）受學於華亭髣髴山房，始涉略《文選》，認為坊間刊本譌異不可讀，遂有校讎之心；一生蒐羅各家版本，涵蓋張伯顏本、養德書院本、汲古閣本、錢士謐本、葉樹藩本、上蔡劉氏本等；<sup>41</sup>另

<sup>41</sup> 「上蔡劉氏本」鮮少學者提及，但仍著見《天祿琳琅後編》之中，除闕袁裝識語外，並偽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上蔡劉氏刻，實際為袁本系統。參劉薈：〈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諸本版本實情探析〉，收錄《歷史文獻研究》，2019年1期（總第42

當代學者之著作，如余蕭客《文選音義》、于光華《文選集評》、方廷珪《文選集成》等作均有參考提及。直至戊午年間（嘉慶三年 1798 年）勒停，將草稿交付子孫，時年已七十有二。長達約 55 年的時光，許巽行幾乎都在處理《文選》的版本問題，其校勘力度絕不亞於何焯、胡克家等輩。但《文選筆記》本屬於「私家藏本」，且刊刻不易、耗費資繁，其玄孫——許嘉德表示：「繕稿亦已有年，竝經開雕十於卷，而一再校讎……旋校旋輟，未得專心，工資亦極浩繁，祇好舒之異日，……，筆記八卷先付剞劂……。」<sup>42</sup>故直至光緒十年（1884 年）才繕工。其中，許巽行於〈附識〉言：

何氏校正甚少，余曾假曹劔亭手抄本鈔之。復廣求刻本及證之他書，蓋所校證比於何氏為增益云。……甲戌年（1754）在京師從曹劔亭借得何義門先生校本，手錄一過互為校正，此癸亥（未）本也。<sup>43</sup>

上述記錄透露此時許氏所借抄的「何校」記錄甚少，且相當粗淺，故廣求其他「版本」復證，由此可視為何焯較早期的版次。

再者余蕭客其《文選音義》刊行於乾隆廿三年（1758 年），全書其實未表明取得何氏資料的「確切時間」，但與何焯同為「吳人」（江蘇蘇州），

---

輯），頁 309-316。

<sup>42</sup>（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18 冊，頁 6-7。

<sup>43</sup>（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18 冊，頁 21-22。按：清代癸亥有四：康熙二十二年（1683）、乾隆八年（1743）、嘉慶八年（1803）、同治元年（1863），許氏生卒為雍正五年至嘉慶三年（約 1727-1798）；該文「此癸亥本也」下句為「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 年）官浙東」，若前文以言「甲戌年（1754）在京師，此乙酉只能為或道光 5 年（1825 年）。時序與生卒均明顯無法吻合。故筆者認為：此「癸亥」當改為「癸未」，也就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校勘九年；後「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 年）官浙東……此丙戌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得葉氏刻本（刻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此甲午本……丁酉（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官粵西……。」較為合理。

亦與何氏門人沈彤互為友好，可視作同一學圈。且《文選音義》係清代《文選》學中收錄「何校」最多者，其〈序〉言：「晚年評定……據何為本，蓋以所聞，摘字為音。」<sup>44</sup>開宗明義告訴「據何為本」且係有「評定」之本；此外，全書成立的目標明確，主在處理單字、注解的「音與義」，故除了「何校」外，尚收錄大量「何音」，也證實何焯曾據清代較為通行讀音加以註解的事實。

最後，姚範《援鵝堂筆記》雖刊於道光 15 年（1835 年），但據方東樹後記案語：姚氏係據「何義門原本」，續下又補充，「何校凡三易稿，今刊行《讀書記》多有未載，並附錄用備一家之說……。」<sup>45</sup>表明其所見的何焯資料與四庫本《讀書記》略有出入，可能是較為早期的版本，故先行註記，以便後學取用能夠複校。尤其姚氏收錄的「何校」資料與余蕭客略有重疊，但是方東樹在彙誤時也表明「注之宜故也。蓋傳其所僅傳，而其不傳者，與人俱亡矣。」認為越早期的文獻越有可信度，不只暗斥坊間流傳的何焯資料有「偽作」之嫌外，更間接表示其所取得的資料可能更早於其他學者。因此，三者都值當列入觀察。

以下，即根據上述三家參考何焯於〈吳都賦〉各方面之概況，經統計而製成下表，以方便觀察與說明。

表一、《文選筆記》《文選音義》《援鵝堂筆記》徵引何焯概況

著作	〈吳都賦〉參考條目分類					
	何校	何音	何評	補注	總數	四庫本重疊數
《文選筆記》	4	0	1	1	6	0
《文選音義》	12	8	0	11	31	3
《援鵝堂筆記》	8	1	0	5	14	2

從上表，可以知道何焯在《文選》方面下了那些功夫，確實包含「何校、何音、何評、補注」等四種；其中，許巽行引「評點 1 條、校字 4

<sup>44</sup> 《文選音義》，第 1 冊，頁 10。

<sup>45</sup> （清）姚範：《援鵝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 年 8 月），第 5 冊，頁 1321。

條、補注 1」、余蕭客「補注 11 條、校字 12 條、注音 8 條」、姚範「補注 5 條、校字 8 條、注音 1 條」。對檢與四庫本的關係：《文選筆記》錄 6 條，均為四庫本所無；《文選音義》錄 31 條，僅 3 條與四庫本合；《援鶉堂筆記》錄 14 條，僅 2 條一致。

以下再根據三者於〈吳都賦〉所徵引何焯之細目略作說明。

表二、《文選筆記》《文選音義》《援鶉堂筆記》徵引何焯細目

學者	參考何校條目
許巽行 《文選筆記》	之岳、駢脇、弛岑、闕子曰、揮戈、庶士
余蕭客 《文選音義》	吳都、論都、干越、湯、瀛、鯀、食葛、東風、挈、埽、餘甘、綵、歲、窠、武昌、魏、睽、俞騎、旄、蓑、殺、而飲、鱧、圖其、魏尉詩、小城、漢書曰太、不樂徒、虞丈秀、白豹、北征闕池
姚範 《援鶉堂筆記》	吳都賦、風俗、武林、鯀、扶留、殫葉、驚透、武昌、純鈞、驢驢、駢脇、殺、邪睨、諛詭

由上可知，許氏徵引條目與余、姚幾乎不同；而余、雙方僅 5 條相似。進一步檢視，以〈吳都賦〉「旁魄以論都邑」為例，即余蕭客「論都」條，言：「六臣有邑字。何引潘（耒）云：『都字衍』。」該條許巽行亦有，言「六臣無都字，以『旁魄而論』絕句。」無署名何焯或潘耒。<sup>46</sup>又如《援鶉堂筆記》「驢驢」條，言：「何去馬旁。」《文選筆記》亦有，但僅作：「《左傳》作肅爽；《釋文》爽或作霜，均不加馬。」無署名何焯。<sup>47</sup>又如紀錄落差者，《文選筆記》「駢脇」條，言：「何改駢，以駢為非。」《援鶉堂筆記》言：「何云當書作駢。」<sup>48</sup>

<sup>46</sup> 《文選音義》，第 1 冊，頁 76；許巽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80。

<sup>47</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85；姚範：《援鶉堂筆記》，第 5 冊，頁 1349。該條《文選音義》亦有，但僅著錄「驢驢」二字音同「肅爽」，無提及何焯。參《文選音義》，第 1 冊，頁 81-82。

<sup>48</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86；姚範：《援鶉堂筆記》，第 5 冊，頁 1349。該條《文選音義》亦有，言：「劉（淵林）注：『駢、駢通。』脇，通脅。」，無提及

上述兩表雖僅擷取〈吳都賦〉的條案作為參考，但統觀來談：不論是那位學者或是那本著作，何焯的資料確實包含「何校、何音、何評、補注」四種，或許在《文選筆記》中看不到何音，係因為何音屬於「讀若」的方式，但徐氏所求為「反切」，故遽而不採；《文選音義》一書雖表明取「音與義」，但通書仍有何評，《援鶉堂筆記》亦是。因此，學者也並非盲目取用，而是依照各家學術上的需要進行採納，故各家之間略顯差異。

## 2. 其次再觀察「何評」

《讀書記》本身以輯錄「何評」為主，在出刊後（1769年）也陸續有不少學者聲稱「取得何焯文獻」，諸如葉樹藩《重刻昭明文選李善註》（簡稱《文選補注》，刊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于光華《重刊文選集評》（簡稱《文選集評》，刊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駱鴻凱作《文選集成》，刊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sup>49</sup>這三家的特性在於「採錄義門評點」。

第一，《文選補注》雙桂堂本封面即落款「義門先生評點。」駱鴻凱補充：「星衛是書成於乾隆三十七年，蓋據汲古閣本，以宋本校訂，全採

---

何焯。參《文選音義》，第1冊，頁84。

<sup>49</sup> 方廷珪所撰《昭明文選大成》（一作《昭明文選集成》）據學者統計共有5版，目前以乾隆四十八年（1783）吳天爵重訂之增補本六十卷（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出版，暫稱「增補本」），以及民國十四年（1925）碧梧山莊石印本廿四卷（今數位典藏臺灣大學圖書館，暫稱「碧梧本」）兩本較易取得。筆者初步比較兩版差異，共有六處不一：1.朱珪〈離騷題詞〉，增補本一作甲申，碧梧本一作甲辰。2.增補本，〈方廷珪自序〉無落款干支，碧梧本有。3.凡例增補本作13則；碧梧本作15則。4.兩造採錄何焯評語略有差異。5.「增補本」天頭處特增框格，用以填入評語，但諸多未填，疑似未盡完備。6.「增補本」特增于光華等20餘家評語，葉面稍架。綜合考量下，碧梧本雖較為完整，且採錄評語單純，但增補本刊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距參考對象較近，故以之為準。參（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清·乾隆四十八年吳天爵重訂增補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9月）。（清）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碧梧山莊本，1925年），收於台灣華文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book/NTUL-9910003664/reader>

義門評點。」<sup>50</sup>而檢視葉本，確實除了何焯評點外，無見諸家評語。第二，《文選集評》更有參考葉樹藩與方廷珪等家，乃至前明學者張鳳翼、孫鑛，並進一步言：「丙戌（1766 年）……於羊城旅邸得見初次評本，……均奉義門為標的心理之同，遙相吻合，藉此以証知己。」<sup>51</sup>〈凡例〉言：「即據（何本）為藍本，并集諸家評論。」<sup>52</sup>第三，《文選集成》其實早刊於《文選集評》，但目前較為流通者僅陳雲程之增補本，刊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該版卷首題署「古榕方伯海評點原本、金壇于惺介採輯評註」，且〈增補例言〉明確指明：「何義門（焯）、孫月峯（鑛）二先生評論精確，採錄最多，而餘則略從，一仍于本之舊。」<sup>53</sup>

以四庫本「〈吳都賦〉」所收 16 條補注與評點，對檢三家情況（如下表）：

表三、〈吳都賦〉參考條目數量與四庫本重疊數

著作	〈吳都賦〉參考條目數量	與四庫本重疊數
《文選補注》	29	11
《文選集評》	41	8
《文選集成》	32	9

《文選補注》29 條，重疊 11 條；《文選集評》因收錄多家，故僅對署名「何曰」的條目者統計，達 41 條，重疊 8 條；《文選集成》32 條，重疊 6 條。此處陳雲程雖參考《文選集評》，但《文選集評》正文之間另有補充「何注」，此部分《文選集成》俱將剔除，故經統計有短少 9 條。同樣

<sup>50</sup> 駱鴻凱《文選學》，頁 63。

<sup>51</sup> 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3 冊，頁 53-55。

<sup>52</sup> 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3 冊，頁 45。

<sup>53</sup> 參（清）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碧梧山莊付印昭明文選大成例言〉（碧梧山莊本，1925 年），收於台灣華文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book/NTUL-9910003664/reader>，頁 38。

地，《文選集評》對比《文選補注》也僅 12 條重疊。

以表格數據分析，《文選補注》與四庫本最接近，加上該本僅晚出四庫本約 3 年，按理是最有可能接近何焯原本。但最接近者卻有不少條目不受後學採納，變成一個怪異的現象，即各家寧可「保持」自己取得的何焯文獻，也不願意「增補」後來出現的資料，而這個現象俱現於許巽行、姚範、方廷珪、于光華等人身上，是否也坐實「多有未載」的「偽作」可能？

再進一步由紀錄差異檢視，如下表：

表四、《文選補注》《文選集評》《文選集成》採錄〈吳都賦〉何評差異對照表

	《讀書記》	《文選補注》	《文選集評》	《文選集成》
原文	此儼上林而尤為寡要。	此篇似儼上林而尤為寡要。		
	太涉樞儼， 似有冗長散緩之失， 然採其數語， 便可成一賦， 如： 子山、枯樹是其徵也。	吳都太涉摹擬， 似有冗長散緩之病， 然采其數語， 便可成一賦， 如： 子山、枯樹是也。		
	-----	蜀是矜其險阻， 吳是詔其繁華， 用意微別，	何義門曰蜀是矜其險阻， 吳是詔其繁華， 用意微別，	何義門曰蜀是矜其險阻， 吳是詔其繁華， 用意微別，

		與吳之折蜀處， 全在境之廣狹上 著想， 故務以曼衍爲 工。	吳折蜀處， 全在境之廣狹上 著想， 故務以曼衍爲 工。	與吳之折蜀處， 全在境之廣狹上 著想， 故務以曼衍爲 工。
--	--	---	---	---

上表屬於「紀錄落差」與「去取不一」最爲顯著的例子。以四庫本爲參照基準，《文選補注》、《文選集評》、《文選集成》不論在用字、刪節部分均有落差。尤其在《文選補注》中，另增有「蜀是矜其……」一段，似乎又未祖述何焯，但《文選集成》、《文選集成》與之同。再仔細檢對，可以發現「蜀是矜其……」三家皆同；惟《文選補注》錄於天頭，但不署名；反之，《文選集成》、《文選集評》錄於界行，並開頭署名「何義門曰」。

類似例子又如四庫本「鸞鷲」，何評：「二句無乃亦玉樹、海若之流。」《文選補注》同之，《文選集評》、《文選集成》前另有「何曰草木以後，兼寫竹菓二段」共 53 字。又如「魯陽揮戈而高麾」，四庫本、《文選補注》、《文選集成》俱無，而《文選集評》有之。又如《文選補注》「作離宮之建業」，何評：「吳之建業……後賦作地。」文中，《文選集成》、《文選集評》有「特表姑蘇」4 字；句中「筆法絕妙」，《文選集成》、《文選集評》作「何等筆法」；句末「不樂徒乃孫浩時事」，四庫本有，而《文選集成》、《文選集評》無。

綜合上述，《讀書記》本身的問題顯而易見，其所收錄的資料與清儒的引用有著極大落差，而「刪改權」還取決於收錄者的喜惡；換言之，何焯的稿本早已濛昧不清，含括學友的抄錄、士林的掠奪、商賈變造之真偽，種種現象都反映在各家之上。由是，進一步推得兩個論點：一是「何校與何評可能同時並存」，從許巽行《文選筆記》、余蕭客《文選音義》、姚範《援鶉堂筆記》三家所呈現的差異，推論各家當初取得資料時，

文獻上頭不僅有何焯對於版本對校的按語（何校），以及對於文章品評的評點（何評），但採錄基於不同的學術需求而有不同的呈現；二是「何焯的資料有受到各家取捨與修改」，從四庫本與眾家記錄不同而呈現「紀錄缺少」、「紀錄增多」與「去取不一」，可進一步得知各家對於資料的修改或增刪。此也呼應《文選集評》所言：「此係後人假託，然是非得失，有識者自能辯之。<sup>54</sup>」是故，回到方氏所言「後人竄次」的問題，不管是子弟編之四庫本，抑或後續學者所輯佚，都有一個核心問題——「是否忠實何焯」。

## （二）何焯與《義門讀書記》的關係釐正

由前文所證，何焯確實在《文選》上下足功夫，含括校勘、注釋、評點，其功確如前人所贊——「未有超越」。但是，何焯的文獻資料破碎四散，今日之所見實為後學輯佚，成品體現在《讀書記》。那麼《讀書記》是否能全然代表何焯？甚至劃上等號？這是需要釐正的一個觀念。

駱鴻凱〈評鷺第八〉寫道：

評文之言，歷代歧迥，是丹非素，門戶紛然，悉取雜陳，誰為準的？稍求謹慎，祇宜取當代之言……，世近彌甚，益滋異議，坊本所見，若方廷珪《集成》、于光華《集評》之屬，泛采雜徵，編者自矜善本矣。然大都以時文之窠臼，繩墨古人，塵穢簡編，謬以千里。<sup>55</sup>

駱氏批評清儒評點係墮入「時文窠臼，繩墨古人」，認為清儒是以自我觀點註腳古人文章，沒有一個既定標準，皆是以「帖括（八股）」視角審視《文選》，成就一種「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為經學，以類書為博聞。」<sup>56</sup>的糜敝之風，並非是治研《文選》學之根本。如果我們重新梳理

<sup>54</sup> 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53。

<sup>55</sup>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169。

<sup>56</sup> （清）江藩、趙之謙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

這段話，會發現駱鴻凱是立於一個經學家，甚至一個漢學家的「考據」視域去評價《文選集評》、《文選集成》等評《文選》之書，但其書卻逕以《讀書記》列於考據之首。而本研究在前文所羅列的《讀書記》概況是以「評點」為重，而非考據。這種盲目將何焯與《讀書記》劃上等號，即衍生如「前言」所提徐攀鳳評言：「未免臆撰少佐證、導人詞章固可、失於點勘、而遂輕信庸妄之五臣」及同如張雲璈屢陳述《讀書記》作為批評依據。所以士林盛傳何焯善於「考據」，但現實成書卻是「評點」居多時，自然擋不住各家的指責。

職是之故，如果重新梳理該書命名的本質——《義門讀書記》，輒乎告訴讀者：此書為何焯之「讀書筆記、札記」，它自然一定程度沒有專著來得嚴謹，更不遑此書編輯者在整理上特意刪去「何校、何音」，徒留「何評、補注」。筆者初步推測恐怕與當下能收集到的相關資料破碎與後續刊刻、校對之作業上有著一定的取捨；假設許異行取得何氏資料 680 條全數為真，其《讀書記》帙幅恐膨脹今存之數倍，且《文選》部分會佔據大多數篇幅，全書顯得不甚平衡。因此，《讀書記》刊出本就並非治《文選》之專書，而是如王應麟《困學紀聞》、顧炎武《日知錄》等一類，屬於個人的「讀書筆記」；《文選》只是何焯眾多學問中的一小部分，加上對校與讀書心得積盈較多，足以成章，謹此而已；再者，該書並非何焯筆記之原貌，「是知書非自訂而託之，後人多成增謗，少成減謗。」<sup>57</sup>後人蒐羅資料整理不甚臻緻，所以形成今本《讀書記》的《文選》部分，評論多於校勘，而原先應該要蒐集進《讀書記》的校勘案語，卻大多集於他人著作的奇特現象。

結言之，蔣維鈞與何氏子弟所收與清儒引用上有著極大的落差，代表何焯與《讀書記》之間是不能全然劃上等號，是可以確定的。且經本

---

司，2022 年 5 月），頁 14。

<sup>57</sup>（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 年 8 月），第八冊，頁 2054。

研究審視當時坊間流傳的諸多著作確實記錄落差、破碎不全；換言之，「何校」版本可能略行數種，即如許異行《文選筆記》、姚範《援鵝堂筆記》取得較早的何焯文獻，但因「家藏」之故而眾家無法看見；又如余蕭客《文選音義》受到四庫館臣的批評，其所收錄的何焯文獻鮮於清儒引用。因此，《義門讀書記》雖無法全然等於何焯，但其必定有部分來源始於何焯，兩者之間的關聯仍是可確定的。

### 三、汲古爲善：何焯考證《文選》版本問題

清代的《文選》版本觀念一直處於偏激的情況，而該風氣則是何焯「間接」引起的，源於何焯的底本選擇李善注本，更予以後學誤解的傾向。胡克家言：「《文選》之異，起於五臣。」<sup>58</sup>清儒至所以厭惡五臣，究其根柢有二：一是歷代學者認爲五臣在注解上抄襲李善，同時部分解釋未有依據，即謂「掩乎李注，實事求是處少，且多竊物雜揉之譏。」二是《文選》版本上認爲後續所出現的李善注本摻有五臣注問題，亦即「李注單本幾於失傳，宋人刻單李善注本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sup>59</sup>以客觀的角度來說，版本的問題不能全然究責於五臣，五臣雖有抄襲之慮，但造成「傳刻轉寫，動成舛誤」的刊刻錯誤則是後代「合併」所引起的（本研究引言已明）。<sup>60</sup>這個觀念直至民國初期，學者從日本與敦煌帶回大量

<sup>58</sup>（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攷異：《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頁7。

<sup>59</sup>（清）梁章鉅：《文選旁證》（道光十八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頁3-4。其實早在余蕭客的時代已質疑所謂的尤本並非單純的善注本，甚至清中葉後期的阮元在胡刻本刊世後，仍抱持「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的觀點。由於清代當時無法有更多的版本，也見不到敦煌、日本、韓國等區域收藏的版本，故當時認爲尤本，迨至後期的胡本均爲善本。當然，此問題據傳剛已反證以往學者之研究，認爲尤本可能不是純粹的單注本，而是一種以國子監本爲大體，旁參五臣本及六臣注本的「合成本」。參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頁198-206、252-254。

<sup>60</sup>（清）朱珔：《文選集釋》（清·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15冊，頁3。

抄本佐證才有所改觀。至此之前，清儒無從悉知；既無所知，只能仰賴六家、六臣本之「合併本」系統，明人楊士奇（1365—1444）〈文選跋〉明言：「《昭明文選》六十卷，唐六臣注，……獨賴此編之存。刻版在大學，吾家三十冊，初闕頗多，蓋借錄踰累年，歷數十家，猶未能悉補也。」<sup>61</sup>李善注本自北宋天聖年間敕刻後，官方再無此大型重刻紀錄；而新出李善注本需直至南宋的尤袤才再重新出版，且屬於私人刊刻；元代再由尤本分支張伯顏等本流傳至明代，當中其實已多有闕訛；而陳八郎之五臣本雖著實俱在，部帙尚整，但並非清儒之首選。故面對這般窘迫，讀書人不得已選擇合併本。

或許一個簡單的疑問：既然合併本有疑慮，五臣注又「俚儒荒陋」，何不選擇「李善單注」？確實，明代尚有唐藩、晉藩、汲古閣本等李善注版本，甚至清初康熙年間尚有新校的錢士謐本，於後再出葉樹藩本，但清儒已給出答案。許巽行言：

《文選》以李善注為善，李注以汲古閣雕本為善，上元錢士謐重校本，其尤善者也，然譌謬未正者甚多，且有汲古初刻不誤，而錢氏反改從俗本者。何義門先生有校本而未刻，近吳門葉氏刻之，與學者傳寫校本又多互異，而所校亦尚未盡。<sup>62</sup>

康熙至乾隆這段期間並非無舊版新出，乃是各版皆有謬誤，錢士謐標榜汲古閣本不僅有謬誤，甚至有「改從俗本」（從五臣本或合併本之五臣注）之舉；若何校本以錢本為底本，葉樹藩本更是未善盡再勘之責，反而「消江都原注，又綴以自添新注，非善本也。」<sup>63</sup>因此，清儒是在無力選擇的窘境，從中挑揀「尚可版本」。

---

<sup>61</sup>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11。

<sup>62</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18冊，頁9。

<sup>63</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18冊，頁21。

所謂校書非易事，刊刻劖劂更是。放眼整個清代《文選》注本的刊刻狀況，錢士謐本刊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葉樹藩本刊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最後胡克家本嘉慶十四年（1809），前後 123 年的時光，僅出三種刻本，可知該業之艱。何焯雖未出版，但卻開了一個重校李善注之先河，以錢士謐本為底本，對讎袁本（六家本）、茶陵本（六臣本）兩版，校正精詳，世稱「汲古為善」，為清儒所推究與徇從。<sup>64</sup>

既然何焯重校《文選》意義重大，又豈有批評糾正之理？「糾正何焯」的意義究竟為何？其實，何焯受批評正是源自「李善派」的批評。所謂「李善派」為本研究所假擬，其學術訴求即「以李善為宗」，不只版本追求「李善注本」，考據上更恪遵李善訓釋——「事必有徵，義必有本」的治學方法。而何焯正是沒有此清楚的學術傾向，故遭受詬病。本研究總歸原因大致有二：「校勘問題」與「治學之法」。

### （一）校勘問題

以目前現存的相關文獻來說，何焯從未表明要遵從李善注，或是欲恢復李善注。所以站在一個大時代的現況去設想，袁本（六家本）係公認明代刻書之精品，茶陵本（六臣本）亦元版明槧之主流本，兩版既已精詳，其實無須勞師動眾「計十六載而完，用費浩繁，梓人艱集。」<sup>65</sup>再校之，理更不遑論五臣本略被視作大眾讀物，更無校勘之必要。因此，以務實層面來說，選擇校勘當下學界所欠缺之李善注本（汲古閣本）是較符合學術價值與合理性。

但以乾、嘉之學者來看，既然何焯版本上選擇了李善注本，當以李善注方方面面為準。但是何焯在這部分上並沒有一致，而是有些依從五

<sup>64</sup> 胡克家：「世之所存，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次重刻淳熙辛丑尤延之本。」由該條可知，嘉慶年間仍徒存二版，未有新版，故僅以茲為讎。（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攷異：《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頁7。

<sup>65</sup> 此袁褫刊六家本之語。參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19。

臣、批評李善，如謝玄暉〈始出尚書省〉「防口猶寬政」評「善注全乖文意，劉良注得之。」陸士衡〈謝平原內始表〉「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評「李注恐誤。」等例不勝枚舉。<sup>66</sup>這使得「李善派」的學者嫌惡，如徐攀鳳提出〈西征賦〉「殆肆叔於朝市」从五臣作「騫叔」、〈河陽縣作二首〉「連陪廁王寮。」「連」，从五臣作「違」、〈入彭蠡湖口〉「水碧綴流溫」从五臣改「綴」爲「輟」等 10 條。又如許異行〈奉答內兄希叔〉「始斯」，从五臣，始當作如、「家臣」从五臣改家丞、〈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心悟」，从五臣依注作晤等百餘條。

上述列引並非要討論校勘上是否正確，而是透過何焯的校勘行爲進行反思。第一，爲何依從五臣本資料改正李善本？第二，何焯名面上以錢士謐本（汲古閣本）、袁本（六家本）、茶陵本（六臣本）進行校對，但版本來源有沒有問題？若依學者考據，清代皇家天祿琳琅藏的六家《文選》（袁本）10 部，之中 9 部受書賈變造仿宋槧之贗品。<sup>67</sup>而我們現在也知道宋代尤袤本的來源就是書賈，如果皇家所取得的版本都有可能爲贗品，那麼何焯取得的是否爲「有問題的版本」？或者更進一步問，清代究竟有多少版本是沒有重大謬誤的？筆者思索此議自不必言，流通的版本多半有誤，而清儒再以誤本改動正本？所校正的成果自當可想而知。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我們再進一步談，凡是校勘工作，皆須有理有據，如果何焯當時有交代清楚所取得的版本來源，校勘的改字是如何依據，並清楚留下校勘案語，即俗稱「校勘記」，或許清代學界不會有如此抨擊。

這也顯示，清儒所取得的資料並沒有太多資訊可以理解何焯爲何改字，即如前文所討論各學者間不論是否節錄「何校」，都沒有得到清楚地解釋改字之依據；或有「某本作某」之紀錄，那後續得到何焯文獻者是否直接逕自以茲改字，而造成版本更加絮亂？都是可以持續深究的問題。

<sup>66</sup> 《義門讀書記》，頁 933、951。

<sup>67</sup> 劉蕃：〈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諸本版本實情探析〉，收錄《歷史文獻研究》，2019 年 1 期（總第 42 輯），頁 309-316。

## （二）治學之法

誠如引言所引述：「方為有據、未免臆撰少佐證、<sup>68</sup>導人詞章固可，與之箋釋古人文詞則織。<sup>69</sup>」張雲璈：「失於點勘、<sup>70</sup>未翫賦之本文耶。<sup>71</sup>」黃焯：「時代高下之見」、「體裁濛溷之見」、「時文門法之見」等，從中可以掌握「詞章、體裁、時文」等關鍵詞，明顯與「評點」有關。因此，這邊即可大膽確定，批評者所對峙的文本係《義門讀書記》，非「何校」甚明。

《文選》評點類的用意清晰，目的是疏通文意，綴以訓詁、評論、補充等，如《重訂文選集評》：「足使人盡讀《選》，而不覺其詞義之艱深也。嗟乎！《選》可續經，評可輔註，江夏功臣其在是哉。」<sup>72</sup>《文選集成》：「總括大意，艱以議論，尤屬切要，非等卮詞。」<sup>73</sup>此輩學者治《文選》認為「求之注家，多不貫通」，<sup>74</sup>對於以往注解家「釋義忘義」，徒增解讀的困難性，並未起到疏解的作用而感到艱澀。故自是跳脫李善與五臣，許異行評價此類著作：

近時坊刻《文選集評》，芟蕪李注，雜採五臣。又以妄人所撰《文選音義》附之，支離乖舛，此書之危甚矣。又見一本名《文選集成》，移易次序，增減篇目，芟蕪李注，多加臆說，何近日妄人之多也。<sup>75</sup>

<sup>68</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 191。

<sup>69</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 196。

<sup>70</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 年 11 月），第 7 冊，頁 429。

<sup>71</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 年 11 月），第 7 冊，頁 702。

<sup>72</sup> （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第 3 冊，頁 6。

<sup>73</sup> （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第 1 冊，頁 24。

<sup>74</sup> （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第 1 冊，頁 8。

<sup>75</sup> 許異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20。

評點意即統括詮說，目的是疏通文意，自然不會如李善「弋鈞書部」。這種非考據的方法自然受到一部份學者的挑戰。因此，何焯在於《讀書記》所被詬病的面相，本研究認為有三原因：「方法」、「參考」與「判斷」。

第一，何焯治學的「方法」上並非倣從漢訓、漢法之「許、鄭之學」，意即「探討文字以許慎《說文解字》為依據；研究經學，便奉鄭玄的群經注說惟宗主。」<sup>76</sup>許慎、鄭玄皆為東漢著名經學學者，但兩者卻未嚴格兩漢家法與章句的淤說，<sup>77</sup>而是融會迄東漢以來的精說，披沙揀金，為兩漢以降最權威。<sup>78</sup>兩者在注釋的特色即在於「信而有證，稽謬其說；先儒受教之術，經籍之樞要者。」<sup>79</sup>其實，對清儒來說，解經注疏要得是「有理有據」，而非「憑臆妄撰」。<sup>80</sup>但何焯訓詁上卻是偏向較為寬泛的「臆解」，如張衡〈西京賦〉「坻嵒鱗沓，棧齷嶮嶮。襄岸夷塗，脩路險險。」何焯認為：「觀此『嶮』與『險』，蓋兩義。」又或張衡〈西京賦〉「複陸重閣。」何焯認為：「陸」疑『陞』。」又或左思〈魏都賦〉「量寸旬。」何焯言「『寸』、『旬』未詳。」等，<sup>81</sup>甚至恣意改字。這些未加佐證或想當然耳的例子不

<sup>76</sup> 張舜徽：《鄭學叢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頁1-2。

<sup>77</sup> 按：漢代家法、章句的始末與今古派系過於繁複，此僅對峙何焯與清代治學方法論而稍做徵引。參徐復觀：《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196-204。

<sup>78</sup> 《後漢書》評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見（南朝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頁325-326。

<sup>79</sup> 「信而有證，稽謬其說。」請參（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市：洪葉文化出版社，1013年5月），771。「先儒受教之術，經籍之樞要者。」請參（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頁1。

<sup>80</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212。

<sup>81</sup> 除張衡〈西京賦〉「坻嵒鱗沓，……。」可見於今本《義門讀書記》，參（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頁861；其餘例舉「複陸重閣」、「量寸旬。」不見於今本，需見於其他清儒著作，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202、293。

勝枚舉。

第二，何焯「參考」五臣注的說法。五臣注解最大特色在於「串釋文本大意」，<sup>82</sup>而不在字句訓詁，因此對於文本的單一字義、出處典引列舉稍乏，甚至部分注解直採李善說法，讓不少學者覺得「荒陋、文本自明，無待辭費」。<sup>83</sup>這種荒陋感恰恰對於學問狂熱追求的清儒來說簡直無法容忍。在清儒眼中，既然身為注解家，不僅要搬出一套學問的「根據」或「來源」，更要處理「諸家不悟，皆彼之遺。」<sup>84</sup>的闕漏，不然何以從事注解？再進一步說，清儒希望看到得是《文選》中的「闕者補之，略者詳之，誤者正之。」<sup>85</sup>的學問，而非「憑臆妄撰」；因此，對於大家都知道的「常識」，不需要「此等故實，不必刻意求解，善讀書者自頌之。」<sup>86</sup>相形之下，何焯採用五臣說法而未詳加辯證，故而受此批評，如潘岳〈西征賦〉「殆肆叔於朝市。」從五臣作「騫叔」、潘岳〈河陽縣作〉二首「連陪廁王寮。」從五臣作「違」……等，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sup>87</sup>以上述「殆肆叔於朝市。」之五臣注為例：

翰曰：愎，很。四，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市之行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己。……<sup>88</sup>

此為一標誌性的五臣注樣板，通注在於「串釋文本大意」而不詳加說明

<sup>82</sup> 劉群棟：《文選唐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頁214-228。

<sup>83</sup> 「荒陋」之語，上自東坡，下自清儒諸家均有此觀點，此不一一臚列。「文本自明，無待辭費」一語，可參《文選音義》，頁8。

<sup>84</sup>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57。

<sup>85</sup> 文引自胡紹煥〈文選箋證自序〉，見（清）胡紹煥：《文選箋證》（聚學軒叢書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12冊，頁207-212

<sup>86</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198。

<sup>87</sup> （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頁872、915。

<sup>88</sup> 劉躍進：《文選舊註輯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10月），頁2074。

「根據」或「來源」。雖然並非所有五臣注皆如上例，但對比此條的李善注全段既引《爾雅》、《禮記注》、《左氏傳》、《論語》、《史記》、《孟子》、《楚辭》、《毛詩》共八種文獻，五臣則顯得無理論根據。<sup>89</sup>而何焯對於這些情況均不詳加辯證求索，恣意採用，不甚嚴謹。

第三，「判斷」過於輕率。《文選》學包羅萬象，自上徵實，下啓課虛，內容體系龐大駁雜，非長久治《文選》者能觀出問題端倪。<sup>90</sup>何焯確實挑剔出有疑義之處，如〈東都賦〉「乘時龍」即引《後漢書注》與〈月令〉篇駁斥李善注的《周易》、〈子虛賦〉「織阿爲御」引《史記索引》補充李善注、〈景福殿賦〉「爰有遐狄」引《魏略》補充李善注。<sup>91</sup>然瑕不掩瑜，部分「判斷」過於輕率，如〈東都賦〉「險阻四塞。」擅將蘇代改爲蘇秦、〈魯靈光殿賦〉「蘭芝阿那於東西。」擅將伏儼改爲伏虔、〈五君詠·向常侍〉評喻擬陶潛說、曹丕〈雜詩〉疑奪嫡而作……等觀點，此不一枚舉。<sup>92</sup>

#### 四、事必有徵，義必有本：檢正何焯的時代意義

續接上文，欲理解清儒推崇與檢正何焯的意義，還是需要回到當下的時代背景。我們從文史上定義清代乾、嘉時期，往往會貼上「考據」的標籤，並伴隨的還有「校勘」。<sup>93</sup>清儒表現學問的方式恰恰兩存並行。

<sup>89</sup> 劉躍進：《文選舊註輯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10月），頁2073。

<sup>90</sup>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2。

<sup>91</sup> 《義門讀書記》，頁860、874；同參《文選舊註輯存》之李善注，頁148、1546、2335。惟〈子虛賦〉「織阿爲御」條不存今本《義門讀書記》，但于光華《集評》、徐攀鳳《糾何》、張雲璈《膠言》均有收錄。

<sup>92</sup> 《義門讀書記》，頁894、931；〈東都賦〉「險阻四塞」、〈魯靈光殿賦〉「蘭芝阿那於東西」條不存今本《義門讀書記》，均無見於于光華《集評》收錄，但徐攀鳳《糾何》收兩條，頁201、209；張雲璈《膠言》談及「險阻四塞」，頁340；梁章鉅《旁證》談及「蘭芝阿那於東西」引何焯語，頁594。

<sup>93</sup> 乾、嘉時期的「考據」風氣，上溯江藩《漢學師承記》：「考鏡不足，儒罕通人。」認爲學問就是要「博」的清楚調門，與章太炎、劉師培、張舜徽論此時學術亦以「博」字形容，所申一致，因此關於乾、嘉清儒恪重考典以致「爭治」的學術成因，可以

當深刻觀察乾、嘉時期的各個著作，其實不難發現，社會所瀰漫的是「訓詁必以漢法，說經宗以漢儒」<sup>94</sup>的主張，所謂：「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蓋不取焉。……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囿，馳騫仁義之塗矣。」<sup>95</sup>這樣「凡漢皆好」的研究基準是專峙於「經術」而言。因此，欲著手處理典籍，不論是經、史、子、集中的那一部，都必需恪守「有理有據」；再加上「正統派學風」<sup>96</sup>鼓吹之下，整體社會瀰漫「嚴謹」的治學法則，凡說法必需實據，否則即為「妄人」、「妄說」。這套治學方法尤其盛行吳、皖地區，兩域中雖有吳地以惠棟為首，皖地以戴震為首的說法。但統括來說，均錄於《漢學師承記》，足見治學上都是遵從漢學，貶斥理學一類的玄談學說。同理，《文選》不免在清代受諸此法，用於「詮釋」與「考據」，由於《文選》體系極為繁複，內容萬象，部帙龐雜，加上李善與五臣的注解詮釋不同，致使處理《文選》極具挑戰。<sup>97</sup>清儒以簡單且單一的視角「詮釋」《文選》——「以經訓藝。」<sup>98</sup>《選學膠言》言：

《文選》有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沉博絕麗，後人莫由窺其堂奧。今欲於尋行數墨忠效愚者之得，不惟不值李氏一哂，直恐

---

蔽言之為「對學問的追求」。請參《漢學師承記箋釋》，頁 14；章太炎、劉師培等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12-20、145-152。

<sup>94</sup> 此為筆者之言，概括清人代表性的觀點。

<sup>95</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 24。

<sup>96</sup> 梁啟超對清代前期歸類十項治學之法，用以概括「樸學」。參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0 月），頁 52-54。

<sup>97</sup> 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點出《文選》詮釋「正文」、「李善注」、「六臣注」的體系，以及歷代不同的需求層次。可見《文選》學的學問並非單一學術。但最主要在於如何「考辨訂補」，而清儒看見李善的方法與「訓詁必以漢法，說經宗以漢儒」相近，故以此發明，也順乎時代風氣。參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118-119。

<sup>98</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201。

為當世嗤鄙。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所詢，且祇被遺忘，非關著述，故既毀而復存。<sup>99</sup>

聖人跡行藏於五經，文學作品的源頭亦體現在五經，所謂「聖人之情，見乎文辭。徵聖立言，其文庶矣。」<sup>100</sup>不論是漢代的立博士官署，或是隋代四部分類，經學之地位無庸置疑，但後代總會將經學與文學兩分而疏遠，視作不同的學問，因此「後人莫窺其堂奧」。

誠如張雲璈等有清一輩，不僅視《文選》與五經地位同等，同時將經學與文學之間的關係繫聯更為緊密，即意味著一切的解答皆在經書內，是為「遵經」；而漢人「去聖最近」，<sup>101</sup>說法最為體貼，是故參考漢儒說法及漢人經訓之法，最能致達「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的漢儒師法，是為「崇漢」。故「遵經」、「崇漢」的影子露出，體現考證《文選》作品上既要理出經書的影子，更需以經傳、漢訓作為詮釋面向，才更能體現學問。

同之，徐攀鳳所言：「以經訓藝。」、「當引『經』，不當引『子』。」<sup>102</sup>的治《文選》觀點亦表明「遵經」立場。<sup>103</sup>徐、張的觀點並非空穴來風，

---

<sup>99</sup> 《選學膠言》，第 7 冊，頁 247-251。

<sup>100</sup> 按：劉勰不論是〈徵聖〉或〈宗經〉，皆重申為文不離聖人之言，而聖言存乎「五經」，以為立文創作之本。（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等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市：里仁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17-18。

<sup>101</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 1。

<sup>102</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注規李》，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67。

<sup>103</sup> 「遵經」自然是部分清人讀書之參核，但學者也並非迂腐，如班固〈西都賦〉「賓曰唯唯。」李善注引〈曲禮〉「唯而起。」，而徐攀鳳、張雲璈主當引《戰國策》，主因在於此處「唯」為一種應聲詞，猶今之「是、好、喔」等詞彙，而〈曲禮〉「唯而起。」倒偏於形容詞，與本意稍左；其次，「唯唯」兩字連用即以《戰國策》最早；故以此為注甚優。綜合上述兩點，清儒也並非昧從，而是俱有文意理解與時序判斷的科學檢則。參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注規李》，頁 116；《選學膠言》，第 7 冊，頁 288。

其代表乾、嘉大部分學者看待文獻、處理典籍的視野，此類觀點又以江南地區尤盛；徐攀鳳出自松江（上海）婁縣，張雲璈江蘇仁和，遊歷江南後定居錢塘，均為江南一帶，固然受此風影響。

徐攀鳳言：「另作《糾何》一卷，遙質諸先生焉。」、張雲璈：「惜不令何氏聞之。」許巽行：「義門亦踵其失，故箸之。」<sup>104</sup>何氏出自江蘇長州，考據成績名重當時，是不少學者爭相效仿的對象之一，自然成為「受評量」的對象。可惜在於考據《文選》上不甚嚴謹，未達部分重視漢學之學者的期望，故於此嚴正批評與檢視，實與整個社會氛圍有密切關聯。

綜觀上述，清人對於治學的標準迥異於歷朝歷代，「一物不知，以為深恥。」<sup>105</sup>博通百家之學儼然成為一種新興的評量基準，尤其發表於士林間尤其是如此，皆必須掌握「實是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理路。<sup>106</sup>站在乾、嘉清儒的治學立場，對與錯反倒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優先看到對方「明確汲引什麼文獻」，才進一步判斷說法的對錯與否及見識高低。何焯提出自身對於文章的賞析觀點，這個行為在其他清儒的解析並不是不可，這種方法影響後續《文選》學家甚多，諸如徐攀鳳、張雲璈、梁章鉅、朱珔、胡紹煥也於其作提出個人觀點。但在自身觀點提出以前，應當優先列舉「依據」做為說法佐證，次要才是自我的判斷案語。這也是近代學者總結認為何焯在校勘《文選》時犯有「求深穿鑿」及「妄改原文」；<sup>107</sup>或雖涉略廣博，卻都不精深的弊端所在。<sup>108</sup>

## 五、結論

《文選》學自唐代以來，對歷代讀書人的影響不亞於經學，尤其版

<sup>104</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 189；《選學膠言》，第 7 冊，頁 341-343；《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107-108。

<sup>105</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 37。

<sup>106</sup>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 7 月），頁 84-95。

<sup>107</sup> 王小婷：《清代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9 月），頁 79-80。

<sup>108</sup> 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93。

本的刊刻複雜更揭示此書對於讀書階層的重要性。到了清代，治《文選》之風日盛，學者之間更是相互指批對方成果，學術的白熱化可見一斑。其中，清代又以何焯最為知名，不少學者嚮慕其成果，但凡考據引證當代學者說法，何氏之言必在其一，足見何焯為有清一代之治《文選》之隆正。

本研究即就於清儒既推崇何焯，又批評何焯之行為感到疑惑，故而在此現象上設計研究議題，除了希望可以借助本研究了解根本的始末外，也釐正清儒對於何焯是否有誤解之處。此題雖是初探，但目前成果已初步了解清儒對於何焯的誤解，係建立於後學編纂之《義門讀書記》。進一步統計集「何校」類著作與集「何評」類著作均有的偏頗與落差，此割裂造成後代的學者對何焯之謬誤。透過筆者客觀的立場，檢視清儒的批評之議，不僅為何焯平反，同時也理解清儒孜孜以求的學術境界，此對於清代《文選》學有著振警愚頑的刺激，也希望更多學者投入此研究之行列。本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大致歸納如下：

首先，根據相關著作的個別統計，了解何焯的《文選》學表現當有校勘、注音、補充與評點 4 種詮釋，但《讀書記》徒存補充與評點，不僅與士林流傳的資料有極大落差，且顯示編纂者蒐羅不全或有意剔除的疑慮；此舉不僅造成何氏的成果模糊，更讓清代學界認為何焯的學問殘缺不全。故透過釐正紀錄差異，了解《讀書記》雖無法全然等於何焯，但其必定有部分來源始於何焯，兩者之間的關聯仍是可以確定的。此也是本研究的優先動機。

其次，何焯校評《文選》一事，不僅是對一部龐大駁雜的學問進行梳理，更為清儒指明《文選》版本上之微瑕。對校上，首以錢士謐本、袁本、茶陵本三家進行處理，成果雖未完整付梓，卻瀰漫在各家著作之中；此舉，給予清儒未來考證方向作一定調。但不論是何焯本人或《讀書記》並未有一字一句行文刻意強調李善注的優越，反倒針對李善注之

不足、不詳而有所批評與補充，所以版本的選擇純粹是著眼時下的孤版，並非有學術傾向；但諷刺的是清代士林間訛傳何焯於「李注多所考證」<sup>109</sup>、「率以李崇賢注爲宗」<sup>110</sup>，錯誤的認知造成清儒認爲何氏應當遵循「漢學」的考據路線，而對其抨擊。

最後，了解整個大時代對於學問的風氣，即苛求於「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sup>111</sup>而注解的「首要目的」是在於「疏通文意」，「次要目的」才進一步展示「自我博學」，而非藉以注解之事來炫己博聞。然，清儒反道行之，首在揚己之博學，次於疏通，這也讓清代學者的著作多半部帙龐大，故對於何焯非「漢學」之法的批評也源在於此。

學者游志誠曾提出：

從徵實與課虛二法之相關選學者論述之，略可概括版本、校勘、輯佚，以及《文選》評點。文選學欲通而貫之，庶幾圓解，尚有待學界戮力以求，各法需兼顧，缺一不可，執偏亦難。故而試擬「文選綜合學」一詞以包括之。<sup>112</sup>

《文選》學並非單一學術，通帙包含歷代文人對於經典的轉化與詮釋，是一龐雜的學問。輾轉至清，清儒卻欲以「經學」對《文選》「再詮釋」，致使一部分清儒對於「李注」狂熱，墮入凡是「盡實」、「詳盡」的論述。而這種考據或可說爲讀書人「自卑心理」的歷史性格與「名人效應」的從眾心態。當然，每個人的學問是需要經過社會考驗、檢視與公評，一如今日。而文史上大部分學者天資聰穎，恃才傲物，彼此看輕對方學問

<sup>109</sup>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30。

<sup>110</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189。

<sup>111</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88。

<sup>112</sup> 游志誠：《文選綜合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4月），頁17。

「其來有自」，所謂「同時之人，恒相輕蔑。」<sup>113</sup>最主要還是基於人（生物）最本初的「競爭心態」，尤其清代讀書人愈來愈多，各項學術大鳴大放，有志、有識之士爲了鞏固自我理念，良性者以周知師長、學侶過目，甚有不解處也會相互詢問；負面者輕鄙對方學問，相互詬端。但最終的共同目的還是在於確保自己的觀點「確不可易」<sup>114</sup>，無法輕易受他人質疑與挑戰。

## 引用書目

### 一、古典文獻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市：洪葉文化出版社，1013 年 5 月）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3 月）
- （南朝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
-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等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市：里仁書局，2007 年 10 月）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攷異：《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4 月）
- （清）江藩、趙之謙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 年 5 月）
- （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清·乾隆四十八年吳天爵重訂增補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 9 月）

---

<sup>113</sup>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296。

<sup>114</sup> （清）江藩、趙之謙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 年 5 月），頁 509。

-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新北市：文海書版社，1988年3月)
- (清)朱珔：《文選集釋》(清·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
- (清)余蕭客：《文選音義》(清·乾隆廿三年靜勝堂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汪師韓：《文學理學權輿》(清·嘉慶間刻讀書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年8月)
- (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月)
- (清)胡紹煥：《文選箋證》(聚學軒叢書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孫志祖：《文選考異》(清·嘉慶間刻讀書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注規李》《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
-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梁章鉅：《文選旁證》(清·道光十八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
-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
- (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
- (清)黃侃：《文選平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

## 二、近人專書

- 王小婷：《清代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9 月）
- 王立群：《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 8 月）
- 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 8 月）
- 王書才：《文選評點述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1 月）
- 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 7 月）
- 韋胤宗：《浩蕩遊絲：何焯與清代的批校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 8 月）
- 徐復觀：《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
- 張舜徽：《鄭學叢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0 月）
- 章太炎、劉師培等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 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年 6 月）
- 游志誠：《文選綜合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10 年 4 月）
- 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
-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 7 月）
- 劉群棟：《文選唐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 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4 月）
- 劉鋒：《文選校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9 月）
- 劉躍進：《文選舊註輯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 穆克宏：《六朝文學研究》，收於《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叢刊（第一輯）》（台北市：萬卷樓圖書，2018 年 9 月）
-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3 月）

### 三、期刊論文

丁旭輝〈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與背景研究的時代意義〉，《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2004年9月，第3期第10卷，頁109-120。

劉薔：〈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諸本版本實情探析〉，收錄《歷史文獻研究》，2019年1期（總第42輯），頁309-316。

### 四、網路資料

（清）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碧梧山莊本，1925年），收於台灣華文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book/NTUL-9910003664/reader>

昌邑國與山陽郡瑣議  
—讀《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札記

陳文豪\*

摘 要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對山陽郡沿革有簡要說明，內容仍可進一步補充。

王國人不戍邊問題，書中認為是漢初之制，景武以後方戍邊。臧知非則認為是漢初之制，二者之間尚有討論空間。據三枚有年號昌邑國簡知最遲在漢武帝晚期王國人戍邊即已存在，由此推論王國人戍邊最早時間雖尚難考察，但將之定景武以後，是可接受的。

山陽郡領縣在西漢共有 31 個縣及侯國。根據漢簡及傳世文獻推估，昌邑國時期應轄有 14 縣。

**關鍵詞：**昌邑國、山陽郡、漢簡、行政區劃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退休副教授

**Trivial Comment on Chang-Yi Vassal State and Shanyang Prefecture**  
—Notes on reading of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China: Qin-Han Volume (Part 1)*

Chen, Wen hao

**Abstract**

The book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China: Qin-Han Volume (Part 1)*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Shanyang Prefecture (山陽郡), the detail needs further supplementation.

Regarding the issue of the Vassal State people not serve to station on the borders, the text suggests it was the regulation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while frontier garrisons were established after the Jing & Wu (景武) era. However, Zang Zhifei (臧知非) argues that it was indeed the regulation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there remains debate between these viewpoints.

According to 3 pieces Chang-Yi Vassal State (昌邑國) Bamboo slips annotated with reign years inscriptions, Vassal State people were already stationed on the borders during the late reign of Emperor Han-Wu (漢武帝). From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while the exact earliest time when Vassal State people were stationed on the borders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placing it after the Jing & Wu (景武) era is acceptable.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hanyang Prefecture administered a total of 31 counties and marquises. Based on Han dynasty documents and transmitted texts, it is estimated that during the reign of Chang-Yi Vassal State, it administered approximately 14 counties.

**Keywords :** Chang-Yi Vassal State, Shanyang Prefecture, Han Bamboo Slip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一、

山陽郡沿革，《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有簡要說明，其順序為：山陽國（前 144-前 136）—山陽郡（前 136-前 97）—昌邑國（前 97-前 74）—山陽郡（前 74-前 33）—山陽國（前 33-前 25）—山陽郡（前 25-8）；同時對山陽郡所領 31 個縣及侯國存續進行考述。<sup>1</sup>

值得重視的是昌邑王被廢後，昌邑國改為山陽郡的轉換過程。勞榘在《居延漢簡考證》，〈戍、邊塞制度、內郡人與戍卒〉條云：

凡戍卒率為諸郡人，無諸侯王國人，蓋諸侯王國人自為其國之衛士，不為戍卒也。漢書賈誼傳云：「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故王國之民不往來長安，繇戍北邊。其在居延簡中惟昌邑國為特例。蓋昌邑王賀以罪廢，其國人不復同於王國之民。據公卿表本始四年大鴻臚梁以山陽太守為大鴻臚，又據漢書昌邑王傳，地節三年五月張敞視事為山陽太守，故昌邑國人遂與諸郡人同戍邊也。<sup>2</sup>

勞榘之意為，王國人不戍邊，昌邑王國人戍邊係因受昌邑王被廢連坐，且始於張敞為山陽郡太守之後。他的另外一篇論文〈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也重申了這個觀點。<sup>3</sup>陳直亦贊同勞氏看法。<sup>4</sup>張壽仁更先後

---

<sup>1</sup>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95-299。

<sup>2</sup> 勞榘：〈居延漢簡考證〉，《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 年），頁 56；又見《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0 本（上）（1959 年），頁 311-491、《勞榘學術論文集甲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394。

<sup>3</sup> 勞榘：〈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1948 年），頁 23-55；收入《勞榘學術論文集甲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209-241

<sup>4</sup> 陳直：〈居延漢簡綜論·戍卒的來源〉，《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天津古出版社，1986 年）頁 16；〈西漢屯戍研究〉，《兩漢經濟史料論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

撰寫〈居延漢簡中之昌邑王國簡及其有關問題〉<sup>5</sup>及〈居延漢簡中昌邑王國簡之斷代〉<sup>6</sup>二篇論文推衍勞說，〈居延漢簡中昌邑王國簡之斷代〉並獲馬先醒之贊許，<sup>7</sup>但張壽仁此文觀點均有待商榷。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早已指出「王國人不戍邊」的觀點不正確；<sup>8</sup>拙文〈昌邑王國簡新論〉亦有討論。<sup>9</sup>〈漢簡所見地名考〉於 1953 年發表在〈東洋史研究〉第 12 卷第 3 號，因受論著撰寫時間先後、當時和國內外學術交流局限、語言等客觀環境的制約，陳直、張壽仁及馬先醒等人未能參考日比野丈夫的看法而致觀點有誤，不必予以苛責。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論及山陽郡沿革，未引上述勞榦相關說法。但在論河西四郡設置時，引勞榦另一段敘述：

至宣帝初立，昌邑王罷歸故國，昌邑國名雖未廢，而昌邑國人則屯戍北邊，不以王國人遇之。（昌邑國據昌邑王傳云王歸國後，地除為山陽郡。但簡中戍卒尚有昌邑國名，或至少在數月之後。漢書公卿表本始四年，山陽太守梁為大鴻臚不至晚過此時。<sup>10</sup>）此類名籍

---

年），頁 5。

<sup>5</sup> 張壽仁：〈居延漢簡中之昌邑王國簡及其有關問題〉，《勞貞一先生七秩榮論文集》（《簡牘學報》第 5 期（1977 年）），頁 351-365。按：本文係張壽仁碩士論文〈「居延漢簡」吏卒籍貫之地理分布〉（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年）第五章〈「居延漢簡」中之昌邑王國簡〉之初稿。

<sup>6</sup> 《簡牘學報》，第 6 期（1978 年），頁 53-59。

<sup>7</sup> 馬先醒：〈簡牘之斷代、接合與編連一跋「居延漢簡中昌邑王國簡之斷代」〉，《簡牘學報》，第 6 期（1978 年），頁 60。

<sup>8</sup> 〔日〕日比野丈夫著、張亞平譯：〈漢簡所見地名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第 2 輯，頁 339-351。

<sup>9</sup> 2016 年 4 月 15-18 日「南昌海昏侯墓發掘暨秦漢區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修訂稿待刊。

<sup>10</sup> 括號內為勞榦自注，原以小一號字排版。「漢書公卿表本始四年，山陽太守梁為大鴻臚不至晚過此時」一段。《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所引為「然至晚應不得逾地節三年敝視事山陽之後。」按：「然至晚應不得逾地節三年敝視事山陽之後。」

簡見釋文名籍類。其同時同地出土者，有大河郡及淮陽郡戍卒名籍。此二郡宣帝初年亦俱分封為國，簡中名籍稱郡，正與昌邑未改郡名同時。惟騎士名籍則張掖所屬諸縣，如鶻得，昭武，氐池，日勒，番和，居延，顯美等縣俱有其人，而武威所屬諸縣則無一人。是宣帝初年武威蓋已立郡，故其正卒戍武威緣邊，不戍張掖屬之居延矣。<sup>11</sup>

在此段引文後，《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作者接著進行分析：

勞榦這個推論至少有三層錯誤。首先，王國人不戍邊乃漢初之制，景武以後，諸侯王特權被削，王國地位下降，等同漢郡，王國人亦須戍邊，居延漢簡名籍中尚有自來自梁國、趙國、平干國之戍卒可以為證，昌邑並非特例。其次，漢制王國一旦廢除，即為漢郡，概莫能外，所謂「昌邑國名雖未廢」乃臆斷之詞。昭帝元平元年（前 74）昌邑王廢，其故國即除為山陽郡，隨後派遣太守，不能遲至七年以後的地節三年才有首任山陽太守視事。事實上《漢書》卷 19〈百官公卿表〉載本始四年「山陽太守梁為大鴻臚」，證明張敞以前至少已有一名山陽太守。因此，昌邑國簡當悉為昭帝元平元年以前之物，與宣帝無涉。第三，大河郡置東平國在甘露二年（前 52），已近宣帝末年，淮陽郡置國在元康三年，亦入宣帝中期，怎能說：「此二郡宣帝初年亦俱分為國」？勞榦的推理過程是，王國人不戍邊，而昌邑國人竟戍邊，可見昌邑國除而名未廢，因此昌邑國簡是宣初之物，於是之以之作為確定武威郡置郡年代的標尺，這顯然是很

---

非勞榦自注，屬後文，原文為：「故據漢簡推定武威置郡之大致年代，早不得逾元鳳三年十月，此簡行文之時代；晚不得逾地節三年五月，張敞視事山陽之時代。」

<sup>11</sup>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居延漢簡考釋之部》，頁 26；又見《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0 本（上）（1959 年），頁 374、《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篇》，頁 322。

不妥當的。<sup>12</sup>

上述三個推論基本沒太大問題。但整段文字未見一個注解，顯然是作者的創見。其實，對此可再做一些補充說明。

關於王國人不戍邊乃漢初之制度問題，臧知非〈西漢屯戍制度的幾個問題〉一文，有不同見解，他認為：漢初諸侯王勢力雖然很大，有治民權，但其所行各項法律制度仍是漢制，人民的義務和郡縣民沒有什麼不同。根據漢簡資料，說景帝以前，諸侯王有治民權，其民不戍邊是誤解賈誼的話。諸侯王國民自漢初就有戍邊義務。<sup>13</sup>

其次，「昌邑國簡當悉為昭帝元平元年以前之物，與宣帝無涉」之說，未見論證。臧知非引陳公柔、徐蘋芳的說法，據居延漢簡 275.16、308.34 號簡，認為武帝後元元年和後元二年之物，<sup>14</sup>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居延漢簡中有年號昌邑國簡為三枚，分別是：

出糜七石二斗 六月丁巳朔以食昌邑校士四人盡丙戌卅日積百廿 人人六升	275.16
食昌邑校士三人七月辛巳盡庚戌卅日積九十人人六升	308.34
昌邑方與士里陳徐 十二月癸巳病傷頭右手傅膏藥	149.19,511.20

根據徐錫祺編《西周（共和）西漢曆譜》一書所載：

昭帝元平元年六月，有丁卯、丁丑、丁亥。

昭帝元平元年七月，有辛丑、辛亥、辛酉。

<sup>12</sup>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頁 183。

<sup>13</sup> 臧知非：〈西漢屯戍制度的幾個問題〉，《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6 年第 4 期（1984 年 8 月），頁 9-12；收入氏著，《戰國秦漢行政兵制與邊防》（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73-181。

<sup>14</sup> 臧知非：〈西漢屯戍制度的幾個問題〉，《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6 年第 4 期（1984 年 8 月），頁 9-12；收入氏著，《戰國秦漢行政兵制與邊防》，頁 173-181。

昭帝元平元年十二月，有癸亥、癸酉、癸未。

宣帝本始元年六月，有丁卯、丁丑、丁亥。

宣帝本始元年七月，有辛卯、辛丑、辛亥。

宣帝本始元年十二月，有癸亥、癸酉、癸未。<sup>15</sup>

據此，這枚三簡月日，不在昭帝元平元年六月至宣帝本始元年十二月之內，亦即昌邑王國人戍邊早在昌邑王被廢以前。而簡 275.16 有「六月丁巳朔」的記載，在昭帝元平元年之前，最近的「六月丁巳朔」為漢武帝後元元年，<sup>16</sup>這和陳公柔、徐蘋芳的說法吻合，說明昌邑王國人戍邊早在漢武帝晚期即已存在，由此推論王國人戍邊最早時間雖尚難考察，但將之定景、武以後，是可以接受的。

## 二、

山陽郡所領縣（侯國），《漢書·地理志》所列有 23 個，<sup>17</sup>此為西漢末年現況，同時也未明確指出 23 縣中那些是昌邑國領縣。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所考有 31 個，分別為：昌邑縣、南平陽縣、成武縣（成武侯國）、胡陵縣（湖陵縣）、東緡縣、方與縣、橐縣、鉅野縣、單父縣、郁狼侯國（郁狼縣）、瑕丘侯國、寧陽侯國、劭侯國（劭縣）、樊縣、爰氏侯國、爰戚侯國、郟成侯國（郟成縣）、都關縣、柁侯國、中鄉侯國、平樂侯國、鄭侯國、甯鄉侯國、黃侯國、城都侯國、栗鄉侯國、曲鄉侯國、西陽侯國、薄縣、己氏縣、虞縣。<sup>18</sup>

---

<sup>15</sup> 徐錫祺：《西周（共和）至西漢曆譜》（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年），頁 1535-1537。

<sup>16</sup> 徐錫祺：《西周（共和）至西漢曆譜》，頁 1507；饒尚寬，《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公元前 722 年～公元 220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167。

<sup>17</sup>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頁 157。

<sup>18</sup>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頁 295-299。

以上所述是縱貫整個西漢一代而言。這 31 個縣（侯國）中那些是昌邑國時屬縣？《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云：

昌邑所領，與山陽郡稍有差異。居延漢簡有簡文曰：「昌邑國樊郭東里……」樊縣《漢志》屬東平國，是武帝置昌邑國以樊縣益之，甚至未必僅取此一縣益昌，然餘縣無考，暫不取。故可知昌邑置國之初，除所得王子侯改隸它郡外，又得原大河郡之樊縣。<sup>19</sup>

昌邑國於天漢四年（前 97）分封，昭帝元平元年（前 74）國除為山陽郡。《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所列昌邑國被廢後所設縣為：郃成縣（前 5-1）、都關縣（前 52-前 33，前 25-8）、薄縣（？-前 33，前 25-前 5）、己氏縣（？-前 5）、虞縣（？-前 5）。<sup>20</sup>

排除上述諸縣及侯國，可以得出昌邑國領縣為 12：

昌邑縣（前 144-8）、南平陽縣（前 144-8）、成武縣（前 144-5）、湖陵縣（前 144-前 140）（湖陵縣〔前 140-8〕）、東緡縣（前 144-8）、方與縣（前 144-8）、橐縣（前 144-8）、鉅野縣（前 144-前 33，前 25-8）、單父縣（前 144-前 33，前 25-前 5）、郁狼縣（前 112-？）、劭縣（前 100-？）、樊縣（前 97-前 74）。<sup>21</sup>

《居延漢簡》所見昌邑王國屬縣，除前述樊縣、郁狼縣外，尚見其

<sup>19</sup>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頁 295。

<sup>20</sup>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頁 295-299。

<sup>21</sup>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頁 295-299。按：郁狼縣說法係參考馬孟龍說法。見馬孟龍：〈居延漢簡地名校釋六則〉，《文史》2013 年第 4 輯（2013 年 11 月），頁 267-27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牘整理小組利用紅外線掃描技術對延漢簡重釋文，亦將原「湖陵」改為「郁狼」，見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年），頁 138。

他屬縣，爲東邠、西邠及邠。日比野丈夫稱其爲「三邠」其內容爲：

昌邑東邠塵中里宋當時二百十七	□	☑	299.9	299.12
昌邑國東邠西安里丁	□			90.14
☑東邠趙	□	☑		149.39
戍卒昌邑國西邠西土里朱廣德			假有方一完	512.24
田卒昌邑國西邠西夜里	☑			510.29
田卒昌邑國西邠	□	龍里張	☑	515.23
		袍一領	泉履一兩	
田卒昌邑國邠良里公士費塗人年廿三				
		單衣一領	□綉一兩	19.36
		袍一領	泉履一兩	
田卒昌邑國邠成里公士暴叨之年廿四				
		單衣一領	□一兩	303.47
		襲一領	泉履一兩	
田卒昌邑國邠靈里公士包建				
		單一領	□一兩	509.30
田卒昌邑國邠靈里公士朱廣年廿四				513.35
田卒昌邑國曲（西？）邠（邠？）高	□	☑		514.42
田卒昌邑國宜年（油印本將這二字印成邠宜羊（里）				
		袍一領	泉履一兩	
公士卿奉德年廿三				
		單衣一領	□一兩	303.40

以上這 12 枚簡簡文係據照錄〈漢簡所見地名考〉譯文所載，其中某些釋文在目前已有修訂，同時譯文所引簡號也有些訛誤，不知是原文即誤或是手民之誤？爲呈現原貌，方便討論，故不加修正。

這三個縣名在《漢書·地理志》都未能找到，日比野丈夫認爲「邠」

應爲「邠」，稱其爲「三邠」。「邠」爲「邠」的說法，一度曾獲得學界認可，但馬孟龍指出邠、邠二字寫法差別較大，且居延漢簡中不見有「東邠」、「西邠」或「昌邑國邠」之類的詞例，且洛陽南郊東漢刑徒墓地出土 P10M35：1 墓誌銘文磚中「汝南邵陵」之「邵」字也寫作「邠」形，因此上述漢簡中的「邠」，皆爲「邵」字的誤釋。同時據《漢書·王子侯表》載漢武帝時元朔三年（前 126 年）封，天漢元年（前 100 年）有邵侯國，此表「邵侯」條下注郡名「山陽」，在山陽郡之邵侯國廢除後，改置爲邵縣，並延續至昌邑國時期，爲昌邑國屬縣。<sup>22</sup>此一說法也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所接受。<sup>23</sup>

至於西邠與東邠，日比野丈夫指出《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條下西陽侯國，並引錢大昕的說法，西陽可能是西防之誤，<sup>24</sup>其意爲西邠即西防。西邠既即西防，日比野丈夫進而認爲東邠即東防，他指出《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下有一稱作防東的縣，並引《大清一統志》記載：「本春秋防邑，後謂之西防城。後漢置防東縣，在西防之東故名。」爲證，而說「似乎認爲東防位於西防的正東方」。其結論爲，「居延漢簡不僅證實了斷定西陽爲西防之誤的錢大昕學說的正確性，而且證明了在前漢的武帝和昭帝時期昌邑國除了西防之外，還有東邠和邠二個縣。」<sup>25</sup>

馬孟龍討論的是漢簡地名的誤釋，未涉及西邠及東邠的討論可以理解，但《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所列昌邑國領縣卻未列出西邠、東邠二縣，或許和日比野丈夫所的結論有矛盾有關，例如其云：「大

<sup>22</sup> 馬孟龍：〈居延漢簡地名校釋六則〉，《文史》2013 年第 4 輯（2013 年 11 月），頁 267-275。

<sup>23</sup>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頁 295-299。

<sup>24</sup> （日）日比野丈夫著、張亞平譯：〈漢簡所見地名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 2 輯，頁 339-351。

<sup>25</sup> （日）日比野丈夫著、張亞平譯：〈漢簡所見地名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 2 輯，頁 339-351。

約在西漢末期僅有一個西防侯國，到東漢時則以防東的名稱留下了它的遺迹。」<sup>26</sup>

那麼西邠及東邠是否為昌邑國屬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牘整理小組利用紅外線掃描器建立新圖檔，對於居延漢簡釋文作了較清晰的隸定，於此舉出 510.29 及 512.24、90.14 及 299.32+299.9A 四枚簡為證（圖版見文末），這四枚簡的「西邠」及「東邠」字跡都非常清楚，說明昌邑國屬縣應是有西邠及東邠二縣，日比野丈夫的推論應是正確的。至於西邠是否西防則尚待考慮，因為錢大昕僅指出西陽可能是西防，但並未直接指出西防即西邠，這是日比野丈夫的推論。而關於東邠的論證，日比野丈夫的說明則充滿矛盾，首先他指出《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下有防東縣，這是後漢著名宦官侯覽的故鄉，作為侯覽的原籍的記載也見於《後漢書》的〈侯覽傳〉〈周景傳〉〈張儉傳〉〈黨錮傳〉；同時《金石萃編》的建和元年敦煌長史武斑碑、《濟寧金石志》的漢元嘉三年郎中正政碑、《繆篆分韻》也均有「防東長」等，但防東顯然並非東防之誤；而「大約在西漢末期僅有一個西防侯國，到東漢時則以防東的名稱留下了它的遺迹。」<sup>27</sup>的結論也下得太武斷。

### 三、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在山陽郡（昌邑國）沿革領縣有明確的論述。涉及政治史者受論述體例影響，略顯不足。對王國人是否戍邊問題，承續前人說法，認為是漢初之制。對不同意見如臧知非之王國人漢初需戍邊，未見討論。據三枚有年號昌邑國簡知最遲在漢武帝晚期王國人戍邊即已存在，由此推論王國人戍邊最早時間雖尚難考察，

---

<sup>26</sup>（日）日比野丈夫著、張亞平譯：〈漢簡所見地名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 2 輯，頁 339-351。

<sup>27</sup>（日）日比野丈夫著、張亞平譯：〈漢簡所見地名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 2 輯，頁 339-351。

但將之定景、武以後，似乎略嫌保守。

對於昌邑國簡當悉為昭帝元平元年以前之物，本文就三枚有年號昌邑國簡牘進行補論。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指出昌邑國時領縣有 12 縣，但據《居延漢簡》所載，應再加上西邠及東邠二縣，應有 14 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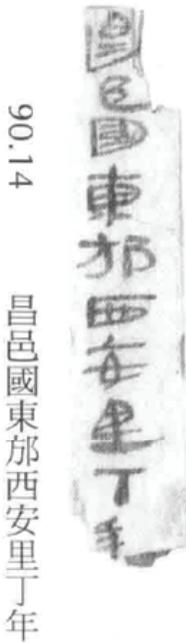


圖一：510.29 號簡



圖二：512.24 號簡

圖一、二：510.29 及 512.24 號簡分別見於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106 年 11 月），頁 173、177



圖三：90.14 號簡



圖四：299.32+299.9A 號簡

圖三、四：90.14 號簡見於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103 年 12 月），頁 265；299.32+299.9A 號簡見於《居延漢簡（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105 年），頁 245。

後記：本文為 2018 年 10 月 13-16 日在山東鉅野縣參加「西漢昌邑王國及海昏侯國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會議後並主辦單位並未出版論文集，故此文未曾正式發表。原文撰寫時未遑參考日比野丈夫〈漢簡所見地名考〉一文，現參考該文對內容進行增補修改。

2021 年 6 月 30 日

## 引用文獻

### (一) 古籍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

### (二) 專書

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

陳直：〈居延漢簡綜論·戍卒的來源〉，《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天津古出版社，1986年)。

陳直：〈西漢屯戍研究〉，《兩漢經濟史料論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徐錫祺：《西周(共和)至西漢曆譜》(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

饒尚寬，《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公元前722年～公元22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三) 期刊論文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1959年)。

張壽仁：〈居延漢簡中之昌邑王國簡及其有關問題〉，《勞貞一先生七秩榮論文集》(《簡牘學報》第5期(1977年))。

張壽仁：〈居延漢簡中昌邑王國簡之斷代〉，《簡牘學報》，第6期(1978年)。

馬先醒：〈簡牘之斷代、接合與編連一跋「居延漢簡中昌邑王國簡之斷代」〉，《簡牘學報》，第 6 期（1978 年）。

臧知非：〈西漢屯戍制度的幾個問題〉，《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6 年第 4 期（1984 年 8 月）。

馬孟龍：〈居延漢簡地名校釋六則〉，《文史》2013 年第 4 輯（2013 年 11 月）。

#### （四）文集論文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日）日比野丈夫著、張亞平譯：〈漢簡所見地名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第 2 輯。

臧知非：〈西漢屯戍制度的幾個問題〉，《戰國秦漢行政兵制與邊防》（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7 年）。

#### （五）學位論文

張壽仁：《「居延漢簡」吏卒籍貫之地理分布》（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年）。

## 文獻考釋

## 夏思涸〈落花無言賦〉考釋

吳福助\* 張莉涓\*\*

## 【作者】

夏思涸(1798-1868)，字涵波，號少岳，安徽銅陵縣鐘鳴鎮泉欄村人。清道光14年(1834)應鄉試中舉，選任蕪湖縣訓導，後升任穎州府教授。博學廣聞，詩、文、賦俱佳。著有《少岳詩稿》、《少岳文稿》、《少岳賦草》、《少岳改課》等，行於市。時任安徽按察使的吳坤認為，夏思涸著作，「異域亦多購之，近世以來，最為罕有。」稱夏思涸為「銅陵之傑出也」。夏思涸七十歲告老還鄉，居鐘鳴泉水坑上山續東麓，日以文章山水自娛。病逝後，其著作大都散佚，現僅存《少岳賦草》。《少岳賦草》用詞構句，清新可愛，流傳最廣，翻印50次以上。<sup>1</sup>

## 【提要】

本篇篇題「落花無言賦」下，作者註：「以『東風無力百花殘』為韻。」作者註：「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典雅》：「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按：「典雅」是唐代文學批評家司空圖所列舉二十四種文學寫作風格之一。《二十四詩品》：「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蔭，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司空圖受老莊哲學影響深厚，他解釋的「典雅」風格，主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講客廣播電臺「喜感故事」節目企劃主持。

<sup>1</sup> 以上參考(1)踪凡：〈提要〉，《歷代賦學文獻輯刊》第14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7年3月)。(2)詹杭倫：〈晚清至民國一部流行的賦集—論夏思涸的《少岳賦草》〉《新亞學報》29卷，(2011年03月)。(3)王淑蕙：〈晚清《少岳賦草》版本、流傳與在臺運用〉，《國文學報》65期，(2019年6月)。

要是指自然界的優雅恬靜的物象表現，與人對社會事物的超脫而出現的一種沖虛淡泊的無功利、無慾念的心態。司空圖所要求的「典雅」風格，是玉樹臨風、竹修菊雅式的雅潔，是超塵脫世、賞月眠琴般的淡逸。因此，這種風格作品中的景，應是「幽」的景；情是「淡」的情。「幽淡」之中，「典雅」之趣油然而生。例如王維〈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這種意趣，不是追逐功利的哀樂，也不是佛國淨土的死寂，它飄逸而不虛枉，語淡卻逸韻深遠，典雅之味盡現無遺。<sup>2</sup>本賦命題，取材自司空圖所標舉「典雅」風格的批評術語，可謂別出心裁。

本賦書寫對春天花卉絢爛色彩、醉人芬芳的渴慕迷戀，集中描寫落花的飄泊不定，無所依歸的悲慘命運。透過綠珠、卓文君、息媯、倩女、班婕妤、王昭君六位著名薄命紅顏悲慘故事的引喻，比喻落花「零落為塵輾作泥」的悲慘命運，加強落寞感，增添淒清色彩、悲涼情緒。融情入景，寄興深微，感慨萬端，沉摯動人。姜兆蘭箋註評曰：「規〈洛神〉於子建，仿〈梅花〉於廣平，其細膩熨貼處，亦復有神無跡，真妙手也。」指出本賦模擬來源，可供參考。

《少岳賦草》續集收有〈落花賦〉，全文如下：

春意闌兮將欲歸，愁復愁兮花亂飛。飄紅墜白知幾許，怕向閒庭開翠幃。爾乃枝頭狼藉，林下參差，點蒼苔兮款款，依芳草兮離離。燕尾掠兮半散，蛛絲結兮暫遲。憾東風兮濫蕩，致濃華兮離披。兼之宿雨未歇，曉煙尚掩，玉顏寂寞，紅塵銷磨。畫欄外兮掃更積，碧池頭兮吹復多。春色已若此，人情將奈何？譬如美人傷遲暮，年華去不來。半生精力倦，一場幽夢回。殘妝都卸卻，心事更成灰。

---

<sup>2</sup> 以上參考莊濤等編著《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惜春春不顧，零落真可哀。於斯時也，或牽離思，或動遠情，依依脈脈，窮而復生。歎繁華兮盡委，感風景兮倏更。情緒亂兮相似，神魂飛兮暗驚。花無言兮自謝，人有淚兮同傾。蓋以開落有定，去住不侔。任浮沉兮終老，隨上下兮何求？盛衰一瞬，胡可自由？觸余懷兮渺渺，向天涯兮凝眸。

〈落花賦〉對落花進行多視角全方位的描寫，內容正可與本篇對照參考。

### 【作品】（第一段）

春愁脈脈〔1〕，花事匆匆。開窗夢覺，小院雲空。散零香兮碎粉，墮敗絮兮殘紅。寂然無語，各自西東。

### 【考釋】

〔1〕〔脈脈〕連綿不斷貌。明陳所聞〈閨怨〉：「機中錦字添，鏡裏朱顏變。脈脈春愁，都付鶯和燕。」

### 【今繹】

春天光景變化迅速，撩起人的憂傷情緒，連綿不盡，無邊無際。繁花突然盛開，轉眼卻又紛紛凋落，倉促變幻。剛才偶然打開窗戶，才喚醒春夢，發現本來如繁雲般盛開的花朵，如今都已飄零殆盡，一片空寂。零星散落的芬芳花朵，如今都已變成零碎的粉末。迎風飛舞的敗絮，也只剩下一片片殘餘的紅痕。花朵各自飄零西東，四周悄悄地，一片寂靜，沒有任何聲息。

### 【作品】（第二段）

乍經細雨，便下芳叢。飄來曲檻，撲向屏風。如綠珠〔1〕兮絕命，悄墜樓中。容顏已改，脂粉全無。重嫌露濕，軟倩風扶。

### 【考釋】

〔1〕〔綠珠〕人名。據《嶺表錄》記載，綠珠美而艷，石崇以珍珠三斛

致之。後孫秀求之，崇不與。秀怒，勸趙王倫收崇。崇謂珠曰：「我爲爾得罪。」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 【今釋】

花朵經過幾番細雨的摧毀，便從芬芳的枝幹脫落，紛紛飄來曲折的欄杆，又撲向屏風。恍如一心爲石崇效死的綠珠姑娘，悄悄地投樓墜身，一下子斷絕可貴的生命。容貌玉顏頓然改變，脂粉也全都退去不見了。再加上多次濕冷露水的澆淋，全身軟趴趴的，只好等待冷風前來扶持了！

### 【作品】（第三段）

如文君〔1〕兮新寡，靜立庭隅。去住何依，勾留無力。傷每因春，空原是色〔2〕。

### 【考釋】

〔1〕〔文君〕指卓文君。漢臨邛富翁卓王孫之女，貌美，有才學。司馬相如飲於卓氏，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曲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2〕〔空原是色〕色，空，佛教語。色，謂物質的形相。空，謂其虛幻的本性。《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謂一切事物皆由因緣所生，虛幻不實。

### 【今釋】

又恍如西漢臨邛富翁的愛女卓文君，晴天霹靂，婚姻遭到劇變，丈夫突然不幸去世，因而獨自無聊地站立庭院的角落，頓覺失去依靠，茫然不知所措。從此每次看到春色滿園，便悲傷不已，頓悟一切事務皆由因緣所生，虛幻不實。

### 【作品】（第四段）

默默兮如息媯〔1〕含愁，淚沾胸臆。倦蝶兩三，殘英千白。瘦影堪

憐，餘芳足惜。

### 【考釋】

〔1〕〔息媯〕春秋時息侯的夫人。媯姓。楚文王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傳說息媯以國亡夫死之痛，與文王不通言語，問之，對曰：「吾一婦而事二夫，縱弗死，其又奚言？」見《左傳》莊十四年。

### 【今釋】

又如春秋時期息侯夫人息媯，抱持國亡夫死之痛，含愁默默，淚沾胸臆，與楚文王不通言語。面對滿林殘缺零亂的千百落花，三三兩兩偶然出現的倦飛蝴蝶，夫人枯瘦的身影令人愛憐，僅餘的花朵芳氣讓人惋惜不已。

### 【作品】（第五段）

黯黯兮如倩女〔1〕無家，身離魂魄。片片橫斜，春去天涯。無聲到地，解語誰家？憾春風兮草草〔2〕，銷世界兮花花。

### 【考釋】

〔1〕〔倩女〕《太平廣記》卷358引唐陳玄祐〈離魂記〉載：清河張鎰曾欲以幼女倩娘許配外甥王宙，後又悔約別許他人，以致倩娘抑鬱成病。一日，王宙乘船離去，夜半時倩娘忽至，遂相偕赴蜀。居五年，生二子。後同歸寧，張鎰大驚，以其女病臥閨中未嘗外出。病女得訊出迎，與宙妻合為一體。張鎰乃知出奔之女即倩娘精魂所化。後遂用為典故。宋張炎〈疏影·梅影〉：「依稀倩女離魂處，緩步出前村時節。」金有〈倩女離魂〉諸宮調，元鄭光祖有〈迷青瑣倩女離魂〉雜劇，即據〈離魂記〉本事敷演而成。即倩娘精魂所化。

〔2〕〔草草〕匆忙倉促的樣子。

### 【今釋】

又如唐朝小說〈離魂記〉中的倩女，幽魂脫開軀魄，遠遊他鄉。恍如花瓣一片片地橫斜飛去，流浪到天涯海角。偶然靜悄悄地飄落地上，不曉得飄落到誰家庭前？可嘆的是春風倉促無情，頓然削去這花花世界的繽紛爛漫色澤。

### 【作品】（第六段）

比婕妤〔1〕之被棄兮，抱芳心而莫訴；比王嬙〔2〕之遠嫁兮，既薄命而何嗟？

### 【考釋】

〔1〕〔婕妤〕宮中女官名。漢武帝時始置，位視上卿，秩比列侯。此指漢成帝嬪妃班婕妤。徐令班彪之姑，班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為成帝所寵愛。後成帝幸趙飛燕姊弟，冠於後宮。婕妤自知見薄，乃退居東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傷悼。後人傷之而為《婕妤怨》。參閱《漢書·外戚傳下·孝成班婕妤》。

〔2〕〔王嬙〕西漢南郡秭歸（今屬湖北）人，名嬙，字昭君，晉時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元帝時被選入宮，竟寧元年（公元前 33 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和親，昭君自請嫁匈奴。入匈奴後，被稱為「甯胡閼氏」。現呼和浩特市南郊，有王昭君青冢。《西京雜記》卷 2：「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昭君故事後來成為詩詞、戲曲、小說等的流行題材。參閱《漢書·匈奴傳

下》、《後漢書·南匈奴傳》。

### 【今釋】

又如西漢成帝嬪妃班婕妤，因趙飛燕姊妹的闖入而失寵，退居東宮，抱持芳心，無處傾訴，只好寫作詩賦，自傷自悼，自我療慰。又如西漢王昭君，由於不肯賄賂畫家，導致自請遠嫁匈奴。命運既然如此衰薄，還該惋惜慨歎些什麼嗎？

### 【作品】（第七段）

空自憑欄，誰與為歡？燕應語老，鶯並歌殘。亦復愴焉欲絕，惘然〔1〕難安。感春光之遲暮，頓交集乎百端。

### 【考釋】

〔1〕〔惘然〕惘，ㄉㄨㄛˋ。憂愁的樣子。

### 【今釋】

在這暮春時節，我獨自憑欄遠眺，觀看眾花飄落，有誰共同訴說歡樂？飛燕黃鶯都在慨歎春光退去，殘餘無多。令人頓感憂傷不已，悽愴欲絕。眼看著春天明媚光景即將結束，心頭百感交集，真是萬般無奈啊！

### 【〈落花無言賦〉插畫構想】（陳光育，插畫、圖文工作者）

畫面使用了許多隱喻的元素，包含色彩的安排。以舞臺上女旦穿上最華美的服裝，終將在謝幕後回歸冷清寂寥的場景，去對應「春愁脈脈，花事匆匆。開窗夢覺，小院雲空。散零香兮碎粉，墮敗絮兮殘紅。寂然無語，各自西東。」做為聯想。

色彩安排裡，戲台上的女旦身穿的紅衣，使用了傳統顏料色中的「胭脂」。胭脂為古代女子妝扮時不可或缺之物，以身穿胭脂色外衣的女旦，去強調綠珠、卓文君、息媯、倩女、班婕妤、王昭君這六位紅顏，皆因大時代因素而妝扮自己，在眾目睽睽下站在人生的舞臺上。而紅衫內的

白綠與紅梅，則象徵著她們最純粹的青春，又或是最單純的自己。也唯有以戲劇的方式，能夠在一人身上同時扮演六位紅顏，傳唱六位紅顏的心聲。

舞臺佈景中的夕陽，與舞臺上的殘菊，使用相同顏料色中的「橙」與「山吹」，藉此呼應彼此喻意「遲暮」。舞臺佈景則使用中國紋飾中含有浪花意象的水紋。浪花的濺起與消褪、舞臺上的紅顏、四落的桃花瓣與殘菊，這幾個元素所交織的畫面，藉以傳達作者於本賦第七段「感春光之遲暮，頓交集乎百端」的感嘆之情。



〈落花無言賦〉插畫/陳光育繪製

書評

推廣公眾考古教育的範作——

屈慧麗《中部人說故事：兼錄黃炫星先生捐贈水蛙窟遺址標本》讀記

吳福助\*

書名：《中部人說故事：兼錄黃炫星先生捐贈水蛙窟遺址標本》

作者：屈慧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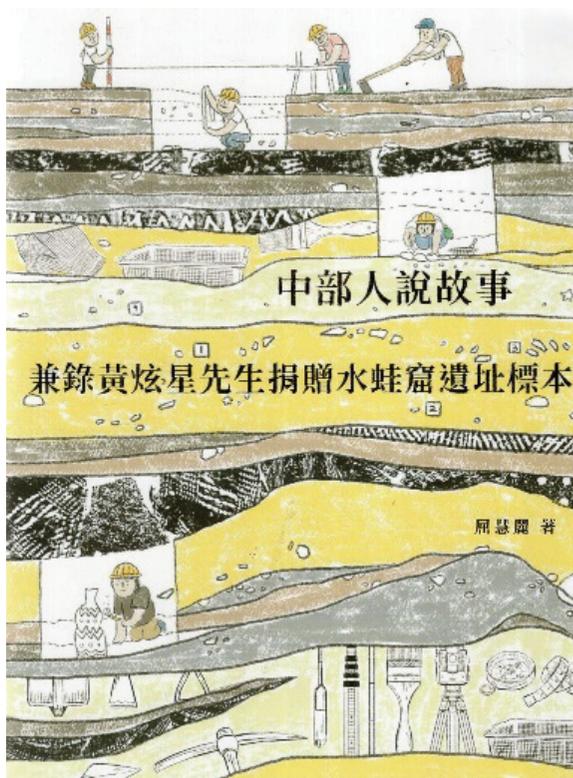
出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版次：2023年12月初版

GPN：1011201600

ISBN：978-626-345-368-5

本書作者屈慧麗，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主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SU）人類學系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碩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



理系博士。長期在博物館工作，從事考古田野與文物研究，曾參與並主持多處的臺灣考古挖掘，包括：臺東卑南遺址、臺中南屯山仔腳遺址、知高遺址、彰化八卦台地福田里遺址、臺中新社區福民國小遺址、竹北犁頭山遺址、臺中西大墩遺址、頂橋仔遺址、惠來遺址、安和遺址、麻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糞埔遺址。策展經驗，包括：「失落史前惠來人」、「城市考古」、「古早臺中人」、「家在筏子溪畔——西大墩市定考古遺址」、「中興國農頂橋仔文物展」、「鼎立三十」、「古代人說故事」等。從以上作者豐富的學歷、經歷與專長來看，作者確實是罕見難得的推廣公眾考古教育書籍撰寫的最佳人選。

## 一、本書特色

筆者很榮幸接獲作者贈書，拜讀之餘，認為本書確實是值得大力推薦的推廣公眾考古教育的範作。本書特色如下：

### （一）綱舉目張

本書分為二篇。第一篇古代人說故事，講述臺灣中部考古學綱要，為本書主要內容。第一章，時間停止在地底的痕跡——考古學，為序言。第二章，臺灣舊石器時代人群從何而來？第三章，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態遺留。第一節，植物，第二節，動物。第四章，臺灣中部文化層序與考古遺址。第一節大坌坑文化，第二節牛罵頭文化，第三節營埔文化，第四節大馬璘文化，第五節番仔園文化，第六節歷史時代漢人文化。第五章，考古文物修復展示室，舉製陶工具轆轤為例，分述清洗、晾乾、分類、修復、編號、測量、記錄、拍照、測繪、典藏入庫。第二篇水蛙窟遺址與黃炫星老師的捐贈標本。第一章水蛙窟遺址，第二章黃炫星老師的考古探索，第三章黃炫星老師的捐贈標本，第一節捐贈標本入館狀態，第二節捐贈標本個人註記，第三節陶質標本，第四節石質標本，第五節玉質標本。第四章小結。前有序言。後有後記。最後是參考文獻目錄。全書提綱挈領，結構緊湊，體系完密，詮釋評析詳贍，引證參考文獻豐富，符合嚴格的考古學學術規範，文筆尤其朗暢，便利研讀。

### （二）圖文並茂

本書 167 頁，除極少數 7 頁外，全書每頁均附插圖及表。插表有考

古事件、遺址遺物資料、文化層序、動植物譯名等。插圖有古物影像、標本影像、相關人物影像、陶器紋飾圖等。圖表高達數百幅，另有手繪考古工作實況圖，作為補白，增添閱讀情趣。

## 二、再版建議

（一）本書以第一篇「古代人說故事」為主，說的是台灣中部考古的一般常識。「故事」，一般指運用通俗語言描寫人物或事件，具有生動情節的文學體裁。用來指稱考古學常識，明顯不夠明確。建議改稱《臺灣中部考古學趣談》，或稱《臺灣中部考古學綱要》。增加「臺灣」二字，標明地域，便利國際交流閱讀。如採用「趣談」作為書名，不妨增添臺灣考古前輩醉心工作的相關花邊新聞，引領讀者認識其人格特質。

（二）為推廣公眾考古教育需要，建議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策畫編撰「台灣考古學系列教材」教科書，提供各級學校及社區大學應用。

（三）本書第一篇、第二篇，宜分為二書，列入系列教材。

（四）本書為推廣公眾考古教育範作，是合乎考古學嚴格學術規範的通俗佳作，初版僅印 600 冊，流通有限，十分可惜。建議設計推廣獎勵閱讀活動，積極行銷此書，使它成為人人愛讀的暢銷書，以便引領風騷，順利推廣臺灣考古公眾教育，筆者衷心期待。

## 《鶴采：陳維滄攝影集》讀記

吳福助\*

書名：《鶴采：陳維滄攝影集》

攝影撰文：陳維滄

出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版次：2021 年 12 月初版

ISBN：978-986-87941-6-0



本書內容共有 7 篇：1 情緣未了丹頂鶴、2 靈性之美賞白鶴、3 高原舞者黑頸鶴、4 飛越珠峰蓑羽鶴、5 以稀為貴美洲鶴、6 銀輝熠熠沙丘鶴、7 四地風情遇紅鶴。以上包括北海道釧路溼原、扎龍自然保護區的丹頂鶴，吉林莫莫格自然保護區的白鶴，青藏、雲貴高原的黑頸鶴，印度齊全村的蓑羽鶴，保護區林間的赤頸鶴，德州阿藍沙斯保護區的美洲鶴，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沙丘鎮的沙丘鶴，還有非洲肯亞、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島的紅鶴等。

本書書名「鶴采」，與用於賭博呼喝以叫采，表示叫好、讚美之意的「喝采」<sup>1</sup>諧音，顯得富有創意，新鮮有趣。

本書第七篇寫非洲肯亞的紅鶴，作者說根據方舟生態藝術公司執行長楊恩生老師的提點，紅鶴在生物學分類上，為鳥綱、紅鶴目、紅鶴科、紅鶴屬，並不是 15 種世界鶴其中之一種。作者說：「幸而出版此攝影集，僅是分享鶴丰采，而非作鳥圖鑑教學，收錄這單元，遂成為美麗的錯誤，也與愛鳥人一起長知識。」這樣忠實於學術的治學態度，是本書一大特色，值得吾輩效法學習。

古人相傳白鶴性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葉，滴滴有聲，即高鳴相警，徙所宿處。（見晉周處《風土記》）。《全唐詩》竇群〈冬日曉思寄楊二十七鍊師〉：「鶴警晨光上，步出南軒時。」此條資料不妨引用。

本書內容基本上以攝影圖片為主。筆者認為作者對鶴鳥既然情有獨鍾，天涯追鶴又是作者壯遊的美麗詩篇，本書文字解說不免略嫌單薄，不符讀者期待，謹建議增補如下：

### 一、增補鶴所代表的傳統文化意義

本書作者云：「在日本，丹頂鶴被公認是幸福鳥，因為牠有一夫一妻的高貴情操。」又：「在中國，丹頂鶴是長壽祥瑞禽，<sup>2</sup>詩詞名畫中常見祂仙羽飄飄。《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野』，以鶴的高潔比喻文人隱士之志節。<sup>3</sup>丹頂鶴的美與德，表裡如一。」鶴在中國及日本傳統文化所

<sup>1</sup> 喝采，原指賭博時呼喝以叫采。采，骰上標記，也作「彩」。「喝采」，也多用來指叫好、讚美。

<sup>2</sup> 古人以鶴為長壽之鳥，《淮南子·說林》：「賀壽千歲，以極其游。」後常以鶴壽、鶴齡、鶴算為頌壽之祝詞。

<sup>3</sup> 此詩旨趣，趙達夫編：《詩經三百首鑑賞辭典》，第一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有很中肯的解說，可以參看。

代表的豐富意義，有必要再參考傳統文化相關論著，<sup>4</sup>詳加評說。

## 二、增補圖說

本書據筆者統計，收錄攝影圖片共計 107 頁（除少數幾幅外，幾乎都是整頁圖片），其中附有文字解說賞心悅目，但是傳達視覺訊息有限，且因讀者經驗不同，解讀效果紛歧，還需要增加文字細膩精準提點解說，圖文互相呼應發明，才能旨趣顯露，盡善盡美。作者說：「在冰晶霧淞的北海道釧路溼原初識丹頂鶴，那優雅的一昂首，一低頭，一舉腳，一舞踏，令我一見傾心。」又：「多數鶴多忠於一夫一制；牠們沒有禮教規範，卻展現了至性真情，不也是值得人類效仿的『模範夫妻』嗎？」作者為著名自然生態旅遊探險作家，書寫創作潛能豐沛，何況是一見傾心，天涯追尋不捨的題材。只要給予充分時間，增補本書所需添加內容，肯定游刃有餘。筆者衷心期待本書能以嶄新的面貌再版，以便符合鶴鳥崇拜追隨者的期待。

---

<sup>4</sup> 可參看（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四川：巴蜀書社、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古今圖書集成索引編寫組編：《古今圖書集成索引電子版》，（廣西：廣西大學古籍所，2009年）。

## 《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讀記

梁右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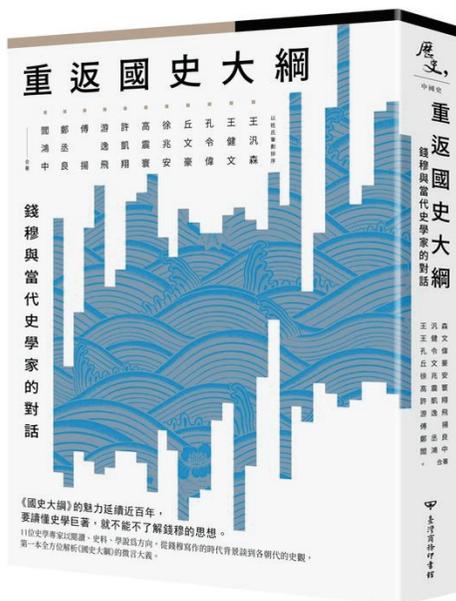
書名：《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

作者：王汎森、王健文、孔令偉、  
丘文豪、徐兆安、高震寰、  
許凱翔、游逸飛、傅揚、  
鄭丞良、閻鴻中  
(以姓氏筆劃排序)

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23年7月初版

ISBN：9789570535068



錢穆（1895-1990）《國史大綱》是近代最著名的通史著作之一，從上世紀四〇年代即受到學界密切關注，至今也仍不斷發揮它的影響力。然而，對於現代讀者而言，它的不易閱讀也是許多人的共同感受，因此有必要再對其進行意義梳理，才能彰顯該書於現今學術史的地位與意義，以及如何把握它的核心精神所在。臺灣商務印書館於二〇二二年企劃一系列《國史大綱》的系列講座，理由很簡單，正是「《國史大綱》一直長踞臺灣商務暢銷書排行榜前三名」（出版緣起，頁8）；而且「實體講座要有相互搭配的成果出版，不能在演講結束後，隻字片語也隨之煙消雲散」（企劃序，頁10），因而有《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之專書問世。然而，當代出版《國史大綱》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透過《國史大綱》可以瞭解錢穆的思想世界，以及《國史大綱》所反映的歷史世界。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兩者是交融互織，需要透過細心解

\* 黃岡師範學院傳媒與影視學院特聘副教授。

讀以逐漸彰顯民國初期的學術思潮與通史觀點，不斷豐富該書的多層內涵，以致於幫助讀者對於近九十年前的書籍能有身歷其境的認識與體會。不用說，《國史大綱》的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不易一語道破，所以本書匯集當代史學觀點，講者群分別從「歷史書寫、閱讀視角、學術精神、士人概念、域外觀點、宗教關懷、朝代史觀等論點著手，帶領讀者一步步打開《國史大綱》」（封底語，頁 10）。

錢穆《國史大綱》的意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呼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但是嚴格遵守對於原始史料的詳細解讀，並且密切注意學界對於各項議題的現代研究，而能提出一己之見。因此，他不同於書中劃分的傳統派（記誦派）、革新派（宣傳派）與科學派（考訂派），而是對以上派別皆有所反省、截長補短；書中所追求的目標，若以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所言，即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做為史家最高境界的追求。至今，我們面對錢穆《國史大綱》仍可從司馬遷對於史家的自我要求作出觀照，亦不難發現書中就「究天人之際」並非哲學概念的闡發，而在於歷史演變的考察；在《重返《國史大綱》》裡，閻鴻中提到「中國宗教特質的演變」一小段落（頁 126-127）、許凱翔論述「立基於社會治理——《國史大綱》中古代至中古的宗教」（頁 334-351）等等都是實例，「究天人之際」的層次，整體上並沒有在《重返《國史大綱》》佔據絕大篇幅。這正是因為錢穆的「究天人之際」並不是《國史大綱》內的核心精神，雖然書中所言並沒有與此衝突；也就是說，錢穆把更多的書寫內容與精神放在「通古今之變」，至於能不能「成一家之言」，他相信成立的標準必須經由現代學術檢驗，但也希望能夠發揮歷史作用，激發時人對於本國歷史之信心，從中獲取無盡藏的精神資源，該書充滿明顯的國族意識。就此意義來說，《國史大綱》就在國族需求與時代意義上逐漸建立起它的「一家之言」，而與我們當代強調的學術意義或有些許不同之處。

再就「究天人之際」於歷史書寫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稍作論述，因

爲這在《國史大綱》佔有一定地位，於司馬遷所論亦居首位，並對於史學經典的成立有所省思，最值得留意之處，即是探討當中「人」的能動性爲何。余英時〈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提到：「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sup>1</sup>人的主觀力量、人的能動性、人的創造作用都不是機械的、重複的，而是有機的、生發的存在，因此歷史發展必然有不斷創造新的可能，反映在種種社會制度與文化脈絡。因此，「究天人之際」成爲論述的基礎，亦由此可形成系統之觀點，並指導以下「通古今之變」的歷史，從中勾勒國史之扼要關節。由此出發，觀察國史變遷動態之過程，提出自己看法，形成系統性的觀點。不用說，錢穆作爲一名傑出史學家的精義，亦建立在他對於一手史料與現代學術的通盤考察與精準掌握，至今仍不斷發揮它的影響力。

杜正勝也曾就《國史大綱》的學術意義與時代意義進行評價，即不以現今學術成果批評《國史大綱》爲何不足、不以別人研究重點評價爲何不及，而是有其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的整體脈絡與系統觀點。<sup>2</sup>此點觀察值得我們現今閱讀《國史大綱》之際，特別需要注意之處；更何況《國史大綱》內部仍有其議題值得繼續開展，這是在閱讀理解錢穆書中原意的基礎上，可以再進一步思考的議題。可以再就以下各點進行說明：

第一，是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深化，基本上是依照錢穆開出的研究方向持續前進：例如錢穆高弟嚴耕望一再閱讀《國史大綱》，經許多年後再次閱讀，仍是表示佩服之意，許多制度史研究也是深受錢穆影響；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對於三省制的發展能夠敘述得更爲清楚，

---

<sup>1</sup> 余英時：〈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古今論衡》第二十九期（2016年12月），頁4。

<sup>2</sup>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229。

換句話說都可看到錢穆的影響力，仍在史學界發揮作用，而且所啓發而成就的學術成果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眾所周知，余英時曾表示他的中國史研究若沒有錢穆的指引，不能有現在的發展等謙詞。第二，在錢穆《國史大綱》的研究基礎上，指出值得開拓的新領域，雖然錢穆講得較少，但已可見端倪，為後來學者開啓無數方便法門。例如本書作者之一，孔令偉〈情的融合？——《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即針對域外思想、非漢族思想狀態而發；上文剛剛涉及許凱翔〈立基於社會治理——《國史大綱》中古至中古的宗教〉，則是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宗教觀念與經驗，所具有的非理性或「不可化約性」的特質，觀察錢穆如何彰顯宗教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角色與地位；而這又涉及錢穆對於宗教的認識，透過此認識也可連帶反省現代學術對中國宗教的定義問題。第三，《國史大綱》的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主要可就學術思潮當成觀察重心，以及從通史精神做為觀察路徑，而歸於「士」之自覺成為歷史推進的主要動力之一。例如：徐兆安〈士之自覺——能動性問題與現代中國思想史中的《國史大綱》〉提到「能動性（agency）與被動的分際，樂觀與悲觀的張力，長時段的結構解釋跟短時段的人物事件的解釋」（頁 215）。思潮方面的敘述則見於王汎森〈歷史時間是延續的嗎？錢穆與民國學術〉，勾勒一九三〇年代的三種歷史觀——左派史學、歷史考證學派、傳統的文史記授之學，認為錢穆有意區別「文化的」或「文明的」思想觀點，也凸出錢穆所謂「心學與史學」的配合研究；雖然在現今強調客觀研究來說，錢穆的史學觀點屬於較為特殊的看法主張，也由此讓我們重新思考：錢穆《國史大綱》所呈現的中國歷史本質究竟為何的大哉問。

書中收錄王健文〈需要一種新的國史——錢穆與《國史大綱》〉則提供我們一種新的國史思考；一般而言，提到「國史」總會捲入無窮無盡的意識型態之爭，但在錢穆的思想世界，以及依據史料所呈現的歷史世界，自然也想告訴讀者對於中國歷史觀點的建立是如何形成。然而，完全追求客觀而不考慮史家在當中的主觀成份，在過去史學界已進行許多

討論；總而言之，史學家要在明白認知自己的主觀想法的前提下，抱持嚴謹治學態度依據傳世或出土文獻，努力建立相對客觀的歷史世界。從王健文對《國史大綱》的觀察來看，他認為「從學術影響到政治，回頭再走上一條合理的路，打造出一個合理的政府。這是錢穆一以貫之的觀點」（頁 76）。因此，學術的重要性、合理的必要性，都是錢穆論述中國歷史發展過程很重要的因素；但也的確要留意是否「走在主觀客觀交接的斷崖邊，也很難避免因目的使手段正當化的危險」（頁 80）。作者也適度徵引同一時期或稍晚時候的《國史大綱》，如果從總體性、通論性著作來說，沒有人能夠超越《國史大綱》；不論表現在對於問題認識的深刻、論述框架的嚴謹、以及歷史發展的整體詮釋。不斷與所處時代風氣與最新學術成果進行對話，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繼往開來，結合當時的「國族」與「民族」論述，希望透過歷史來瞭解國家與民族。如同錢穆研究歷史的夫子自道：「從九一八事變後開始的，探究國家民族還有沒有希望」（頁 60）。也就是說，必須由歷史來認識來接引時代精神，歷史或稱為國史即屬於一種精神、心理與意志的思想資源。

綜合觀察書中十一位專家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述《國史大綱》的主旨、以及一切可供開展之議題。大致來說也可歸於錢穆所說「一個制度的推行，必有與其相副的一種精神與意識，否則此制度即毀滅不能存在」。<sup>3</sup>一般來說，學界或重中國制度史或重中國精神史，偏此重彼是常見現象，但是透過《國史大綱》的內容確是可讓我們感受兩者結合不但可能，而且也能達到很高的水準，並對後來學界研究方向有所啟發。我認為本書十一位作者提出的各種建議，亦大抵是探討《國史大綱》在這兩方面的側重，雖然比率或有不同，但皆留意兩者之間如何達到有效結合，凸顯錢穆治史成果之所以與其他史家的不同之處。書中許多學者也都注意到錢穆史學在當時不能說為大多數人接受，但不可諱言的是錢穆《國

---

<sup>3</sup> 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年 3 月），頁 521。

史大綱》問世後，已然開啓一番中國史研究的新氣象，至今八十餘年仍是歷久不衰。所以，當我們閱讀中國史之際，需要梳理作者在當中所寄託的各種心史與學術史，並彰顯歷史過程中之「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頁 109）之意義。即使從學術意義上的客觀角度，縱使對中國文化沒有特別情感者，那麼《國史大綱》仍對現今學界有參考價值嗎？高震寰〈從文獻中抽繹時代精神——《國史大綱》的上古史〉一文對此抱持肯定態度，特別將其視為「作為一部有深厚文獻根底的作品」、「今後仍能刺激出許多精彩的研究」（頁 299）。

而且，在文獻徵引方面，錢穆也不是侷限於傳統二十四史或常見古籍；余英時指出「《國史大綱》中的原始史料包羅萬象，並且經過了『整輯排比』、『參互搜討』等系統性的處理，以密切配合全書『三層結構』的構想」。<sup>4</sup>游逸飛〈如何閱讀《國史大綱》——經典·學說·史料〉提到《國史大綱》徵引史料可稱得上是「森羅萬象的傳世文獻」（頁 162），甚至認為「《國史大綱》引用文獻考」值得進一步研究（頁 167）。此外，扣求歷史為尋找發展中更具合理性的因子，即使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仍可透過史實加以省思；傅揚〈大時代的氣運盛衰——《國史大綱》的中古史〉指出「錢穆念茲在茲的，可以說是一種立國的精神，也就是國家、政權或集體人群要建立集體秩序，需要依賴於某一種理論之支撐」（頁 306）；觀察錢穆中古史的歷史敘述與部分觀照，終將回歸一種「更合理的政治意識」。<sup>5</sup>即使隋朝經濟較為出色，但必須留意仍有不足之處；錢穆並非以物質富裕作為朝代發展的主要判斷標準，而是制度背後的政治意識、精神與理念。

因此，《國史大綱》對於政治意識、精神與理念的把握，使得本書亦

---

<sup>4</sup> 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上冊，頁 9。另外，「三層結構」的構想，即所謂「拙著側重上面政治，更重制度方面，下面社會更重經濟方面。中國注重士人參政，於歷代選舉考試制度及時代士風，頗亦注意」。見於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上冊，頁 19。

<sup>5</sup> 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上冊，頁 477。

具有鮮明的政治史寫作意識；如鄭丞良〈以政治為走向的書寫——《國史大綱》的宋元史〉即就此而發，認為「錢穆非常注重政治制度背後蘊涵的理性精神」（頁 386）。而且，就歷史整體與分段來說，也可看到不一樣的歷史面貌；如丘文豪〈專制下的經濟與學術——《國史大綱》的明清史〉就曾提到錢穆對於中國歷史是否專制的看法，基本上認為是「士人政治」；另一方面，「但若是只看明清史的部分，錢穆同意中國是專制的」（頁 399）。一般來說，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仍有很大影響：即認為錢穆是文化保守的代表，對於中國歷史只說好話不說壞話；但是閱讀《國史大綱》，以及參考本書十一位作者的闡發，不難發現錢穆的觀點乃是建立在一手嚴謹的史料基礎，以及五四以後的二十年間，中國內外一切可供參考的研究成果，皆在錢穆《國史大綱》的「整輯排比」與「參互搜討」中保存下來，如今更透過《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一書得以明白呈現。也因為如此，余英時即注意到閱讀錢穆《國史大綱》背後有其學術史意涵，僅是受限於教科書體例，無法完全展開；徐兆安則提醒應該要參考其他斷代史家的專論，<sup>6</sup>相互比較之下顯得更為清楚（頁 192）。錢穆《國史大綱》的背景形成，王汎森形容那是「在傳統史學的廢墟中的重構行動」（頁 47），自九一八事變的刺激而更有意識研究中國歷史，探究國家民族是否還有希望，基本上處於一種深刻的意義危機之中。但他卻在國史中發現意義價值的源流，即在學術中找到知識人提供歷史發展的合理性因素，由學術思想影響政治運作，逐漸形成中國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的配合，走在理性發展的人文中國，勾勒「時人對此制度所與的精神以及意識上之轉變」。<sup>7</sup>這是《國史大綱》帶給我們一幅幅歷史生動的精神與意識面貌。

---

<sup>6</sup> 例如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卷第一期（1931年8月），頁 39-48。

<sup>7</sup> 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上冊，頁 521。

【東海文庫】

謝鶯興著作目錄——專書之部（節錄）<sup>1</sup>

吳福助\* 林翠鳳\*\* 歐純純\*\*\*

壹、前言

謝鶯興，1986 年東海中文系畢業，因師長引薦，進入東海圖書館服務。1993 年 2 月 1 日，閻志洪先生接東海圖書館館長，4 月 12 日，接受東海校刊專訪，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治館理念。同年 10 月 1 日，因胡家源副館長的建議，將謝鶯興由流通組調到古籍室，協助館藏線裝古籍的整理。從此開啓謝鶯興整理東大圖書館文獻的因緣。

古籍的整理，首重釐訂對善本書的年代界定。東海圖書館原本係沿用 1970 年《臺灣公藏善本書目》編訂，眾館所承認的「善本」定義，即指明朝（含）以前的宋、元、明三朝代刊本的古籍，下拉到清朝嘉慶朝（含）以前的刊本。當然也包含刊本稀少、罕見，或經名家校訂、題跋諸書。在此定義下，謝鶯興編《善本古籍簡明目錄新編》，針對東大圖書館古籍羅列書名、卷冊數、作者朝代姓名、刊刻年代、刊刻堂號及索書號等，為古籍整理呈現初步的成果。但從中也發現一些不足之處，包含僅羅列書名、作者等版本的簡單書目，使用者不容易判斷同一作者的同一本書名，是否是相同的版本（或版本間的關連性）？由此謝鶯興在往後的古籍整理上，做了更細緻的統整，同時特別注意除著錄書名諸項之

---

<sup>1</sup> 編按，因館刊篇幅有限，經取得作者群之同意，本篇文章將節錄「專書著作之部」，以期更能呈現謝鶯興先生在文獻整理領域之專業與完整性的象徵。其他多數文章與內容，皆已於《館訊》、《館刊》發表過，歡迎各界不吝至本館資料庫閱覽指教。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外的其它訊息，例如該書現有的序、跋，扉頁上的文字及牌記，書的版式行款，各卷首與卷尾著錄的文字等。若書中有藏者眉批、札記、圈點，或缺頁、衍頁等現象，逐一加以標記其所在的卷次及頁次，以供檢核。若該書各序、跋曾敘及著書或刊刻等的相關訊息，則摘錄於「按」語條中，以備使用者參考知悉。謝鶯興這類的「簡明目錄」整理，重啓了東大沉寂一、二十年的線裝古籍整理工作，對於古籍的基本資料統整，為讀者提供相當重要的文獻線索。但因當時東海圖書館尚未發行相關刊物，相關整理成果，未能及時對外界發佈相關訊息，然謝鶯興的古籍整理，已為東大圖書館文獻保留與統整，建立相當的基礎。

同時因整理館藏古籍，需進一步瞭解館藏古籍的來源，必須翻檢館內現有的校內文獻，由此也引發謝鶯興興起整理學校文獻的念頭。在學校以「人」為主的前提中，東海有「逢十」就編輯校史的慣例，然就古籍與學校文獻整理而言，如果無法隨時統整資料，至要用時似有緩不濟急的疑慮。理想的狀態，是圖書館員（或是檔案館或校史館的人員）能在日常工作中，隨時收整所有師長資料，統整相關學校的文獻，分別蒐集成冊（或歸檔），相信在編製校史當下，將有相當的助益。因此在東大相關文獻的統整上，謝鶯興亦開始投入相當心力。

適逢第一屆校友陳瑞洲先生由秘書室調至圖書館，協助整理學校文獻，兼及彙編早期師長相關資料，謝鶯興由此有更明確的落實目標，一起投入校內師長文獻統理工作，從「東海名人錄」、「東海人物誌」，到現在的「東海文庫」系列的編輯。在知人、知事的觀念下，盡可能整理師長們的著作年表（或蒐集較為完整的著作目錄），彙成專輯時，則將未收入專書的文章，包含各專書中的序跋，分類收整，以作為有意研究者的參考。

除了從事古籍書目整理，謝鶯興對於早期師長捐贈的線裝古籍，也分別進行整理，彙集成書目。最具代表性的是徐復觀教授的著作手稿，

徐教授於 1982 年 4 月 1 日棄世後，其家屬將他在香港的書籍文物和著作手稿，多數都捐給執教十多年的東海圖書館典藏，對於這批珍貴且別具意義的文物，亟需有人進行整理。時隔多年，謝鶯興服務於圖書館之後，即投入彙整、校訂、作品選介等文獻整理工作。

在黃皇男館長任期間，建議將發行 171 期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從 2016 年元月 15 日開始，升等為《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並經編審委員建議，在《館刊》裡開闢「文物選粹」單元，逐期選介徐教授手稿，使這珍貴資料有機會呈現在世人面前；再藉由 2016 年，中文系提出協助圖書館盤整徐教授手稿，並將其數位化的計畫，先後得到林振東代理校長及接任的王茂駿校長之大力支持，遂撥款進行。東大圖書館也利用將這批手稿數位化的機會，開啓整理手稿的規劃。以《中國人性論史》為開端，將各手稿的內容，搭配單篇發表的論文，及相關專書內的文字，逐一比對，再彙編成「手稿整理」出版，供有意研究徐教授文本的學術界參考，在這期間，均可見謝鶯興參與編輯的總總軌跡。

圖書館工作者，在從事古籍及館藏文獻的整理，成果本無發表的園地。1997 年 2 月，林振東教授擔任館長時，特指示在東大圖書館一樓大門入口處，設置「特藏櫥窗」，用以展示圖書館之特藏資料整理成果。然相關成果流通受限還是相當可惜，於是蒙當時負責《校刊》編輯的陳瑞洲先生，和曾先後負責《東海文學院學報》、《東海中文學報》、《中國文化月刊》的吳福助教授建議，將圖書館特藏資料的整理成果，投稿到刊物上發表，此時已可見許多謝鶯興發表的著作。

至 2001 年 8 月 1 日，由呂宗麟教授接任館長時，更進一步認為圖書館應該有自己的刊物，指示籌辦《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用以宣傳圖書館的業務及工作成果，此時正式開始有了刊登特藏整理成果的園地。

因《東海校刊》所能容納的字數有限，原來發表的初步成果，後來陸續增添更完整資料後，再發表於上列的《學報》或《館訊》，故先羅列

《校刊》的幾篇文章如下：

1. 〈工具書系列：如何利用傳記工具書〉，《校刊》第 4 卷 9 期（1997 年 03 月 21 日）。
2. 〈東海校歌的原作者——徐復觀先生紀念專輯展示說明〉，《校刊》第 5 卷 9 期（1998 年 03 月 16 日）。
3. 〈古籍的外衣——函套〉，《校刊》第 5 卷 11 期（1998 年 04 月 20 日）。
4. 〈量身打造：談古籍六合套的製作〉，《校刊》第 5 卷 14 期（1998 年 06 月 02 日）。

由上述的說明，可看出謝鶯興在東大圖書館服務期間，針對自身工作業務的投入不遺餘力，同時也將圖書館的古籍、手稿、學校文獻、師長著作等，做出了相當多的整理與研究，同時也透過發表，讓其長年研究與統整的成果保留下來，不但提供研究者在文獻應用上的極大便利性；同時也具有保留許多珍貴史料的價值。

## 貳、收錄說明

謝鶯興之著作，包含在《館訊》、《館刊》等發表的作品，種類繁雜，主要包含謝鶯興在東大圖書館，各階段所負責的多項業務，亦包含製作的各類統計報告，並雜有讀書心得，或出外參加研習的心得分享。同時也包含其進行館藏古籍整理時，某些值得進一步考訂之文獻，所進行的研究與發表。

且謝鶯興針對早期師長的資料彙編，通常先編排為「著作目錄」（或「著作年表」），再彙集相關資料而成專輯，冠上「東海名人錄」（再改名為「東海人物誌」，現在使用「東海文庫」）的系列出版。

也因謝鶯興之著作目錄，內容相當多元，因此各篇依性質分門別類，各類的編排，先收期刊，並以刊登先後排序；若該類有彙編成書者，再標列「專書」一節，次行亦依出版先後排序。但若無彙集成書者，則不另立「專書」之名目。

針對謝鶯興著作，依文章性質，約可分為十六類，分別為：1.承辦業務的統計報告。2.圖書管理相關（含目錄學、古籍保護）報告。3.讀書心得。4.古籍整理（含編成線裝書目）。5.古籍版本考辨。6.師長、同仁及校友的著作目錄（含彙編為專輯）。7.師長、同仁及校友作品集（含專書）。8.館藏手稿選介。9.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10.徐復觀研究資料（含他人研究）蒐輯整理。11.圖書館資料整理。12.校史文獻整理。13.各項研習報告。14.研討會論文。15.圖書館使用教育。16.華文雜誌創刊號選介——大陸之部等。

其中部份文章，如：函套製作、志工培訓、論文集選介、圖書資源管理、圖書館評鑑、館藏盤點、自建資料庫、圖書館導覽、特藏文獻的整理、學校資料蒐集、線裝書製作研習等，與圖書管理關係較深，故歸列在「圖書管理」類。

東海圖書館收藏的手稿，實以徐復觀先生為大宗，謝鶯興之相關著作亦以此為主，雖有方師鐸、張愨言夫婦稿件，然方家手稿皆已陸續完成繕打，彙編成書，故直接歸類在「師長、同仁及校友的作品集」類別中。徐家手稿，因其字跡塗抹處頗多，辨識不易，除以「文物選粹」選介外；另有文字校對、研究整理之成果，進而發表於刊物，最後再彙編成「手稿整理彙編」。故其手稿分為：「館藏手稿選介」、「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兩類。

而東海圖書館另設有「徐復觀紀念室」，特蒐集近人對徐教授的相關研究，輯為資料彙編，置於紀念室中，供蒞館參觀者翻閱，故再立「徐復觀研究資料（含他人研究）蒐輯整理」類。

其它如：西嶼燈塔踏查、澎湖踏查，本非參加各項會議之心得性質，然此類之踏查，實是為撰寫相關會議論文而進行的資料蒐集，故暫列於「各項會議報告」類中。

「圖書館資料整理」和「東大文獻資料整理」分爲兩類，針對蒐集整理東大圖書館零散資料，別爲「圖書館資料整理」一類，主要以「日誌」形式進行彙整；而東大早期文獻，別爲「東大學校文獻資料整理」一類，主要以「文物選粹」方式介紹，內含東大文獻處理，兼及文獻搶救、徵集、保存等方面思考。

「圖書館使用教育」類篇數不多，著重在謝鶯興個人經驗之談，兼及如何利用方志書以認識其家鄉，實具有教育性，故特立爲一類。

因館刊篇幅有限，本文將以「專書著作之部」詳載如下：

## 參、專書分類

### 一、圖書管理（含目錄學、古籍保護）

1. 《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謝鶯興撰（碩士論文，1991年）。
2. 《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謝鶯興撰（花木蘭文化，2007年）。

### 二、古籍整理（含編成線裝書目）

1. 《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簡明錄新編》，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1995年）。
2.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天糧館贈書·基督教文獻書目（附索引）》，謝鶯興編訂（東海大學圖書館，1996年）。
3.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與陳玉玲、陳慧倫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0年）。
4.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錄初稿》，謝鶯興編輯（東海圖書館，2005年）。
5.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李田意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附書影，索引）》（和孫秀君、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1年）。
6.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戴君仁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與孫秀君、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1年）。

7.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經部暨史部附書影》(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3 年)。
8.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附書影》(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3 年)。
9.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叢書部暨方志部附書影》(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3 年)。
10.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周法高先生藏線裝書目附書影》(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3 年)。
11.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附書影暨索引》(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5 年)。
12.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重編附書影索引》(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6 年)。
13.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目附書影暨索引》(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7 年)。
14.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附書影暨索引》(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20 年)。
15. 《善本古籍選介: 藏諸秘府》, 謝鶯興編輯(東海大學圖書館, 2020 年)。
16. 《家鄉的「故實」, 從臺中談起: 臺灣方志線裝古籍展選介》(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2023 年)。
17.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普通本線裝書方志部總目附書影暨索引》(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2023 年)。

### 三、師長、同仁及校友著作目錄、年表(含彙編為專輯)

1. 《圖書館古籍維護暨新館建置的倡議者: 朱書焱先生年表》, 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 1998 年)。
2. 《蕭繼宗先生學行年表初稿》(與陳瑞洲合著)(東海大學, 1999 年)。

3. 《東海大學圖書館同仁著作書目彙編》，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1999年）。
4. 《方師鐸先生學行年表初稿》（與陳瑞洲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0年）。
5. 《陳賢芳先生學行年表初稿》（與陳瑞洲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1年）。
6.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早期師長著作目錄彙編》（吳福助主編，謝鶯興執行編輯，高于婷、張淑玲協助編輯）（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05年）。
7. 《2010年圖書館同仁工作成果集目錄彙編》，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0年）。
8. 《吳德耀校長年表新編：東海自由學風的播種者》，謝鶯興著（東海大學圖書館，2014年）。
9. 《創館 60 週年圖書館同仁著作目錄彙編》，謝鶯興著（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10. 《徐復觀教授年表初編》，謝鶯興編（東海大學，2017年）。
11. 《孫邦華大使大事年表》，謝鶯興整理（東海圖書館，2020年）。
12. 《吳經國先生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大事年表》，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21年）。

#### 四、師長、同仁及校友作品集

1. 《東海英語教學奠基者——柯安思教授：感念 Prof. Anne Cochran 文集》，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1997年）。
2. 《東海校歌的原作者：徐復觀先生紀念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1997年）。
3. 《曾約農校長：東海大學教育理想的建置者》（與陳瑞洲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1998年）。
4. 《謝明山校長：收回校地開創新局面，促使東海獨立自主者》（與陳瑞洲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1998年）。

5. 《吳德耀校長：東海自由學風的播種者》（與陳瑞洲合著）（東海大學圖書館，1999 年）。
6. 《胡家源先生：校史文獻的保存者》，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0 年）。
7. 《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方師鐸著（與方謙亮，施麗珠合編），（台中：方謙亮，2000 年）。
8. 《畫說東海生活：東海漫畫選》（與陳瑞洲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0 年）。
9. 《方師鐸先生童話集：《小兔子冒險既與好吃懶作的小海狸》》，方師鐸著（與方謙亮，施麗珠合編）（台中：方謙亮，2001 年）。
10. 《方師鐸先生四部曲：《北平憶往》》，方師鐸著（與方謙亮，施麗珠合編）（台中：方謙亮，2001 年）。
11. 《東海歲月三十年：陳瑞洲先生榮退紀念》（與陳瑞洲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01 年）。
12. 《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五十年前水擺夷》》，方師鐸著（與方謙亮、施麗珠合編）（台中：方謙亮，2002 年）。
13. 《方師鐸先生全集一：《閒話滇邊及天南談》》，方師鐸著（與方謙亮、施麗珠合編）（台中：方謙亮，2002 年）。
14. 《方師鐸先生未刊稿：《淺說唐詩》》，方師鐸著（與方謙亮、施麗珠合編）（台中：方謙亮，2002 年）。
15. 《方師母張愨言女士讀書隨記》，張愨言著（與方謙亮、施麗珠合編），（台中：方謙亮，2003 年）。
16. 《方師鐸先生論文集》，方師鐸著，謝鶯興編輯（台中：方謙亮，2004 年）。
17. 《方師鐸先生論文集（修訂本）》，方師鐸著，謝鶯興編輯（台中：方謙亮，2005 年）。

18. 《方師鐸先生雜叢》，方師鐸著，謝鶯興編輯（台中：方謙亮，2005年）。
19. 《方家兄妹作品集》，方謙光、方謙亮著，謝鶯興編輯（台中：方謙亮，2007年）。
20. 《方師鐸先生全家書信集：附方家兄妹童年回憶》，方師鐸等著，謝鶯興編輯（台中：方謙亮，2007年）。
21. 《醜醜集》，吳福助選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1年）。
22. 《東海大學聖樂團活動紀實》，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2年）。
23. 《東海山林的沉思：趙建中先生紀念集》，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3年）。
24. 《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方謙光著，謝鶯興編輯（台中：方謙亮，2014年）。
25. 《邱瑞忠先生紀念專輯》（與羅問津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4年）。
26. 《曾約農校長紀念專輯新編：東海大學教育理想的建置者》，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27. 《吳德耀校長紀念專輯新編：東海自由學風的播種者》，謝鶯興著（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28.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中國文化月刊》總目索引》（與吳福助、陳惠美、王嘉弘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29. 《判的再書寫：明代公案小說研究》，陳麗君撰，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30. 《葉芳栢代理校長紀念專輯：重燃東海開創精神的旗手》，謝鶯興著（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31. 《鄭得安館長紀念專輯：東海大學新館籌建與自動化的推動者》，謝鶯興著（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32. 《孫克寬教授紀念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7年）。
33. 《杜蘅之教授紀念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8年）。

34. 《楊綉美編纂榮退專集：東海四十年走一回》，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8 年）。
35. 《黃館長皇男三年又 1/2 歲月留真集》，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8 年）。
36. 《澎湖西嶼燈塔的「昔與今」》（與陳曦、景祥祐、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主辦（香港城市大學，2018 年）。
37. 《陳曉蕃教授著作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8 年）。
38. 《顧敦柔教授紀念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9 年）。
39. 《方師鐸教授四部曲》，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9 年）。
40. 《彭館長懷真求真集：一年七個月的力行》，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9 年）。
41. 《1984 東海大學圖書館歷史文物展專輯》（與王雅萍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9 年）。
42. 《吳福助教授著作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圖書館，2020 年）。
43. 《方師鐸教授唐詩格律研究四種》，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20 年）。
44. 《陳淑女老師紀念文集》，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20 年）。
45. 《方師鐸教授學行年表附學術論叢》（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圖書，2020 年）。
46. 《唐守謙代理校長紀念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20 年）。
47. 《查良鑑董事長紀念專輯》，謝鶯興整理（東海大學圖書館，2022 年）。
48. 《謝延庚教授紀念專輯》，謝鶯興編輯（東海大學圖書館，2022 年）。
49. 《賀新持副圖資長榮退專輯：從鄭得安館長到楊朝棟圖資長的雪泥鴻爪》，謝鶯興編輯（東海大學圖書暨資訊處，2023 年）。
50. 《劉國鈞教授紀念專輯》，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暨資訊處，2023 年）。

### 五、徐復觀手稿整理

1. 《徐復觀教授《中國人性論史》手稿整理彙編》，謝鶯興整理（東海大學圖書館，2020年）。
2. 《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彙編》（與陳惠美合作整理）（東海大學圖書館，2021年）。
3. 《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劄記》（與陳惠美合撰）（東海大學圖書館，2021年）。
4.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一》手稿整理彙編》（與陳惠美合作整理）（東海大學圖書館，2022年）。
5.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二》手稿整理彙編》（與陳惠美合作整理）（東海大學圖書館，2022年）。
6.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三》手稿整理彙編》（與陳惠美合作整理）（東海大學圖書館，2022年）。
7. 《徐復觀教授《〈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手稿整理彙編》（與陳惠美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23年）。

### 六、圖書館歷史

1. 《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初稿：籌備期至六十年之部》，謝鶯興彙編（東海大學圖書館，1998年）。
2. 《圖書館管院分館重要記事備忘錄》（與李玉綏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09年）。
3.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一至一百期總索引》，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0年）。
4. 《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民國六十一年至七十年之部》，謝鶯興彙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0年）。
5. 《東海圖書館的新生與蛻變》，謝鶯興著（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年）。
6. 《特藏資料整理經驗談專輯》（與陳惠美、陳曦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9年）。

7. 《圖書館 2018 年主題特展專輯彙編》(與陳曦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9 年)。

### 七、校史文獻整理

1. 《東海大學教職同人著作目錄》，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編輯，黃文興，謝鶯興執行編輯（東海大學，1995 年）。
2. 《東海采風》(與黃文興、張志遠合編)(台灣鄉土文化社，1996 年)。

### 八、圖書館使用教育

1. 《工具書使用系列》，賴曉萱撰，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3）。

### 【後記】

謝鶯興 1986 年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師長引薦，進入東海大學圖書館古籍室服務，以迄屆齡退休。退休後，圖書館長特別禮遇，保留他的辦公座席，方便謝先生退而不休，繼續正常上班當義工，完成計畫中尚未完工的文獻整理工作。

謝先生是上過我課的學生中，學術成就表現相當傑出的一位。他曾說他受我的「文獻癖」習性影響甚深，其實他那日以繼月，全年無休的精勤不懈精神，又他常說：「懷古亦是創新。我等編製歷史，緬懷前人艱辛步履，憚忌後人評論吾輩，焉能不用心於今世？」如此這般戒慎恐懼的治學態度，都是我望塵莫及的。我曾戲稱他是東海校園中頭號「大傻瓜」，長年累月做的是一件又一件，永遠沒有盡頭的，卻又是辛苦無比，寂寞萬分，全然沒有金錢報酬的工作。

本目錄收錄謝先生近四十年來辛勤的成果，作品共計分為 16 類，752 篇，專書 98 本。可謂洋洋大觀，令人嘆為觀止。這番純屬個人所創的亮麗成績，已為「文獻學」界樹立令人欽佩的典範，值得推廣宣揚，擴大大學學習成效。(吳福助)

## 手稿整理

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系列：

## 【第一章】〈《文心雕龍》的文體論〉手稿整理(三)

陳惠美\*、謝鶯興\*\*

※ ※ ※

## 五、文體論的效用

【(1) 由修辭學到文體論】<sup>555</sup>

彥和著《文心雕龍》一書，實際是要教人如何學文，如何知音（鑒賞）的。並且他正是要人通過文體論去學文、去知音。

修辭學在西方有很久的傳統，在大學的文學課程中，一直是佔著主要的地位；以為這是教人以文學寫作的必須訓練；但近數十年來，始反省出用修辭學【來作】<sup>556</sup>寫作的訓練，是沒有結果的；要養成寫作的能力，只有從文體論著手【(註五四)】<sup>557</sup>。而劉彥和遠在一千四百年以前，即主張學文不應從修辭學入手，【主張】<sup>558</sup>應從文體論入手，這也是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一個很突出的事情】<sup>559</sup>。他在〈體性篇〉說：「故宜摹體以定習」；在〈總術篇〉批評當時的風氣說，「多欲練辭，莫肯【研術】<sup>560</sup>」。「練辭」，即是從修辭上用功；【研術】<sup>561</sup>，即是從文體上用力。他這種意見是非常明顯的。《文心雕龍》中，不是不注重修辭；下篇中有好幾篇都是與修辭有關的。但在劉彥和看來，這僅是文體多術中之一術，【應當

---

\* 僑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

\*\*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sup>555</sup> 按，專書此章節的序號與標題的8字，手稿、論文無。

<sup>556</sup> 按，專書、論文此2字，手稿作「作」字。

<sup>557</sup> 按，手稿此「(註五四)」3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五)」4字。

<sup>558</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而」字。

<sup>559</sup> 按，手稿此8字，專書、論文作「較西方成熟特早之一例」10字。

<sup>560</sup> 按，手稿、論文此2字，專書作「究術」2字。

<sup>561</sup> 按，手稿、論文此2字，專書作「究術」2字。

和其他的術連結在一起，作整個的認取。】<sup>562</sup>沒有修辭，固然是「一物携貳」，使文體解散；但若僅求修辭，則携貳者更多，更不成爲文體。一個生命，可以分爲若干元素；但【不能從】<sup>563</sup>各個元素的再結合而造出生命；生命是一個不可分的統一體。文體，可以分解爲若干因素；但文體不是由 A 因素加 B 因素再加 X 元素，這樣【一直加】<sup>564</sup>上去所能形成的；而是成立於各因素凝爲一體的統一體之上。【同時，】<sup>565</sup>我們爲了研究的便利，可以分析文體內的【各因素】<sup>566</sup>並作概念性的說明；但正如培忒（W. H. Pater, 1839-1894）所說，由抽象說明藝術的形相所作的批評，決接觸不到個性的情操及【純一的】<sup>567</sup>氣氛的統一【（註五五）】<sup>568</sup>。所以我們只能從一個作品的【統一性】<sup>569</sup>上去評價一個作品；各個因素，只能在統一均調中，也即是【只能在】<sup>570</sup>文體中得到他的地位。彥和說「一物携貳，莫不解體」；我們應注意「莫不」兩字；莫不者，【乃無不之意，】<sup>571</sup>乃全般之意。某一個因素沒有融合好，不僅是缺少了某一個因素而已，而是全般的解體。所以要學文學，只有從它的統一性上去學，亦即是從文體上去學，而不能只去學其一枝一節；一枝一節的東西，便是離開了它的生命【之流】<sup>572</sup>的東西。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修辭學是一個技巧，有如女人臉上的化妝品；化妝品若能增加女人的美，只有在它與女人的生命力相融合的時候；離開女人的生命力，化妝品都是死物。文體是與作者的

---

<sup>562</sup> 按，專書、論文此 18 字，手稿無。

<sup>563</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不能由」3 字。

<sup>564</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加」字。

<sup>565</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無。

<sup>566</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因素」2 字。

<sup>567</sup> 按，手稿、論文此 3 字，專書作「純一地」3 字。

<sup>568</sup> 按，手稿此「（註五五）」3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六）」4 字。

<sup>569</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統一」2 字。

<sup>570</sup>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在」字。

<sup>571</sup> 按，手稿此 5 字，專書、論文無。

<sup>572</sup> 按，手稿、論文此 2 字，專書作「整體」2 字。

生命力相連結的東西；作品中有人格的存在，有生命力的存在，才能成爲一個文體。從修辭學入手，便是離開了人的因素而專從技巧上去學文；這便有如想僅從化妝品上去得到人形之美，【即當然】<sup>573</sup>是白費的。從文體上去學文，便可通過技巧而接觸到作者的生命，也即是接觸到文學的生命。並且因此而可以知道文學是要從【生命】<sup>574</sup>的本身去發掘的；所以彥和一定要扣緊情性來講文學；這是中國的傳統，也是人類整個文學的共同傳統。【因此】<sup>575</sup>，我們可以承認這種說法：「創作是由方法決定的」【(註五六)】<sup>576</sup>。但「方法只是在各個藝術家個人活動【之中】<sup>577</sup>，才可以看出其存在；方法乃表現於作家的文體之中；【在各種】<sup>578</sup>文體以外，無所謂方法」【(註五七)】<sup>579</sup>。

## 【(2) 文學心靈的培養與塑造】<sup>580</sup>

劉彥和主張從【文體以】<sup>581</sup>學文，可略分下述各點：

### 【(一) 培養作爲文學主體及文體根源的心靈(情性)並加以塑造：】<sup>582</sup>

〈神思篇〉說「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臟，澡雪精神。」  
 〈養氣篇〉說「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又說「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這都是就培養方面來說的。文體的高下，繫於作者人生境界的高下，虛是無方隅之成見，靜是無私欲的煩擾；疎

<sup>573</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那當然」3 字。

<sup>574</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人生」2 字。

<sup>575</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由此」2 字。

<sup>576</sup> 按，手稿此「(註五六)」3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七)」4 字。

<sup>577</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中」字。

<sup>578</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各種」2 字。

<sup>579</sup> 按，手稿此「(註五七)」3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八)」4 字。

<sup>580</sup> 按，專書此章節的序號與標題 10 字，手稿無，論文作「※※※」。

<sup>581</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文體上」3 字。

<sup>582</sup> 按，手稿、論文此點的序號及文字 24 字，專書作「文體是出於心靈，反映心靈；所以由文體以學文，首須有作爲文學主體及文體根源的心靈(情性)的培養與塑造」44 字。

淪五臟，是不溺于肥甘，保持生理的均調；澡雪精神，是不染於流俗，保持精神的高潔。這兩句都是達到虛靜的方法。【虛靜，所以能廣大而超卓，自然可以不斷提高人生的境界，以自己潔白的心靈】<sup>583</sup>，涵融萬事萬物的純美潔白的本性，而將其加以表出，這自然可以形成作為物我兩忘、主客合一之象徵的文體。誠如歧約所說：「文體不僅是人，同時也是某時代的社會，是通過個性所看到的國民、【的世紀】<sup>584</sup>。」【(註五八)】<sup>585</sup>在這一點上，劉彥和為時代所限制，為當時知識分子的生活、意識所限制，只強調了情性【而似乎】<sup>586</sup>沒有強調到【社會】<sup>587</sup>。但是，個性愈是由洗鍊、沉潛而徹底下去，以達到虛靜的境地時，便可發現個性與社會性之間的牆壁自然撤除了；於是【純潔高貴】<sup>588</sup>的個性，同時即是廣大豐富的社會性。在虛靜的心靈中，【自然不能】<sup>589</sup>不涵攝社會，不能不湧現對社會的責任感；於是劉彥和所要求的文章，不能不是「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的文章【(註六〇)】<sup>590</sup>；【而他心目中】<sup>591</sup>的文人，不能不是「貴器用而兼文采」的文人【(註五九)】<sup>592</sup>，對時代、社會，必須負下一份責任。【幾十年來我國談文學的人，常常以為道德是與文學不相容的；為了提倡文學，便須反對道德；甚至連推尊《文心雕龍》的人，也故意抹煞《文心雕龍》中濃厚的道德意味。殊不知道德的教條、說教，

---

<sup>583</sup> 按，手稿此 31 字，專書、論文作「虛所以保持心靈的廣大，靜所以拔出於私欲汙泥之中，以保持心靈的潔白。二者皆所以不斷提高人生的境界，使人能以自己廣大潔白的心靈」57 字。

<sup>584</sup> 按，手稿、論文此 3 字，專書作「世紀」2 字。

<sup>585</sup> 按，手稿此「(註五八)」3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九)」4 字。

<sup>586</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而」字。

<sup>587</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文體中的社會性」7 字。

<sup>588</sup> 按，手稿此 4 字，專書、論文作「廣大潔白」4 字。

<sup>589</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作「不能」2 字。

<sup>590</sup> 按，專書、論文此「(註六〇)」3 字，手稿無。

<sup>591</sup> 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作「心目中」3 字。

<sup>592</sup> 按，手稿此「(註五九)」3 字，專書、論文無。

固然不能成爲文學；但文學中最高的動機和最大的感動力，必是來自作者內心的崇高地道德意識。道德意識與藝術精神，是同住在一個人的情性深處。許多偉大作品，常常是嘲笑、批評世俗的虛偽道德，以發掘更深更實的道德（註六十一）。而我國所說的「文以載道」的道，實際是指的個性中所涵融的社會性，及對社會的責任感，所以這句話可以討論的是道的具體內容問題，和表現的方式問題。若根本反對這句話所代表的原則性，則正如亞諾爾特所說「反抗於道德本能的詩，即是反抗於人性的詩。」（註六十二）彥和〈徵聖〉〈宗經〉兩篇，在這一點上，正有其深意所在。〔而黃季剛先生的《文心雕龍札記》，在這種地方故意加以曲解，不僅不了解我國文學的傳統，也不了解真正文學之所以爲文學，而且故意歪曲了劉彥和的極明顯地本意，犯了注釋家的大忌。乾嘉習氣的遺毒，錮蔽了黃先生的高華特達的天資。托爾斯泰費了十五年的時間，研究西方各家的文學藝術的理論，而寫出了他的《藝術是什麼》（或譯作《藝術論》）一書。在此書的第三節，介紹了三十多位的文學藝術的理論；我們仔細讀完之後，發現文以載道，也正是西方文學藝術的大統；此即由另一語句所表現的「爲人生而藝術」。沒有孤立的人生；在爲人生而藝術的同時，應即涵有爲社會而藝術意義在裡面。〕<sup>593</sup>把文學作爲道德說教的工具，對文學固然可以發生阻抑的作用；但存心要從文學中驅除道德，則對文學可以發生滅絕的結果。二者是在其根源和歸趨上，有其自然的結合。〔數十年來反對文以載道的意識的橫行，正說明此一時代的文學何以會這樣的沒落〕<sup>594</sup>。】<sup>595</sup>

至關於文學心靈的塑造，則〈神思篇〉所說的：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此似就『物色』而言，

<sup>593</sup> 按，專書此 239 字，論文無。

<sup>594</sup> 按，專書此 34 字，論文無。

<sup>595</sup> 按，專書此 639 字，論文此 366 字，手稿無。

即對自然之關照)】<sup>596</sup>，馴致以懌辭【(此似就『習體』而言)】<sup>597</sup>」

四語可以盡之；【「積學以儲寶」，指的是構成文學的各種材料。這些材料皆由前人所遺留下來的精粹，故稱之為寶。才的能力，首先是表現為思考的能力及想像的能力。而其最大的關鍵在有條理。酌理，即可由已表現出的理，以訓練自己思考想像時的條理。因為凡可稱為理的，必具備條理。由思考想像的條理，即可增進思考與想像的能力，此之謂「富才」。「研閱以窮照」，研是研求，閱是檢校，此係指研求檢校古人的文體而言。窮照是說對文體能窮流盡變。研閱古人的文體，便可以徹底照查文體的流變。文體具體表現於語言文字（辭）之中，所以辭是形成文體的最後因素。但「辭徵實而難巧」，辭與意之間，常有一種距離不易剋服。懌辭，是剋服了上述距離以後，恰如意所欲言的極順暢之辭。這必須在不斷地鍛鍊中，漸漸地達到，此即所謂「馴致」。】<sup>598</sup>下篇各篇中對此更隨處【皆有】<sup>599</sup>發揮，【此不多贅】<sup>600</sup>。但須特別指出一點：對心靈的塑造，和對心靈的培養，二者【實是】<sup>601</sup>不可分的；以同樣的力量，讀【同樣的讀】<sup>602</sup>，或觀照同樣的物色，而各人所得的有精粗深淺偏全之別，這便是關係於各人的心靈狀態、人生境界了。

### 【(二) 摹體及摹體的三過程：】<sup>603</sup>

【對文體的初步而具體地學習，便須模仿古人已經成功了的文體。】<sup>604</sup>〈體性篇〉說「摹體以定習」，這是當時一般學文所盛行的方法，全書

<sup>596</sup> 按，手稿、論文此 14 字，專書作「(此似就『習體』而言)」7 字。

<sup>597</sup> 按，手稿、論文此 7 字，專書無。

<sup>598</sup> 按，專書此 284 字，手稿、論文無。

<sup>599</sup> 按，手稿、論文此 2 字，專書作「有」字。

<sup>600</sup> 按，手稿、論文此 4 字，專書作「這是對心靈塑造的具體方法」12 字。

<sup>601</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實際是」3 字。

<sup>602</sup> 按，手稿此 4 字，專書、論文作「同樣的書」4 字。

<sup>603</sup> 按，手稿、論文此點的序號與標題 10 字，專書作「(3) 摹體」3 字。

<sup>604</sup> 按，專書此 26 字，手稿、論文無。

中有幾個地方都提到具體的例子。因此，我們可以了解鍾嶸《詩品》上總是說某人之詩，「其原出於」某人，後人對這一點多覺得只是鍾記室的牽強附會；但我們只要想到當時文人「摹體」的風氣，而將其原出於某某的說法，解釋為【只是】<sup>605</sup>某人開始【作詩時，】<sup>606</sup>摹【倣】<sup>607</sup>某人之詩體，即便毫不足異了。作文之摹體，有如寫字和繪畫的臨帖、臨畫一樣，是硬把自己提高向已經成功的作品上面去的方法；這在現在，還是一種有力的學習方法。波多野完治在《文章心理學入門》中有這樣一段話：英國某文章心理學家，提出「文章的復活作業」，以作為使文章得到進步的方法。即是先選定自己所愛好的某家文章，摘錄其梗概。約經過一週，以摘錄的梗概為基礎，而將原文復活；再將復活的文章與原文加以比較檢討【(註六十)】<sup>608</sup>。這實際即是摹體的一種具體方法。

茲更將彥和的意思加以歸納，摹體可分為三個歷程；開始的歷程是「必先雅製」，所謂「雅製」，乃指五經而言；所謂先雅製，即是先從五經下手；這是從他的〈徵聖〉、〈宗經〉兩篇的意思出來的。【他所以主張】<sup>609</sup>要先從五經下手，一是因為「沿根討葉，思轉自圓」；五經是根，以後的文章是葉；順著根下來，【便能】<sup>610</sup>把握到文章發展之跡，亦即能把握到文章之全。二是因為「矯訛翻淺，還宗經誥」(〈通變篇〉)；以五經之質樸，救當時的文弊。三則因為五經是中國文學的根源，它所包含的可能性多，所發生的影響大，能給學者以深厚廣大的基礎；此即〈宗經篇〉所說的「太山徧雨，河潤千里」及「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至於【經誥之所以成其為「雅」，則在其內容的道德性。而】<sup>611</sup>〈宗經篇〉所說的

<sup>605</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係」字。

<sup>606</sup> 按，專書、論文此3字，手稿無。

<sup>607</sup> 按，手稿此1字，專書、論文作「仿」字。

<sup>608</sup> 按，手稿此「(註六十)」3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三)」4字。

<sup>609</sup> 按，專書此5字，手稿、論文作「主張」2字。

<sup>610</sup> 按，專書此2字，手稿、論文作「能」字。

<sup>611</sup> 按，專書、論文此19字，手稿無。

「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亦【即是】<sup>612</sup>可以得到「雅麗」的理想文體，【〔這對《詩經》而言，或足以當此；對其他各經而言，恐怕是雅多而麗少。所以雅麗的理想文體，〕<sup>613</sup>正如前所說，】<sup>614</sup>【則實是會通以後的總結果】<sup>615</sup>。

摹體的第二歷程，是將各文體【加以】<sup>616</sup>會通，而又能加以銓別。此即〈體性篇〉所說的「八體雖殊，會通合數」；〈通變篇〉所說的「古今備閱」，【及】<sup>617</sup>「先博覽以精閱」。【即和】<sup>618</sup>〈定勢篇〉所說的「淵乎文者，並總文勢【（註六十一）】<sup>619</sup>，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並且在會通眾體之中，又須加以銓別。其理由是「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而譽楯】<sup>620</sup>，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定勢篇〉)。會通【必須包含】<sup>621</sup>有博的工夫在裡面，所以彥和在全書中，常常提到「博」字，不博則無所謂會通。【會通而又能銓別，乃能取精用宏；供給創作以豐富的資料。】<sup>622</sup>

第三歷程是摹體的內在化。【把古人好的文體，消化融解在自己的精神（情性）裡面。】<sup>623</sup>此即〈通變篇〉所說的「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所謂憑情以會通者，是對於所摹的各體，要根據自己的性情，加以會通

---

<sup>612</sup> 按，手稿、論文此 2 字，專書作「即認為由此而」6 字。

<sup>613</sup> 按，論文此 35 字，手稿無。

<sup>614</sup> 按，專書此 40 字，手稿無。

<sup>615</sup> 按，手稿此 11 字，專書、論文作「實是一個人在會通各體以後的總結果」16 字。

<sup>616</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加」字。

<sup>617</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無。

<sup>618</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即」字。

<sup>619</sup> 按，手稿此「（註六十一）」4 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四）」4 字。

<sup>620</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譽盾」2 字。

<sup>621</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作「包含」2 字。

<sup>622</sup> 按，專書、論文此 23 字，手稿無。

<sup>623</sup> 按，專書此 21 字，手稿、論文無。

之意。摹體是向客觀的摹倣；【但僅】<sup>624</sup>摹倣一家一派的文體，固然易【入於】<sup>625</sup>偏枯；即【多學】<sup>626</sup>多摹各家的文體，也易流於雜亂；並成爲沒有靈魂的假古董。【所以如上所說，貴能加以會通。可是各體】<sup>627</sup>的會通，【不是能由文體的】<sup>628</sup>拼湊可以作到，而只有【將其融解】<sup>629</sup>於自己情性之中，有如甜酸苦辣，融解於自己胃液之中一樣，這【才能夠】<sup>630</sup>會通；並且這樣會通以後，向外所習所摹之體，不復以【其原有】<sup>631</sup>客觀外在之體而存在，乃內在化而成爲學者情性【中的】<sup>632</sup>組成分子。此時的情性，不復是僅具有可能性之【原始】<sup>633</sup>的情性，乃係經過塑造後具有向外實現之構造力的情性。由此所形成的文體，非復以前所摹的任何【一種文體】<sup>634</sup>，而是由自己的情性所會通的新體。【這有如蜜蜂的釀蜜；蜜是採自百花；但釀成之後，不復是百花的總合或百花中的任何一花，而只是蜜蜂自己的蜜一樣。這是由摹體而達到對所摹之體的真正吸收，同時即是真正的解脫與超越。】<sup>635</sup>負氣以適變，是說憑藉自己的氣，以適應文體之變。文體應不斷的創造，所以應不斷的變，但【變應爲自己的氣所貫注，因而爲自己的情性所流露、所控制，這便變而不訛不亂。能憑情以會通，便能負氣以適變；所以這句話，可以作爲一種要求，也可以作爲一種效果】。

636

<sup>624</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僅」字。

<sup>625</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入」字。

<sup>626</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多習」2 字。

<sup>627</sup> 按，專書、論文此 17 字，手稿作「文體」2 字。

<sup>628</sup> 按，手稿此 7 字，專書、論文作「不能由各文體外在的」9 字。

<sup>629</sup> 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融解」2 字。

<sup>630</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才是真的」4 字。

<sup>631</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其」字。

<sup>632</sup>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的」字。

<sup>633</sup> 按，手稿、專書此 2 字，論文作「原始性」3 字。

<sup>634</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作「文體」2 字。

<sup>635</sup> 按，專書此 77 未，手稿、論文無。

<sup>636</sup> 按，手稿、論文此 67 字，專書作「若眼睛只望著他人，跟著他人之變而變，則在他

【（三）昭體與變體：】<sup>637</sup>

彥和在〈通變篇〉中，將文體分爲「有常」與「通變」的兩部分；【這在前面已經說過；】<sup>638</sup>他在〈風骨篇〉說，「洞曉情變，曲昭文體」。上一句是指的通變的一部分；下一句是指【的是】<sup>639</sup>有常的一部分。文體必須不斷的創造，不斷的日新；但彥和之意，似乎【爲】<sup>640</sup>在變之中，應把握住不變的因素，使文章能在法軌上變。而他之所謂有常的部分，就〈風骨篇〉「〈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sup>641</sup>好異，蓋防文濫也」；及「若能確乎正式」的話來看，乃指體要之體而言。而體貌之體，已在前面提過，是應當「通變則久」的。昭體，是昭著體要之體，使文章能適應題材的要求，【達到其目的，】<sup>642</sup>因而同時受到題材的制約，【以保持文體在客觀上的意義，】<sup>643</sup>這即〈風骨篇〉所說的「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構成文體的效果之一】<sup>644</sup>在它能與人以新鮮的感覺。任何辭句，在它被使用太多而成爲【爛泥】<sup>645</sup>時，便失去其新鮮感，失去文體的效用。因此，文體的創造，常必表現爲語言的創造；而語言的創造，即是體貌之體的變化。

---

人固然是由創作而來的真變，而在跟隨的人，只能算是摹仿的假變。跟隨本國人而僞變，尚有點共同的鄉土氣；跟隨外國人而僞變，真像中國的名門閨秀，卻只模仿到外國人聳背膀的表情，一樣看到令人難過。劉彥和特於此提出負氣以適變，即是要憑著自己的生命以趨向變，變是出自生命力所要求，由生命力所創造而出，這才是真正有創造性的變。當然，要變，也會要受外在之變的啓發、影響。但與摹體一樣，必須經過選擇、會通、消化的工作。兩眼只知向外看，不能用思考，不敢用思考，不肯用思考的人，一生只能玩僞變的把戲」231字。

<sup>637</sup> 按，手稿、論文此點的序號與標題 6 字，專書作「(4) 體之常與變」6 字。

<sup>638</sup> 按，手稿、論文此 8 字，專書無。

<sup>639</sup>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的」字。

<sup>640</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作「以爲」2 字。

<sup>641</sup> 按，手稿、專書此 1 字，論文作「性」字。

<sup>642</sup> 按，手稿、論文此 5 字，專書無。

<sup>643</sup> 按，專書此 12 字，手稿、論文無。

<sup>644</sup> 按，手稿、論文此 9 字，專書作「作爲文體效用之一」8 字。

<sup>645</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爛熟」2 字。

所以〈通變篇〉說「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註六二)】<sup>646</sup>。〈定勢〉一篇的大意，即在以體要有常之體，定體貌日新之變；這即是他在結論上所說的「執正以馭奇」。**【昭體與變體連結在一起，乃是文學中的以常御變，在題材的客觀要求，客觀制約中，求得不斷的創造。】**<sup>647</sup>

文體沒有不求新、不求變的；一種成功的文體，即是一種新創造的文體。《文心雕龍》〈通變〉〈定勢〉兩篇，主要是繼承〈體性〉〈風骨〉兩篇來解決學文者如何由摹體以求變的問題。紀昀因〈通變篇〉有「矯訛翻淺，還宗經誥」的話，遂**【以爲】**<sup>648</sup>彥和是要「挽其返而求之古」，「復古而名以通變」【(註六三)】<sup>649</sup>，這實係一大誤解。**【但這種誤解，一直支配到現時講《文心雕龍》的人。大家卻忽略了】**<sup>650</sup>這篇的〈贊〉說「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何嘗有半點復古意義。彥和之所以主張還宗經誥，是因為「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即是說文學藻麗的這一面，在當時已發展到了尖端；在此尖端上**【不能求得】**<sup>651</sup>新的變化；而一個人在此種風氣中，若精神**【和技巧上】**<sup>652</sup>無所憑藉，便不容易從風氣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所以還宗經誥的用意，一是爲了回到可能性最多的原始出發點，以求再出發。一是爲了跳出時代風氣的束縛，造成重新創造的自由。至於變的方法，彥和的意思是**【要以】**<sup>653</sup>通求變的。通變**【之變】**<sup>654</sup>，被人常常**【誤解是】**<sup>655</sup>「變則通」的

<sup>646</sup> 按，手稿此「(註六二)」3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五)」4字。

<sup>647</sup> 按，專書此40字，論文作「昭體與變體連結在一起，乃是文學中的以常御變，在客觀要求，客觀制約中，求得不斷的創造」37字，手稿無。

<sup>648</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以」字。

<sup>649</sup> 按，手稿此「(註六三)」3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六)」4字。

<sup>650</sup> 按，專書此25字，手稿、論文無。

<sup>651</sup> 按，手稿此4字，專書作「再不能有」4字，論文作「不能有」3字。

<sup>652</sup> 按，專書此4字，論文作「上」，手稿無。

<sup>653</sup> 按，專書此2字，手稿、論文作「以」字。

<sup>654</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之通」2字。

<sup>655</sup> 按，手稿此3字，專書、論文作「誤解爲」3字。

意思。但觀〈贊〉曰「變則其久，通則不乏」；及下篇的許多通字，實應【釋作】<sup>656</sup>以通求變，【通乃是變的途徑、方法】<sup>657</sup>。通有兩義，一是通古今。即「還宗經誥」下面所說的「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櫟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經誥是質、是雅；當時的風氣是文、是俗；斟酌質文，櫟括雅俗，即是將古今加以會通，【以創出】<sup>658</sup>新的文體。二是通各體。從技術上將各體加以會通取捨，這即是所謂「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參伍因革，在彥和認為在技術上是求變【更新】<sup>659</sup>的重要法門，所以在〈物色篇〉也說「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用這兩種方法來以通求變，彥和認為「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即是有無窮的【性創造】<sup>660</sup>。【變一定是有所變於古，所以對古而言，一定是革。但談到革的時候，大家便容易忘記文化乃是一種積累，積累的本身，即是一種傳承。無傳承，即無積累；無積累，即無文化。所以「古」對今而言，乃是人類自己所積聚的一大財富。對於生命力已經僵化了的人或民族而言，他的身上容納不上任何財富，所以古便成為包袱。對於有生命力的人或民族而言，他將古今上下去探索人類智慧的積聚；則對於古，在革之中，也必會有所因。再從文體來說，文學之弊，常表現為文體之弊。古今無不弊的文體；因為任何偉大的文體，當其初創造出來的時候，在新的體貌中，躍動著新的生命，與人以很大的感染力量，因而此種文體，便成為某一時代的共同趨向，有如西漢人之對於《楚辭》。但因襲太久，則此種文體的自身，變成為一種格套，使沒有真正內容的作者，容易憑藉作偽。使真正有內容的東西，也局限於既成格套之中，陳腔濫調，掩蓋了內容的真面目，此時的文體，便成為一種障

---

<sup>656</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解釋作」3 字。

<sup>657</sup> 按，手稿此 9 字，專書、論文作「彥和是以『通』為求變的途徑、方法的」15 字。

<sup>658</sup> 按，手稿、專書此 3 字，論文作「創出」2 字。

<sup>659</sup> 按，手稿、論文此 2 字，專書作「求新」2 字。

<sup>660</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創造」2 字。

蔽了。但每一文體之出現，都代表了文學心靈的結晶。而新文體的創造，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由個體的參伍以創造新體，則所資者厚，而不致陷入於任何一體之中。今日有許多人只模仿外國某一未成熟的作品，以此為新為變；而對於外人已經得到承認的古典性的作品，也一概棄置不道，因為這樣才少費氣力，容易售其欺；其實，這只是拾他人的唾餘，作自己的珠寶，只是浪費了自己的生命。】<sup>661</sup>

本來從外在的因素來說，【文】<sup>662</sup>文體變化，除彥和所說的求變的途徑以外，尚有四種情勢：一為與不同文化系統的接觸；【一】<sup>663</sup>為文體自身的演變；【一】<sup>664</sup>為社會【及社會思想】<sup>665</sup>的大變革；【一】<sup>666</sup>為民間文學的昇進。但凡屬於價值系統方面的文化，一切合理的變，都是出之於會通，即【都是出之于】<sup>667</sup>斟酌、彙括、因革、參伍，而不是來自張三「打倒」李四，或李四「【倒打】<sup>668</sup>」張三的方式。這是通過任何途徑的變化所不能例外的。假定我們的新文學運動，走的是以通求變的路，而不是走的打倒的路，或者在文學的自身，也不致到現在還是一張白紙。當然，【打倒，是非常簡單；】<sup>669</sup>【會通也決非一朝一夕之功的】<sup>670</sup>。

### 【（5）通過文體來作批評鑒賞】<sup>671</sup>

文體論的另一功效，便在文學的批評鑒賞。某作家假定真正【確立

<sup>661</sup> 按，專書此 498 字，手稿、論文無。

<sup>662</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無。

<sup>663</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作「二」字。

<sup>664</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作「三」字。

<sup>665</sup> 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無。

<sup>666</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作「四」字。

<sup>667</sup> 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無。

<sup>668</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打倒」2 字。

<sup>669</sup> 按，專書、論文此 7 字，手稿無。

<sup>670</sup> 按，手稿此 12 字，專書、論文作「而會通則決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為力，所以這不是出風頭的捷徑」27 字。

<sup>671</sup> 按，專書此章節的序號與標題 10 字，手稿無，論文作「※※※」。

了文體，則其文體必表於外部】<sup>672</sup>。【所以研究者必通過外部的東西，即通過文體以了解作家的本質（註六四）】<sup>673</sup>。所以現代在文學中對文體的研究，已進而成爲根本認識文藝之存在的方法【（註六五）】<sup>674</sup>。劉彥和說：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見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知音篇〉）

【因爲作者之文，是情動而辭發，所以辭是作者之情的形相；讀者披作者之文，可以接觸到作者之情。文辭是波，情性是源，順著文辭之波以討求做爲文辭根源之情性，則作者內心之所醞，亦因之而顯露。文學鑒賞的目的，便在於能見作者之心，以純化深化讀者之心的。所以上面的一段話，正是指】<sup>675</sup>通過文體去作文學的批評鑒賞的。他在〈知音篇〉中【又說】<sup>676</sup>：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

【這段話是提出六種觀賞的方法，以作爲通過文體去鑑賞作品時的具體準據。】<sup>677</sup>所謂位體，乃是視題材以決定所應採取的文體；觀位體，乃是看作者能否【根據題材的要求，以】<sup>678</sup>「曲昭文體」，能否「以本采爲地」。【這即是首先看能不能把握到體要之體。置辭即是遣辭，這是形成體貌

---

<sup>672</sup> 按，手稿、論文此 14 字，專書作「創造出了一個成功的作品，則此作品必定能形成一種文體，使讀者能加以領受」32 字。

<sup>673</sup> 按，手稿此 29 字，專書作「研究者必通過其文體以了解〔此一〕作家的本質（註六十七）」23 字，論文作「研究者必通過〔外部的東西，即通過〕文體以了解作家的本質（註六十七）」28 字。

<sup>674</sup> 按，手稿此「（註六五）」3 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八）」4 字。

<sup>675</sup> 按，專書此 116 字，論文作「這正是指」4 字，手稿無。

<sup>676</sup>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說」字。

<sup>677</sup> 按，專書此 31 字，手稿、論文無。

<sup>678</sup> 按，專書此 8 字，手稿、論文無。

之體的重大因素。體貌貴能通變，貴能奇正相生，這都是有效構成文體的重要方法。事義則是一個作品的內容，宮商則是一個作品的音節。六者融合在一起，始構成一個完整而統一的文體。】<sup>679</sup>把六觀總合起來，即是從一個完整的文體去了解、批評【鑒賞作者】<sup>680</sup>的文章。通觀全書，【乃至所有】<sup>681</sup>六朝人在文學方面所作的【批評、鑒賞】<sup>682</sup>，都是採取這種方法。如〈明詩篇〉，稱古詩爲「直而不野」（按即雅潤）；【稱張衡】<sup>683</sup>《怨詩》【則爲】<sup>684</sup>「清典」；【稱建安】<sup>685</sup>詩【則爲】<sup>686</sup>「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不求「纖密」，惟求「昭晰」。稱正始詩爲「浮淺」，稱嵇康詩爲「清峻」，【稱阮籍】<sup>687</sup>詩爲「遙深」，【稱晉詩】<sup>688</sup>【爲入】<sup>689</sup>於「輕綺」，【稱郭景純】<sup>690</sup>可稱「挺拔」等，全書之例，不勝枚舉。【所謂「直而不野」等等，都是指讀者所把握到的作品的文體。】<sup>691</sup>有專指一篇之體，有概指一人之體，有總指一代之體；由體以追求其文章中的人格、思想、時代，乃至文學之技巧等；因而藉各個統一印象之力，可互相比較，可溯其源流，可得其演變，可推其歸趨，可指其利弊及其補救之途徑。在西方【很長】<sup>692</sup>的傳統中，對文學的研究，過分誇大了【傳記、語言、註

<sup>679</sup> 按，專書此 103 字，手稿、論文無。

<sup>680</sup> 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作者」2 字。

<sup>681</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作「乃至」2 字。

<sup>682</sup> 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批評」2 字。

<sup>683</sup>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張衡」2 字。

<sup>684</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爲」字。

<sup>685</sup>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建安」2 字。

<sup>686</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爲」字。

<sup>687</sup>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阮籍」2 字。

<sup>688</sup>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晉詩」2 字。

<sup>689</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入」字。

<sup>690</sup> 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景純」2 字。

<sup>691</sup> 按，專書此 23 字，手稿、論文無。

<sup>692</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長」字。

釋】<sup>693</sup>等的作用；【甚至以考據代替了對文學史的研究；】<sup>694</sup>【現在則將】<sup>695</sup>這類的研究，左遷為屬於文學的「外的研究」，只能【作為】<sup>696</sup>是補助的手段；並且應將以為「沒有這些外的研究，便不能對文學作健全研究」的觀念，加以排除。而且認定文學作品，其全體與各部分之總計，是兩個東西；文學不是細部的積聚；其全體的構造，【要由】<sup>697</sup>全體構造所顯出的統一【印象（即是文體），】<sup>698</sup>才是解釋之鍵【（註六六）】<sup>699</sup>。所以從文體【來研究】<sup>700</sup>、批評文學，才是研究批評的正軌。這一新的趨向，無形是與劉彥和的觀點相符合的。這是近代在文學研究上的一大進步。但是對於美的東西，不能完全加以分析【（註六七）】<sup>701</sup>，【即不能完全依賴概念的提供】<sup>702</sup>，而只能直接從文學作品本身來領會【作者的文體】<sup>703</sup>，當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彥和雖【對】<sup>704</sup>文體提出了許多的剖析，並提供了許多的實例，而最後仍只能說出「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的方法。博觀是要看得多，並且還要看得熟。以多讀熟讀，從作品的本身來認取作品的文體，這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更好】<sup>705</sup>的辦法。

---

<sup>693</sup> 按，手稿、論文此 6 字，專書作「一個文學家的傳記，文學作品中所用的語言，及對作品的註釋」25 字。

<sup>694</sup> 按，手稿此 15 字，專書作「尤其是受了語言學的壓制、歪曲；〔常把文學的東西變成非文學的東西〕」28 字，論文作「尤其是受了語言學的壓制、歪曲」13 字。

<sup>695</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無。

<sup>696</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當作」2 字。

<sup>697</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由」字。

<sup>698</sup> 按，專書、論文此 6 字，手稿無。

<sup>699</sup> 按，手稿此「（註六六）」3 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九）」4 字。

<sup>700</sup>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研究」2 字。

<sup>701</sup> 按，手稿此「（註六七）」3 字，專書、論文作「（註七〇）」3 字。

<sup>702</sup> 按，手稿此 12 字，專書、論文作「即是不能完全依賴概念性的說明」14 字。

<sup>703</sup> 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作「，這」字。

<sup>704</sup> 按，手稿、論文此 1 字，專書作「對於」2 字。

<sup>705</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好」字。

## 【六、論結】<sup>706</sup>

總上所述，可知文體論在中國的發展，實比歐洲佔先一步。【有大的文化背景在後面，此處不能詳說】<sup>707</sup>。但【隨著】<sup>708</sup>唐代的古文運動，而文體的觀念，即開始模糊；這是因為作為古文運動的中心思想，係繼承經誥的【道德性的】<sup>709</sup>實用思想；實用性的要求，超過了藝術性的要求；以《文心雕龍》的立場來看，是體要之體的意識，壓倒了體貌之體的意識；於是在文體的構成中，只重氣格，而不重色澤；有似繪畫中只重線條、白描，而不重渲染；【恰如】<sup>710</sup>〈風骨篇〉所說的「風骨乏采」；於是在文體一詞中，多只保持了「體裁」【與「體要」】<sup>711</sup>這一方面的意義。體貌的觀念，在古文系統中【反漸漸】<sup>712</sup>隱沒了。但這只是觀念上的隱沒，而【並不是】<sup>713</sup>事實上的隱沒；【因為只要能】<sup>714</sup>成為一篇好的文章，【它一定會以一種體貌以體貌為歸趨的文體出現；】<sup>715</sup>【例如古文運動的領導者】<sup>716</sup>韓愈，正創造了一種與六朝不同、因而也不是劉彥和【和八種】<sup>717</sup>基型所包括的文體【，或者可以說是與輕綺流靡相反的嚴重奇崛的文體】

<sup>706</sup> 按，專書此章節的序號與標題 3 字，手稿、論文無。

<sup>707</sup> 按，手稿此 16 字，專書作「這是因為儒道兩家的思想，皆落實於人的心上。道德是由心而發，文學藝術也是由心而發。《尚書·堯典》已謂『詩言志』。揚雄《法言·問神篇》更明謂『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把文學直接溯源於人之心，而又很早通過詩的比興以使心融合於自然；於是中國的文學，很早便認為是心物交融的結晶；而文體正成立於心物交融的文學之上」119 字。論文作「這是因為有大的文化背景在後面，此處不能詳說」20 字。

<sup>708</sup>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隨」字。

<sup>709</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無。

<sup>710</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恰是」2 字。

<sup>711</sup>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無。

<sup>712</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漸漸」2 字。

<sup>713</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不是」2 字。

<sup>714</sup> 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作「只要是」3 字。

<sup>715</sup> 按，手稿此 20 字，專書、論文作「其體要一定會昇華而成為一種體貌」15 字。

<sup>716</sup> 按，專書、論文此 10 字，手稿無。

<sup>717</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八種」2 字。

<sup>718</sup>。並且古文系統中其他好的文章，常合於「大的藝術技巧，在隱藏其技巧」的原則；他們輕視【可浮在】<sup>719</sup>表面上的體貌，而實則要求、並表現為更深更高的體貌。此一觀念與事實上的矛盾，可用對古文用力最深的姚姬傳在《古文辭類纂·序目》的一段話作代表。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

按方望溪們只強調義法【，即強調體要】<sup>720</sup>。但僅有義法，實不足以構成一篇【好的】<sup>721</sup>文章，故姚姬傳進而談形貌。他所舉的「所以為文者八」，即是【文章的八種形貌】<sup>722</sup>。在他看，神理氣味，乃【所以構成】<sup>723</sup>形貌之精；格律聲色，【係】<sup>724</sup>形貌之粗；作者學古人（即摹體），要由【形貌之粗以通於形貌之精】<sup>725</sup>，最後並遺粗而御精；這【有似煉丹中】<sup>726</sup>的昇華作用；若把姚氏這段話詳加解釋，與劉彥和【的意思並無】<sup>727</sup>出入；【他在《海晏詩鈔·序》中謂「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

---

<sup>718</sup> 按，專書、論文此 21 字，手稿無。

<sup>719</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飄浮在」3 字。

<sup>720</sup> 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無。

<sup>721</sup>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好」字。

<sup>722</sup> 按，手稿此 7 字，專書、論文作「構成文章形貌的八種因素」11 字。

<sup>723</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無。

<sup>724</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作「乃所以構成」5 字。

<sup>725</sup> 按，手稿此 11 字，專書、論文作「構成形貌之粗者，以通於構成形貌之精者」17 字。

<sup>726</sup> 按，手稿此 5 字，專書、論文作「正是前面所說過」7 字。

<sup>727</sup> 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作「並無多大」4 字。

深」、「徐婉」，是他所說的形貌，即彥和之所謂文體。在〈答翁學士書〉中謂「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他此處之所謂「度」「態」「華」，亦即他之所謂形貌，亦即彥和之所謂文體；而此處之所謂「聲色」，正是彥和之所謂「聲貌」，即文體中之體貌。他以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也與〈風骨篇〉及〈通變篇〉之大意相合。一個問題追究到底時，見解自然若合符契，此亦其一證。〔並且劉彥和畢竟爲時代所限，他所把握到的文章的體貌，主要是在聲色方面。姚氏更提出神、理、氣、味，這實已更直湊單微，達到了「無體之體」的文學的極誼，此乃文體論的一大發展。比阮元之流，徒舉文章的聲色以相抗，而又不能洞澈聲色之源，可謂固陋之極〕<sup>728</sup>。】<sup>729</sup>但姚氏不知他之所謂形貌，即六朝人【所謂之】<sup>730</sup>文體，而襲誤承訛，仍以【體與類】<sup>731</sup>爲一物，而說「凡文之體類十三」，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大錯誤。他這段話的正確表現，應爲「凡文之類十三，而所以爲文體者八。……」假使能呼起姚氏於九原，一定會得到他的首肯的。【但】<sup>732</sup>唐代文體之概念，雖隨古文運動而漸晦，但在詩中仍加保持；釋皎然「詩勢」，以十九字論體；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均係形容詩的體貌【，實即二十四種詩體】<sup>733</sup>。【及宋人好以「事義」爲詩（註六八），】<sup>734</sup>而文體之觀念，【乃特】<sup>735</sup>著於詞、著於曲；由此可見文學中的純藝術性，並不能爲實用性所掩；

<sup>728</sup> 按，專書此 102 字，論文無。

<sup>729</sup> 按，專書此 307 字，手稿無。

<sup>730</sup> 按，手稿此 3 字，專書、論文作「之所謂」3 字。

<sup>731</sup> 按，手稿、專書此 3 字，論文作「體類」2 字。

<sup>732</sup> 按，手稿、論文此 1 字，專書作「不過」2 字。

<sup>733</sup> 按，專書此 8 字，手稿、論文無。

<sup>734</sup> 按，手稿此 12 字，論文作「及宋人好以『事義』爲詩（註七十一）」13 字，專書作「及宋元」3 字。

<sup>735</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作「又特」2 字，論文作「乃轉」2 字。

而文學中的【形相性的】<sup>736</sup>自覺，既因文學之藝術性而誘發，亦因文學之藝術性而保持。【這是從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所得出的結論。】<sup>737</sup>

註一：莫爾頓（R. G. Moulton）：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文學的近代研究》）【日】<sup>738</sup>譯本 106 頁【又陸機《文賦》「其窮形而盡相」<sup>739</sup>故本文用「形相」而不用「形象」。

註二：卡西勒（E. Cassirer）：An Essey on Man【（《論人》）日譯本】<sup>740</sup>204 頁。

註三：歧約（J. M. Guyaun）：【著】<sup>741</sup>L' 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ue（《從社會學看藝術》）日【大西克禮】<sup>742</sup>譯本 109 頁。

註四：最初所謂 style 的，係一端是尖的，另一端有一個小圓匙的金屬小棒。【羅馬人】<sup>743</sup>用它來在著了一層薄蠟的小板上寫字的。以後，把人的筆跡稱為 style；再進一步，則稱寫作的樣式，言語的特殊性，文體等為 style。（以上參閱東鄉正延編《文學理論（2）》182 頁）日人有的譯音，有的譯為「樣式」，這是為了便于與一般藝術相通用；有的【則譯】<sup>744</sup>為「文體」，文體是根據中國的傳統觀念來使用的。

註五：西方最早的文學理論批評的著作，應當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

---

<sup>736</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作「形相」2 字。

<sup>737</sup> 按，手稿此 19 字，專書、論文作「現在要把文學從語言、考據的深淵中，挽救出來，作正常的研究，只有復活《文心雕龍》中的文體觀念，並加以充實擴大，以接上現代文學研究的大流，似乎這才是一條可走的大路」70 字。

<sup>738</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作「日本本多顯章」8 字。

<sup>739</sup> 按，手稿此 11 字，專書、論文作「又英文之 figure，中日多譯為『形象』；但荀子〈非相篇〉已屢用『形相』一詞，而陸機《文賦》亦有『期窮形而盡相』之語」40 字。

<sup>740</sup> 按，手稿此 5 字，專書作「日宮城昔彌譯稱《人間》」9 字，論文作「日宮城昔彌譯本」7 字。

<sup>741</sup> 按，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無。

<sup>742</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無。

<sup>743</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羅馬」2 字。

<sup>744</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譯」字。

詩學中雖未正式提出文體的觀念，但已特別重視結構（plot）與修辭；這正是【是】<sup>745</sup>構成文體的重大因素。西方第一部《文體論》（Peri hērme nēias）乃出現於作者姓名不詳的第一世紀。這部書應當是對以前許多文體論的總結。

註六：現本《文心雕龍》自〈神思〉至〈附會〉共十八篇；然〈時序篇〉後之〈物色篇〉，范注以為應在〈總術篇〉之上者是也。

註七：見《太平御覽》卷 610。

註八：參閱岡崎義惠著《文藝學概論》207—211 頁。

註九：見《支那詩論史》95 頁。

註十：按劉彥和係將〈離騷〉與【上篇】<sup>746</sup>之〈原道〉、〈徵聖〉、〈宗經〉、〈正緯〉等四篇並列，以為此後文學發展之總根源，故〈序志篇〉謂「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青木氏】<sup>747</sup>將〈辨騷〉一篇與〈明詩〉以下二十篇並列，而視為文章之一類（青木則誤【以為】<sup>748</sup>一體），與彥和自序不合，大誤。

註十一：見原書 122【頁】<sup>749</sup>—123 頁。

註十二：見青木氏著《支那文學思想史》77—78 頁。

註十三：此書在臺灣【由中華書局重印，而未註明作者姓名。若干大學】<sup>750</sup>用作文學史課程之教材。

註十四：見劉氏原著上卷 229 頁。

註十五：見郭氏原著 1955 年改寫版 57 頁，並參閱原著 37—47 頁，13、

---

<sup>745</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無。

<sup>746</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上」字。

<sup>747</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作「青木」2 字。

<sup>748</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為」字。

<sup>749</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無。

<sup>750</sup> 按，手稿、論文此 19 字，專書作「若干大學中」5 字。

14、15 三節。

註十六：《文心雕龍·樂府篇》「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詮賦篇〉「斯又小製之區畛。」〈雜文篇〉「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一區。……類聚有貫，故不曲述。」〈諸子篇〉「條流殊述（術），若有區囿。」〈論說篇〉「八名區分，一揆【宗論】<sup>751</sup>。」〈書記篇〉「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序志篇〉「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

註十七：蕭統《文選·序》「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註十八：章樵升，南宋理宗時人。其《古文苑·序》謂「歌詩賦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爲體二十有一。」【此係以類爲體之顯著錯誤。】<sup>752</sup>

註十九：見凌雲刻本。

註二十：青木氏著《支那文學思想史》79 頁。

註二十一：此處若暫將文體與風格的區別，置之不論，而將二者作同一意義的名詞用，則揚雄《法言》稱「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豈非加以區分之始？其次則曹丕之《典論·論文》，將文體區分爲「雅」「理」「實」「麗」四種，尤爲彰著。郭氏以一生之力治中國文學批評史，而謂〈體性篇〉之八體，爲區分文章風格的最早材料，未免過於粗陋。

註二十二：郭氏著《中國文學批評史》改寫版 66 頁。

註二十三：《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

註二十四：《文心雕龍·章表篇》「章以造闕，風矩應明。」【又〈奏啓篇〉「辭有風軌。」】<sup>753</sup>

---

<sup>751</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總論」2 字。

<sup>752</sup> 按，專書此 11 字，手稿、論文無。

<sup>753</sup> 按，專書、論文此 8 字，手稿無。

註二十五：近數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受西方文學的影響，以實用性文學，為我國文學傳統之一大弱點，因而特注重提倡傳統中之純美文學，【特以】<sup>754</sup>繼承乾嘉學派者為然。但若想到西方文學發展之趨向，逐漸以新聞文學為中心，則我國實用文學之傳統，或竟係一大優點。

註二十六：《文心雕龍·定勢篇》。

註二十七：《文心雕龍·詮賦篇》「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極聲貌以窮文」。〈【夸飾】<sup>755</sup>篇〉「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

註二十八：可參閱日人岡崎義惠著《文藝學概論》111頁—114頁。

註二十九：《文心雕龍·明詩篇》「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

註三十：《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註三十一：《詩·大序》「故詩有六義焉」。《正義》「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但此體為體裁之體。

註三十二：班固《離騷序》。

註三十三：王逸《楚辭章句序》。

註三十四：《文心雕龍·時序篇》。

註三十五：【全上】<sup>756</sup>〈情采篇〉。

註三十六：《世說新語》卷下之上有〈容止篇〉。

註三十七：參閱日人土居光知著《文學序說》382—383頁。

註三十八：中國文化不【重視】<sup>757</sup>純思辨性的思想，而常是通過具體的事類以【表現】<sup>758</sup>其思想。此即〈事類篇〉之所謂「據事以類義」。【故劉彥和常稱之為「事義」。】<sup>759</sup>事義相當於西方之所謂思想，而又

---

<sup>754</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尤以」2字。

<sup>755</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誇飾」2字。

<sup>756</sup> 按，手稿、論文此2字，專書作「同上」2字。

<sup>757</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注重」2字。

<sup>758</sup> 按，手稿此2字，專書、論文作「表達」2字。

<sup>759</sup> 按，手稿此10字，專書、論文無。

多是因事見義，故又與西方之所謂思想不盡相同；此等處，正可見中西文化性格之違異。事義以思想為主，但亦包含有感情在內；蓋感情亦因事而發，而古人對情與義，有時混而不分也。

註三十九：斯賓塞以爲文體的諸法則，不過是以最小之力，獲得最大之效果的法則。（歧約著《從社會學看藝術》第二部【下日譯本】<sup>760</sup>89 頁）此主張的實現，即是縮短表現與對象的距離（參閱波多野完治著《文章心理學入門》76 頁）【此即】<sup>761</sup>此處之所謂「切」或「簡要」。

註四十：〈明詩篇〉「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又〈時序篇〉「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註四十一：〈明詩篇〉「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正指謝靈運而言。

註四十二：揚子《法言·吾子篇》。

註四十三：參閱土居光知《文學序說》337 頁。

註四十四：參閱【日文】<sup>762</sup>《世界文學辭典》1056 頁。

註四十五：歧約著《從社會學看藝術》第二部【下前】<sup>763</sup>日譯本 95 頁。

註四十六：〈神思篇〉「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心存」之心，【即此】<sup>764</sup>處之神思；故下文將神與思分述；而【後文之】<sup>765</sup>「亦有助乎心力」之「心力」亦即神思。

註四十七：見土居光知著《文學序論》338 頁。

---

<sup>760</sup> 按，手稿此 4 字，專書作「日譯本下」4 字，論文作「前日譯本下」5 字。

<sup>761</sup> 按，手稿此 2 字，專書、論文作「亦即」2 字。

<sup>762</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無。

<sup>763</sup> 按，論文此 2 字，手稿、專書作「下」字。

<sup>764</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即」字。

<sup>765</sup> 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無。

註四十八：「才量學文」之量，依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改作童。見原著 274 頁。按彥和稱初學者皆曰童；如〈體性篇〉之「童子雕琢。」〈養氣篇〉之「凡童少鑿而氣盛」皆是。

【註四十九：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以理釋風，以辭釋骨，與原義不合，未敢苟同。】<sup>766</sup>

【註四十九】<sup>767</sup>：參閱部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之文化》日【村松恒一郎】<sup>768</sup>譯本下卷第四篇第三章〈風景美之發見〉28—41 頁。

【註五十】<sup>769</sup>：《文心雕龍》中的〈比興篇〉，乃就一般【文學】<sup>770</sup>而言，非僅論詩的比興。

【註五十一】<sup>771</sup>：見歧約著《從社會學看文藝》日譯本第二部下 100 頁。

【註五十二】<sup>772</sup>：參閱岡崎義惠著《文藝學概論》104—114 頁。

【註五十三】<sup>773</sup>：歧約《從社會學看藝術》日譯本第二部下 123 頁。

【註五十四】<sup>774</sup>：參閱小林英夫著《文體論之建設》114 頁。波多野完治著《文章心理入門》15 頁。

【註五十五】<sup>775</sup>：參閱土居光知著《文學序說》345—346【頁】<sup>776</sup>。

---

<sup>766</sup> 按，專書、論文此「註四十九」及註文的 32 字，手稿無。

<sup>767</sup> 按，手稿此「註四十九」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3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68</sup> 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無。

<sup>769</sup> 按，手稿此「註五十」3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一」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70</sup> 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學」字。

<sup>771</sup> 按，手稿此「註五十一」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二」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72</sup> 按，手稿此「註五十二」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三」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73</sup> 按，手稿此「註五十三」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四」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74</sup> 按，手稿此「註五十四」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五」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75</sup> 按，手稿此「註五十五」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六」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

【註五十六】<sup>777</sup>：東鄉正延編譯《文學理論（二）》240 頁。

【註五十七】<sup>778</sup>：【全上】<sup>779</sup>書 232 頁。

【註五十八】<sup>780</sup>：岐約著《從社會學看藝術》第二部下日譯本 185 頁。

【註五十九】<sup>781</sup>：皆見〈程器篇〉。

【註六十一：請參閱傳東華譯 Hent 著《文學概論》35—36 頁。】<sup>782</sup>

【註六十二：見土居光知著《文學序說》335 頁。】<sup>783</sup>

【註六〇】<sup>784</sup>：見原書 62 頁。

【註六十一】<sup>785</sup>：〈定勢篇〉之勢，黃季剛先生【《札記》】<sup>786</sup>以「法度」釋之，實與勢之本義及本篇不相應。試就全篇研究，【則知】<sup>787</sup>勢有三義，而皆相資互通；（一）勢即氣；氣之表現於文章中之部分者為風為骨；氣之驅遣全篇者則為勢。（二）勢即體；但體以靜態言，勢以動態言。此處之勢，即與體同義。（三）為作者所養成之一種自然的形成力量或創造力量；此為本篇之主要意義。

---

十九」所致。

<sup>776</sup>按，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無。

<sup>777</sup>按，手稿此「註五十六」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七」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78</sup>按，手稿此「註五十七」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八」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79</sup>按，手稿、論文此 2 字，專書作「同上」2 字。

<sup>780</sup>按，手稿此「註五十八」4 字，專書、論文作「註五十九」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81</sup>按，手稿此「註五十九」4 字，專書、論文作「註六〇」3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所致。

<sup>782</sup>按，專書、論文此「註六十一」及註文的 20 字，手稿無。

<sup>783</sup>按，專書、論文此「註六十二」及註文的 16 字，手稿無。

<sup>784</sup>按，手稿此「註六〇」3 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三」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85</sup>按，手稿此「註六十一」4 字，專書、論文作「註六十四」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86</sup>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無。

<sup>787</sup>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則」字。

- 【註六十二】<sup>788</sup>：陸機《文賦》「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似亦同此意。
- 【註六十三】<sup>789</sup>：見《文心雕龍》紀昀評。
- 【註六十四】<sup>790</sup>：參閱波多野完治著《文章心理學入門》117—119 頁。
- 【註六十五】<sup>791</sup>：參閱岡崎義惠著《文藝學概論》211 頁。
- 【註六十六】<sup>792</sup>：參閱 R. G. Moulton 著 *The Mor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前】<sup>793</sup>日譯本【序 2 頁及】<sup>794</sup>113—117 頁。【及傅東華譯 Hent《文學概論》48—49 頁。】<sup>795</sup>
- 【註六十七】<sup>796</sup>：參閱【全】<sup>797</sup>上書 433 頁。
- 【註六十八：我以為宋詩係古文運動的擴大；最低限度亦係受古文運動之影響，此處不多涉及。】<sup>798</sup>

---

<sup>788</sup> 按，手稿、論文此「註六十二」4 字，專書作「註六十五」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89</sup> 按，手稿、論文此「註六十三」4 字，專書作「註六十六」。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90</sup> 按，手稿、論文此「註六十四」4 字，專書作「註六十七」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91</sup> 按，手稿、論文此「註六十五」4 字，專書作「註六十八」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92</sup> 按，手稿、論文此「註六十六」4 字，專書作「註六十九」4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93</sup> 按，論文此 1 字，手稿、專書無。

<sup>794</sup> 按，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無。

<sup>795</sup> 按，專書、論文此 13 字，手稿無。

<sup>796</sup> 按，手稿此「註六十七」4 字，專書、論文作「註七十」3 字。此因手稿無「註四十九」、「註六十一」、「註六十二」所致。

<sup>797</sup> 按，手稿此 1 字，專書、論文作「日譯 Moulton」3 字。

<sup>798</sup> 按，手稿此「註六十八」及註文的 37 字，論文作「註七十一：我以為宋詩係古文運動的擴大；最低限度亦係受古文運動之影響，此處不多涉及」37 字，專書無。

## 東海特藏整理

### 華文雜誌創刊號《戲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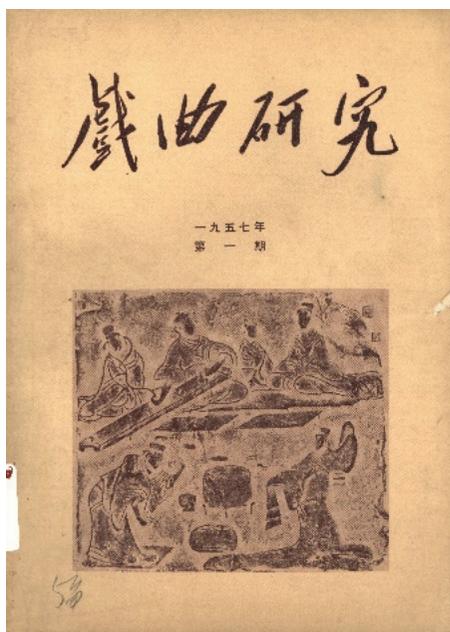
高鈺軒\*

館藏《戲曲研究》創刊號目前收藏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閉架管理之善本書室，由圖資處處本部典藏、維護與管理。刊物規格為長 26.2 公分、寬 19 公分，直式左翻。創刊號於 1957 年 1 月 10 日出版，由郵電部上海市郵局以季刊形式發行，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後與《戲劇論叢》合併為《戲劇研究》，於 1980 年復刊。是中國當代戲劇史上創辦最早的戲曲學領域雜誌。

此刊物堅持繼承與發揚中國藝術研究院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傳統，重視戲曲現狀研究，關注戲曲理論與批評發展，聚焦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戲曲的保護與研究、傳承與變革。當代許多著名的戲劇史論家、劇作家、導演和表演藝術家，如梅蘭芳、程硯秋、鄭懷興、高行健、張君秋、張庚、郭漢城、劉厚生、夏淳、袁玉堃、李紫貴、翁偶虹、林兆華等人，都曾在此發表文章。

於創刊號發刊辭中提到對戲曲研究所秉持的精神，以及對此刊的願景與期待「我們本著學習的精神，創辦“戲曲研究”的季刊，希望取得多方面的幫助，更好地來進行我們的研究工作。」

主要刊登文章廣泛涉及戲曲研



《戲曲研究》創刊號封面

---

\*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究的多元領域，包含戲曲理論與批評、戲曲遺產研究、深度訪談、戲曲史研究、地方戲曲研究、比較戲劇、表演藝術、戲曲音樂、文獻考證、少數民族戲劇及各類專題研究等。以及中國當代戲曲的發展概貌、學術研究狀況和當代戲曲學的構建過程，都能在其中尋找到清晰的脈絡，對中國當代戲曲研究有重大貢獻。

## 封面

《戲曲研究》創刊號封面圖為漢代樂舞象，上方以黑字由左至右題寫刊名「戲曲研究」，於刊名正下方則標有創刊年份「一九五七年」與期數「第一期」。

## 目次

《戲曲研究》創刊號目錄為橫式編排，本期除發刊詞外，收錄有 12 篇文章，由許多中國當代戲曲領域專家學者提供稿源刊登，如梅蘭芳、程硯秋、劉成基、曾榮華等人，內容涵蓋演員談表演藝術，戲曲理論與研究、戲曲現狀討論等等。

## 目錄

發刊詞	( 1 )
演員談表演藝術	
要善於辨別精、粗、美、惡	梅蘭芳 ( 2 )
略談旦角水袖的運用	程硯秋 ( 6 )
略談川劇旦角的基本訓練與表演要求	陽友鶴 (11)
談川劇丑角的表演藝術與個人表演經驗	劉成基 (27)
我怎樣運用基本練功演戲	陳伯華 (36)
略談川劇小生的表演問題	曾榮華 (42)
“姑嫂忙”是怎樣運用傳統表演手法的	銀漢光 (44)
我表演現代生活劇目的點滴體會	郎咸芬 (47)

生活的真實和戲曲表演藝術的真實 ..... 阿 甲 (50)

論西廂記及其改編 ..... 林涵表 (64)

古典戲曲臉譜的初步研究 ..... 黎 新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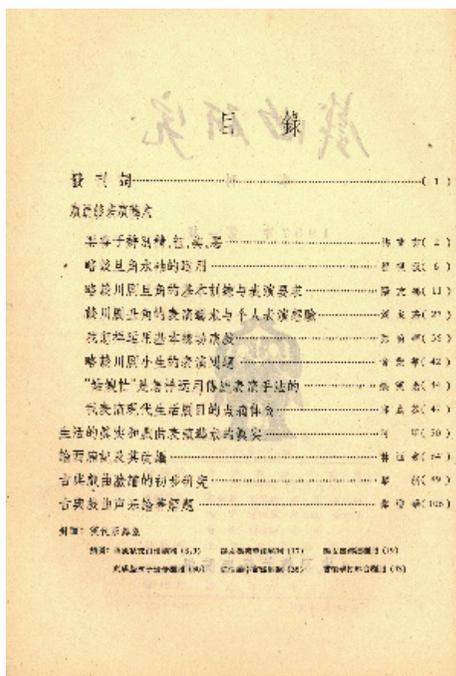
古典戲曲聲樂論著解題 ..... 傅惜華(106)

封面：漢代樂舞象

插圖：

程硯秋荒山淚劇照(8,9) 陽友鶴芙蓉劍劇照(17) 陽友鶴醉酒劇照(19)

劉成基五子告母劇照(30) 陳伯華宇宙鋒劇照(38) 曾榮華打紅合劇照(43)



《戲曲研究》創刊號目錄

### 發刊辭

本期創刊號於第一頁發表發刊詞，列出四點說明其研究方法與精神，並表達其對中國戲曲藝術研究的願景與期許。

### 發刊詞

我國戲曲劇種繁多、戲曲遺產豐富，不論從它發展的歷史，或分門別類地從劇本、音樂、表演、舞蹈、舞台美術等各方面，都有很多東西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但對象只是研究條件之一，此外還需要研究的能力與研究的材料，這些我們都是很缺乏的。把我國特有的優秀的戲曲藝術作科學的研究，是建設祖國社會主義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也是一個長期而艱鉅的任務。

我院自創建以來，陸續進行了一些研究工作，積累了一些研究資料。近兩年，我們通過各種業務性質的會議，如演員講習會、劇目座談會等，以及到各省進行調查，參加觀摩會演等工作，對目前戲曲工作中的實際情況作了一些研究。經過幾年的摸索，我們才逐漸比較明確了幾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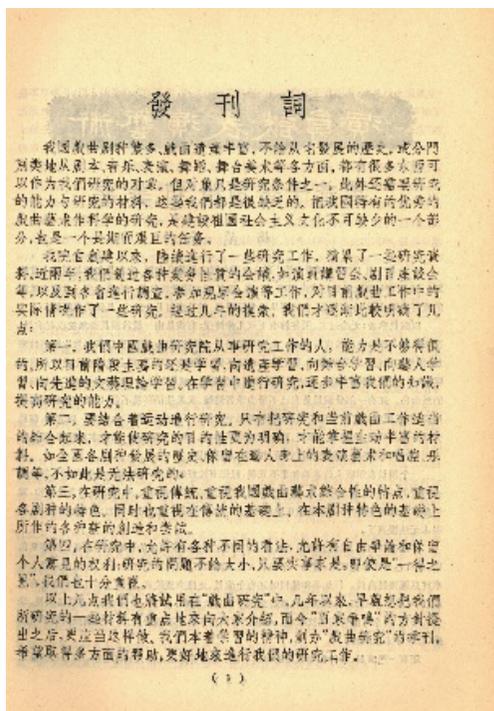
第一，我們中國戲曲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的人，能力是不夠得很多的。所以目前階段主要的還是學習，向遺產學習、向舞臺學習、向藝人學習、向先進的文藝理論學習。在學習中進行研究，逐步豐富我們的知識，提高研究的能力。

第二，要結合著運動進行研究。只有把研究和當前戲曲工作適當的結合起來，才能使研究的目的性更為明確，才能掌握生動豐富的材料。如全國各劇種發展的歷史、保留在藝人身上的表演藝術和唱腔、樂調等，不如此是無法研究的。

第三，在研究中，重視傳統、重視我國戲曲藝術綜合性的特點，重視各劇種的特色。同時也重視在傳統的基礎上、在本劇種特色的基礎上所作的各種新的創造和嘗試。

第四，在研究中，允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允許有自由爭論和保留個人意見的權利；研究的問題不論大小，只要實事求是，即使是“一得之見”，我們也十分重視。

以上幾點我們也將試用在“戲曲研究”中。幾年以來，早就想把我們所研究的一些材料有重點地來向大家介紹，而今“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後，更應當這樣做。我們本著學習的精神，創辦“戲曲研究”的季刊，希望取得多方面的幫助，更好地來進行我們的研究工作。



《戲曲研究》創刊號發刊詞

### 稿約

本期創刊號刊物並無稿約。

### 版權資訊

版權頁內容刊登於本刊物之封底，由郵電部上海市郵局發行，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他資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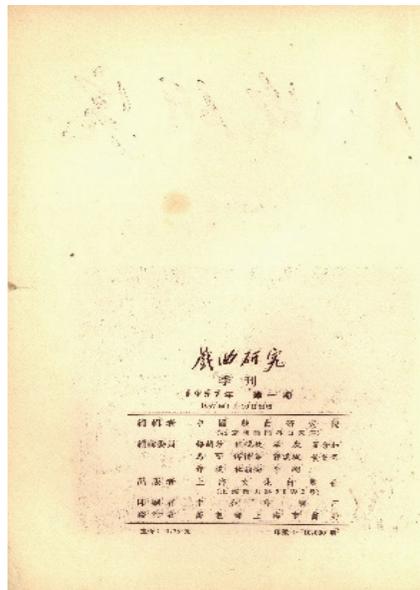
戲曲研究

季刊

1957年 第一期

1957年1月10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北京朝陽門外白家莊)			
編輯委員	梅蘭芳	程硯秋	張庚	羅合如
	馬可	傅惜華	郭漢城	黃芝岡
	舒模	杜穎陶	李剛	
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發行者	郵電部上海市郵局			
定價：0.75元	印數：1-10,000冊			



版權資訊

## 台灣雜誌創刊號《幼獅》

王雅萍\*

館藏《幼獅》月刊創刊號目前收藏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閉架管理之善本書室，由圖資處典藏、維護與管理。刊物規格為長 26 公分、寬 19 公分，直式右翻。《幼獅》月刊於 1953 年 01 月由幼獅月刊社創刊發行。《幼獅》月刊是台灣 1960 至 80 年代重要的文藝雜誌，1958 年 10 月救國團出資 20 萬將《幼獅》月刊與《幼獅文藝》、「幼獅通訊社」、「幼獅電臺」等合併，成立幼獅文化服務機構。該月刊於 1989 年 7 月（第 438 期）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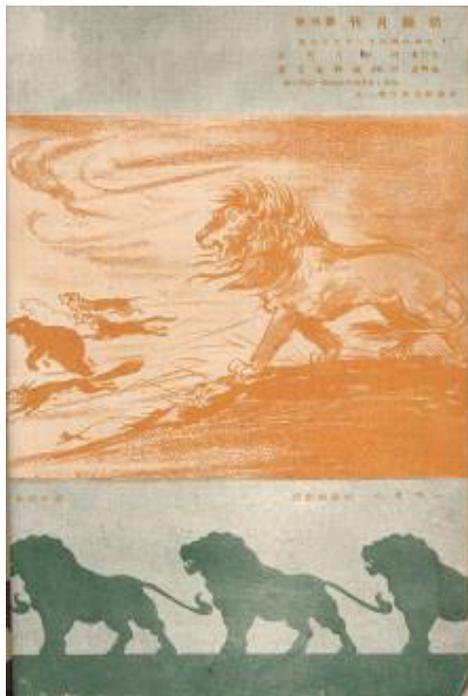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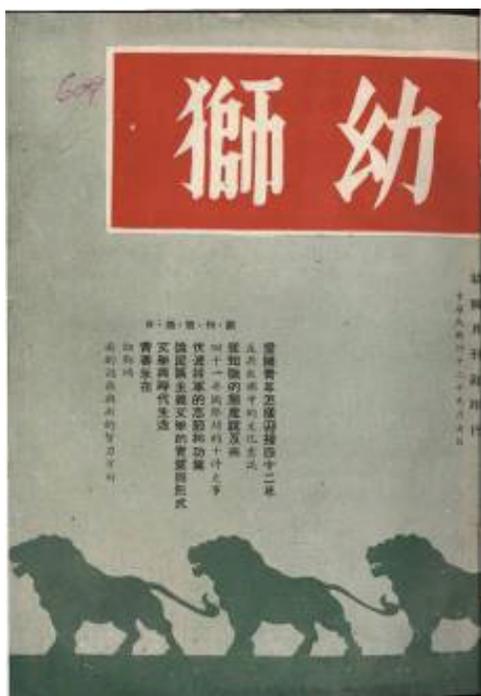
此刊為綜合性刊物，但文藝仍佔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篇幅。收錄內容以「態度積極富有愛國精神的稿件」為主。由創刊號的目錄可觀之，有收錄牟宗三、錢思亮等人之文章，多以反共救國的文化意識、論愛國青年的反共態度等。文藝創作篇幅則有小說、散文、現代詩、朗誦詩，甚至漫畫等創作作品。

### 封面

《幼獅》月刊創刊號封面題有「幼獅」刊名二字，封面最右側載明「幼獅月刊社印行」、「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元月出版」字樣。封面、封底由梁中銘繪有獅子剪影圖像，象徵現代中國青年的英姿勃發，而幼獅即有英譯 youth 青年之意。封面亦有當期的創刊號簡目—愛國青年怎樣迎接四十二年、反共救國中的文化意識、從知識的態度說反共、四十一年國際間的十件大事、伏波將軍的志節和功業、論民族主義文學的實質與形式、文學與時代生活、青春永在、幼獅頌、新的認識與新的努力方向。

---

\* 東海大學圖書暨資訊處處本部組員。



《幼獅》創刊號封面（左）、封底（右）

### 目次

《幼獅》月刊創刊號目錄為直式編排。本期刊有發刊辭外，還有小說、散文、詩、漫畫等創作。目次內容如下：

讓我們怒發獅子的吼聲（發刊詞）	（4）
愛國青年怎樣迎接四十二年（新年筆談會）	（5）
周至柔 郭寄嶠 程天放 陳雪屏 錢思亮 劉真 任培道	
求知·服務·救國	沈昌煥（18）
反共救國中的文化意識	牟宗三（30）
從知識的態度說反共	錢思亮（24）
伏波將軍的志節和功業	蔣君章（11）
四十一年國際間的十件大事	李士英（16）
韓戰縱橫談	胡一貫（9）
論民族主義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葛賢寧（19）

新的認識和新的努力方向 ..... 趙友培 (37)

文學與時代生活 ..... 趙書紳 (29)

**小說**

李老太太 ..... 謝冰瑩 (14)

青春永在 ..... 方 瑜 (26)

彩彩 ..... 楊念慈 (21)

鷹 ..... 劉心皇 (38)

草原散曲 (散文) ..... 歐陽天 (25)

幼獅頌 (詩) ..... 光中 紀弦 古之紅 南星 楊美英 (23)

青年·反共·救國 (朗誦詩) ..... 宋 膺 (15)

聞雞 (詩) ..... 艾 廣 (8)

家書 (詩) ..... 君 田 (25)

木刻二幅 ..... 陳其茂 (24)

漫畫 ..... 梁中銘 廖未林 (36)

版出月元年二十四國民華中

**創刊號目錄**

這我們怎辦了的心聲 (華刊)	趙友培	37
文學與時代生活	趙書紳	29
李老太太	謝冰瑩	14
青春永在	方 瑜	26
彩彩	楊念慈	21
鷹	劉心皇	38
草原散曲 (散文)	歐陽天	25
幼獅頌 (詩)	光中 紀弦 古之紅 南星 楊美英	23
青年·反共·救國 (朗誦詩)	宋 膺	15
聞雞 (詩)	艾 廣	8
家書 (詩)	君 田	25
木刻二幅	陳其茂	24
漫畫	梁中銘 廖未林	36

版出月元年二十四國民華中

《幼獅》月刊創刊號目錄

## 發刊辭

### 讓我們怒發獅子的吼聲

二十世紀真是一個奇特的時代，他一面帶給人們以飛躍的進步，一面也帶給人們以無情的毀滅。

科學的進步，改變了物質世界的舊面目。不夜城的電炬代替一燈如豆的菜油燈，橫空萬里的鐵翼代替羊腸小徑的手推車，電信代替跑文書，炸彈代替龍泉劍，一切像在變幻術，一切像替封神榜作具體的寫真。然而這并非傳奇，這是絕對的真實。我們要面對現實，迎頭趕上科學的進步；決不能低徊往事，發懷古的幽情！

不過西方物質的繁榮，却也窒塞了性靈的啓發。一個分工極細的工人，從早到晚，從今天到明天，從青春到白首，一刻不離他那鏢絲釘的崗位工作，如果沒有性靈的調劑，就會由緊張的疲乏突變為崩潰的瘋狂。不幸隨科學以俱來的思想，如實驗主義，如功利哲學，如唯物理論，只在一點一滴的追求外物，而不能在生命、精神、理想上體認人生。一切都是機械，一切都是馬力，於是人性向物性低頭，於是走上人性的真空與人生的毀滅。

我們沒有反對科學反對物質的道理，但科學與物質是為人生而服務的，如果不能發揮人性的尊嚴，提高人生的估價，一味向外物去追求，一味沉溺於物慾的享受，則第一步將陷入身為物役的錯誤泥沼，第二步就陷入以身殉物的反動深淵。所以不是物質毀滅人生，而是人們以物質汨沒人性，以自趨于毀滅之途。當前共產主義唯物史觀的拜物教，正是以物性毀滅人性的最惡魔鬼。

共產主義承物質主義的末流，對西方文化來了一次澈底的總反動。他們以經濟平等鬥爭政治自由，結果是自由毀滅於集權，而平等亦歸于罪惡。生活上的平等是一塊黑麵包的平等，工作上的平等是奴隸集中營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是搾乾最後一滴血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是沒有說話自由也沒有不說話自由的平等，推而至於人格上的平等就是一切向

禽獸看齊的平等。子弟鬥爭父兄，個人出賣國家，男女杯水主義，都是從這個物質平等上出發的，本亦無足深怪。醜惡哉，共產主義的平等，禽獸世界的平等！所以反共抗俄的鬥爭，是和平對侵略的鬥爭，是愛國主義對賣國主義的鬥爭，更是人性對物性，文明對野蠻的文化鬥爭。

知道了共產主義的由來與特質，則反共抗俄的動力，是不能單憑物質主義以獲勝的。要講物性物質，正是共產主義的拿手好戲；誰的唯物哲學比唯物史觀更爲大膽，誰的物資動員比俄匪更爲澈底？即以科學技術而論，俄匪固然落後，但如我們不能善用科學技術，則原子彈的祕密，亦曾漏向史魔。至于我們以自由爲號召固可以戰勝奴役，但此自由必發于人性的光輝；否則以放縱恣肆爲自由，那更是俄匪最快意的朋友。反共是人性對物性的鬥爭，憑物質主義鬥唯物史觀，是邏輯上的「自語相違」。我們只有在人性上痛下工夫，才有反共抗俄的勝利保證！

我們放眼世界，不禁憂從中來。反侵略世界的反共，尙未能盡超出物質主義的窠臼。大家只作軍援經援的計較，而不努力在人性方面，武裝其思想與精神。遂使史達林的欺騙鬼詐有機可乘，遂使共產主義禍水汎濫于世界。所幸「真理運動」、「道德重整」，和「道義鼓勵」之說，已經逐漸抬頭了；「一燈慧命續如絲」，我們希望他有大放光明，照澈鐵幕的一日。

返顧國內，更不禁慨感無端。國父早已看清世界和本國的危機，一再告誡我們有以自守。對西洋物質文明，固須迎頭趕上去，而對中國固有文化，更要從根救起來；自由應爭民族的自由，平等不是齊頭的平等；這些訓詞對我們是如何的一棒一喝！只怪我們太不警覺這「從根救起」的遺訓了，所以才有苦難的今天。我們的民族精神與固有文化，一經二百六十年滿清王朝的摧毀，再經一百年帝國主義思想的麻醉，已經是日益式微了。我們不能「從根救起」，共產匪黨正好「挖老根」。恰和在西方一樣，共產主義在中國，也是乘科學民主的口號以俱來的。憂時之士，

更應認識此中的微妙！不過西方還有一道宗教的防線，而我們的民族精神防線，在日益式微之餘，又遭受所謂新文化者的打擊。「打倒孔家店」，「反對舊禮教」，正好為三十年來的共產匪黨鋪路開荒。三十年的惡毒積於一身，是總有一天要崩潰的。領袖因著中國之命運，但亦未能使學風世運，澈底覺悟，勇猛回頭。「生於其心，害於其政」，遂有今天共匪禽獸妖孽世界的大變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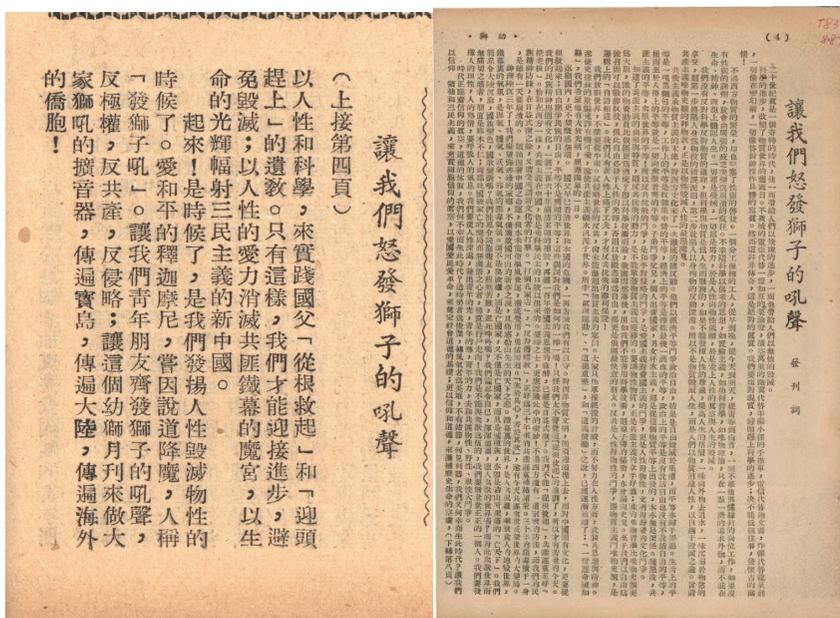
神洲陸沉三年了！我們癡望海那邊的家鄉，不僅灑故國河山的新亭之淚，且痛感船山先生的天下之悲。鐵幕裏的世界，是人禽混雜，率獸食人的地獄世界，鐵幕裏的氣氛，是腥氣、膻氣、妖氣、邪氣的惡毒氣氛。這不是換政權，而是亡國家，又不僅是亡國家，而且是滅種族，亦即是船山所深痛的「亡天下」。我們能忍令大陸沉淪，國旗變色，國歌變徵嗎？我們能忍令同胞親友，煎熬苦難，忍死呻吟嗎？我們能忍令自己，渾渾噩噩，墮入禽獸的世界嗎？面對此禽獸世界而無痛切之感者，簡直是麻木不仁；面臨此國破家亡的變局而無澈悟之心者，簡直是行尸走肉！我們是不能與禽獸為伍的，我們要做堂堂正正的一個人。我們要發揮人的理性，人的熱情，要呼吸人的氣息。我們要從人性深處，發出青年的光，青年的熱，青年的力，去和共匪物性、野性、獸性大鬥爭。

時代正臨着信仰的真空，道德的休假，我們何不幸而生此時代？造時勢者為俊傑，轉風氣者為英雄，不有錯節，何見利器，我們又何幸而生此時代？讓我們以信仰、領袖和三民主義，來充實同胞信仰的真空，以愛國愛民愛革命，來奠定社會道德的基礎；更以信仰和道德，來彌補歷史生命的空虛，（下轉第八頁）

（上接第四頁）

以人性和科學，來實踐國父「從根救起」和「迎頭趕上」的遺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迎接進步，避免毀滅；以人性的愛力消滅共匪鐵幕的魔宮，以生命的光輝輻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起來！是時候了，是我們發揚人性毀滅物性的時候了。愛和平的釋迦摩尼，嘗因說道降魔，人稱「發獅子吼」。讓我們青年朋友齊發獅子的吼聲，反極權，反共產，反侵略；讓這個幼獅月刊來做大家獅吼的擴音器，傳遍寶島，傳遍大陸，傳遍海外的僑胞！



《幼獅》創刊號發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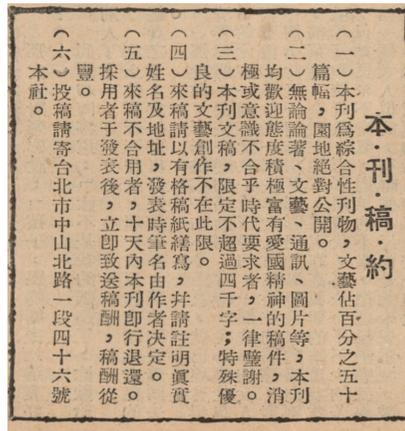
### 稿約

此刊物創刊號之稿約刊登於第 22 頁左下角。內容如下：

- (一)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文藝佔百分之五十篇幅，園地絕對公開。
- (二) 無論論著、文藝、通訊、圖片等，本刊均歡迎態度積極富有愛國精神的稿件，消極或意識不合乎時代要求者，一律璧謝。
- (三) 本刊文稿，限定不超過四千字；特殊優良的文藝創作不在此限。
- (四) 來稿請以有格稿紙繕寫，并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發表時筆名由作者決定。
- (五) 來稿不合用者，十天內本刊即行退還。採用者于發表後，立

即致送稿酬，稿酬從豐。

(六) 投稿請寄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四十六號本社。



《幼獅》月刊稿約

### 版權資訊

版權頁內容刊登於本刊物之封底，原文文字是由右至左橫式書寫，資訊如下：

### 幼獅月刊 創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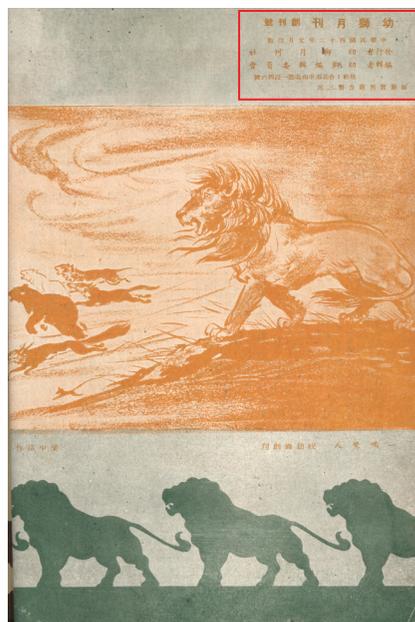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元月出版

發行者 幼獅月刊社

編輯者 幼獅編輯委員會

社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四六號

每冊實售新台幣三元



版權資訊

## 圖書館大事記

西元 2024 年 06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

- 06.01 畢業典禮當日 OPEN LIBRARY。當天讀者（不限讀者身分）可攜帶眷屬、朋友入館拍照、打卡留下美好回憶，現場書車提供精選好書交流免費拿，歡迎入館自由取閱。



- 06.01 書是人類文明的瑰寶，也是拓展視野、充實心靈的最佳途徑。圖書館每季都會購入近期暢銷新書，橫跨經濟、心理、文學、科學、生活等多個面向，希望為您的閱讀生活增添樂趣。本期【精選暢銷好書】展出地點於總館一樓暢銷書區，展出時間即日起至 8/31，歡迎到館借閱。



- 07.01 本日下午 2 時於圖書總館良鑑廳舉辦【圖書館 Open Source 服務的近況更新與圖書館資料分析的發展趨勢】演講活動。邀請到陳勇汀先生主講「圖書館與開放原始碼的共生之道：社群協力促進共同成長」，和李宗曄先生主講「EBSCO SaaS Solutions: FOLIO 的新發展與視化工具 Panorama」。介紹學術界的圖書館與商業的 EBSCO 如何為開放原始碼專案提出改善貢獻，實現社群協力共



同成長的開放精神。以及展示圖書館如何運用 Open Source 及大數據工具來改善圖書館的服務。

- 07.04 今日於圖書館總館地下室舉行「玉釵 AI NB 教室」啓用儀式，正式宣佈與華碩、輝達合作，打造國內首座導入 NPU 神經網路計算單元的 AI NB 教室。參與貴賓包含東海校長張國恩、東海董事長吳清邁、台中市副市長鄭照新、教育局副局長王淑懿、數位治理局局長林谷隆、華碩聯合科技董事長林福能、NVIDIA 協理郝亦為，以及東海副校長張嘉修、劉正副校長等一級學術、行政主管等人。校長張國恩表示，這次「玉釵 AI NB 教室」是由第 13 屆校友賴正秋為感念母親賴江玉釵女士的栽培，特別捐贈 60 台最新型 AI 筆電給母校，未來東海除了作為東海 AI 人才培育的場域外，也將致力將相關 AI 課程推廣至中小學。圖資長楊朝棟表示，AI NB 教室是以華碩 ROG Zephyrus G16 型電競筆電，配備 NVIDIA GeForce RTX 4070 GPU，可做為校內師生研究與學習的強大後盾，東海已成為中部重要的生成式 AI 教育中心，近期將與漢翔航太推出生成式 AI 實戰工作坊，未來也將以 AI NB 教室最先進的人工智慧設備與現代教育技術，創造中小學生學習效能與人才培育的量能。



- 09.02 即日起至 10/9，圖書館多媒體室舉辦「新生影展」。透過電影的故事與情節邀請大學新鮮人的你／妳一同體驗和探索，無論是校園浪漫或是深刻的友誼，還是追尋靈感、找尋娛樂單純享受電影的樂趣，我們都準備好了！不要錯過這個獨特的機會，讓電影成為你／妳大學生活的一部分。



09.02 即日起圖書館舉辦「圖資處迎新開學季系列活動」，計有好書交流、新生書影展、社團嘉年華及多肉植物微書展等，歡迎新生踴躍參與！



09.06 113 年東海大學行政同仁講習大會，圖資處獲頒行政人員服務創新獎團體獎（圖資處咚咚妞智慧生成機器人引領智慧校園新時代）。行政人員服務優良獎一資安網路組李維貞女士。以及資深職工獎勵林秀霞女士年資 35 年，陳昆良先生 25 年。



09.26 台南市立美術館今年四月舉辦「陳其寬：雙曲·交響」紀念展覽，其中有兩件借展作品是珍藏於本校之「東海大學全景圖」水墨畫與路思義教堂建築模型。是日已順利交歸還本校，並典藏於恆溫恆濕之善本書室。



- 10.01 本日由楊朝棟圖資長率領副圖資長黃一民、採編組組長陳婷婷、讀者服務組組長江維信、組員謝心妤等人，一同北上參訪師大圖書館。95年師大成立校史資料室，之後改爲校史經營組，目前則定位爲校史特藏組，隸屬於圖書館。該館尚設有高行健資料中心與梁實秋故居經營管理。希望借鏡師大成立多年的校史特藏經驗，重新規劃本校相關之校史典藏與展示空間。



- 10.24 「財團法人中技社」繼今年三月蒞臨東海大學參觀工學院電機系智慧創培基地、DDS-THU AI 中心，了解東海在 AI 及永續領域積極推動發展，並聽聞東海大學校長張國恩將規劃 4.3 公頃的智慧碳中和園區，落實永續教育。本日，中技社再度偕同中研院與學術界等 10 餘位院士、校長、副校長和行政主管蒞臨東海，實際走訪甫於 4 月開幕的智慧碳中和園區與 7 月完成建置的全台首座 AI NB 教室，同時就 AI 教學資源與創新應用在東海的發展及未來規劃進行深度討論。本次活動爲雙方建立交流平台，致力共同探索 AI 未來各種發展與合作機會。





10.29 由臺灣文學館所主辦的臺灣文學金典獎，今年與東海大學中文系合作，即日起至 12/31 於圖書總館一樓主題展區，舉辦「2024 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書展」。中文系的周芬伶老師即入圍三次，並在 2010 年以《蘭花辭：物與詞的狂想》獲當年度的台灣文學金典獎。近年中文系友入圍金典獎的還包括張馨潔、許閔淳、甘耀明、林徽俐、楊莉敏，以及今年度的入圍者：王仁劭。此展呈現本年度臺灣文學創作的繁盛景況，也與大家分享東海中文系歷屆入圍者的作品。



11.06 為讓社會大眾更深入了解路思義教堂這座建築的歷史與修復過程，東海大學特別舉辦「路思義教堂修復展」。本次展覽帶您深入了解路思義教堂的建造歷史，以及為期兩年的修復工程。透過精美的照片和生動的影



片，近距離觀賞到工匠們運用 12 道傳統工法，細心修復教堂的每個細節。本（6）日開幕式匯聚東海校長張國恩、副校長劉正、圖資長楊朝棟、教務長楊定亞、學務長龍鳳娣等一級主管到場參與。校長張國恩表示，路思義教堂歷經 60 年風雨，在全面修復後啓用，也讓舊建築擁有了新生命，東海將一路的成果和大家分享，未來將持續活化建築，讓大家都走入教堂，感受這座建築背後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以及信仰，期盼路思義教堂更具影響力。特展時間：2024 年 11 月 6 日（三）至 12 月 31 日（二），地點：東海大學圖書總館 1 樓特展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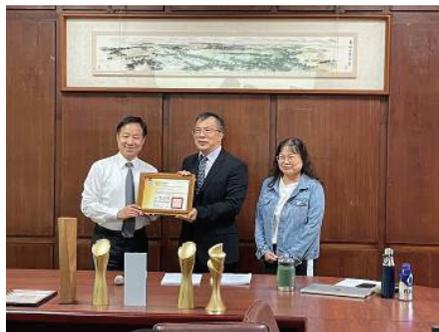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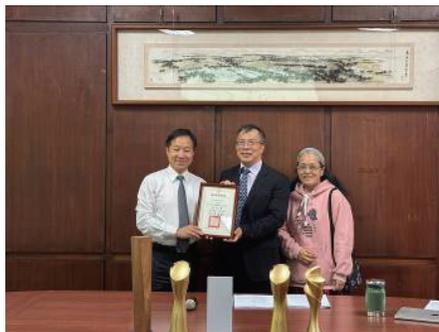
11.11 即日起至 12/06 於圖書館三樓多媒體室展出近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入圍暨得獎影片。這些影片不僅代表華語電影的最高水準，也讓觀眾得以一窺見導演與創作者的無限創意。無論是喜愛懸疑驚悚，還是偏好溫馨劇情的觀眾，期待大家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喜愛的電影！



11.13 本日於圖書館良鑑廳舉行 113 學年第 1 學期圖書暨資訊委員會，由各組組長進行業務與計畫報告，並審訂「圖書暨資訊處」多項辦法提案。

11.27 今日行政會議上，由圖資長楊朝棟與陳婷婷、林秀珍組長代表圖資處獻獎。分享東海大學楊朝棟特聘教授榮獲 113 年度教育部全國大專校

院 ODF-CNS15251 競賽第一名，以及本校圖資處獲得國家圖書館頒贈之 113 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 金心獎」。



（基於篇幅考量，本期的館內各組工作報告及各項統計資料，  
僅採用電子版發佈）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撰稿格式

2022 年 01 月修訂

- 一、投稿文章之各章節標題，其編碼層級格式為一、(一)、1、(1).....等順序表示。
- 二、撰文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中文書名、刊名、報紙、劇本為《 》，論文篇名、詩篇名為〈 〉。行文時，單指一書中某篇文章時兩者並用，如《史記·項羽本紀》、《詩經·豳風·七月》。若為外文，書名請用斜體，篇名請用“ ”。
- 三、獨立引文請自成一段，縮排三格全形字；正文內之引文加「 」；引文內別有引文則用『 』；引文之原文有誤時，應附加（按：）說明；引文有節略而必須標明時，概以節略號……表示。若需特別引用之外文，依中文方式處理。
- 四、文末請另列「引用文獻」，分「傳統文獻」和「近人論著」兩部分，「傳統文獻」以時代排序，「近人論著」以作者姓氏筆畫/字母排序，中文在前，外文在後。同一作者有兩本（篇）以上著作時，則依著作出版先後排列。
- 五、注釋採當頁註，編碼請以阿拉伯數字標示於句尾標點符號後。
- 六、引用格式如下：

### （一）引用古籍

1.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約西元 12 世紀)，卷 2，頁 2 上。
2. (明) 郝敬：《尚書辨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湖北叢書》本)，卷 3，頁 2 上。

### （二）引用現代出版專書

1. 王夢鷗：《禮記校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2。
2.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增訂本(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1-30。
3. 西村天因：〈宋學傳來者〉，《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1909 年)，上編(三)，頁 22。
4. 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09-110.

### (三) 引用論文

#### 1. 期刊論文

周法高：〈董妃與董小宛新考〉，《漢學研究》第 1 卷第 1 期（1983 年 6 月），頁 9-25。

#### 2. 論文集論文

江建俊：〈論英雄與名士—析論《人物志》與《世說新語》所代表的兩種不同人物典型〉，收入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編：《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1997 年），頁 619-655。

#### 3. 學位論文

王國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 年），頁 20。

### (四) 引用報紙

丁邦新：〈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和問題〉，《中央日報》第 22 版（1988 年 4 月 2 日）。

### (五) 再次、多次徵引

再次徵引時可用簡便方式處理，如，標明「作者：書名或篇名，頁碼」即可，如周法高：〈董妃與董小宛新考〉，頁 11。多次徵引時，在第一次引用時註明出版項即可，其後引用則在正文中直接括號標示頁碼，不必再另加當頁註。

### (六) 引用網路資料

作者：〈網頁名稱〉，檢自：網址，檢索日期：西元年月日。

範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期刊簡介—《音樂研究》簡介〉，

檢自：<https://www.musiccollege.ntnu.edu.tw/index.php/about-us/>，檢索日

期：2021 年 7 月 7 日。